

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尼古拉·布哈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18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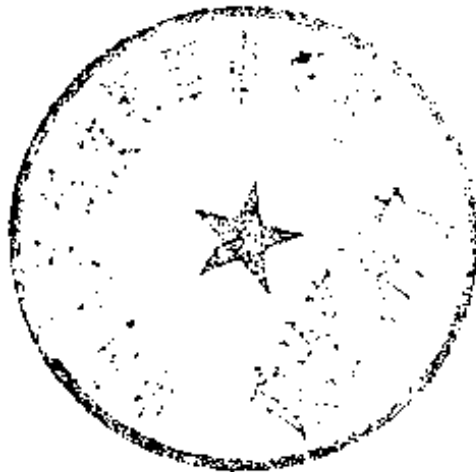
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苏]尼古拉·布哈林著

余大章 郑异凡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Часть I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20
根据国家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〇年版译出

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苏〕尼古拉·布哈林著

余大章 郑异凡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10,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书号4002·301 定价0.49元

译者前言

布哈林曾被列宁叫做“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著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说，布哈林是当时除列宁外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列宁的重视，他对本书作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誉之为“辉煌的作品”，充分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正确论点，同时也详尽地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重版时能予以改正。列宁认为，“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②。

《过渡时期经济学》成书于1920年初，即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是不通过市场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这就使本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带有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例如它否认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等等。

由于缺乏正常状态下的过渡时期的经验，作者在探讨过渡时期规律时，常常是抽象的论述和逻辑的推论多于实际经验的总结，象列宁所说的，“作者的假定没有以足够坚实的，即令是简短的实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50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文版第65页。

际材料为基础”。这是本书的严重不足之处。更成问题的是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概念和术语。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及其涵义是以他的唯心主义的和折衷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因此，布哈林也就经常地陷入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烦琐哲学和唯心主义。甚至一些本来正确的思想也往往被披上波格丹诺夫的术语的外衣，例如用“组织过程”代替“社会化过程”，用“保持平衡”代替社会产品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等等。列宁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匙焦油弄臭了一桶蜜”。

但是，当作者独立论述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时，往往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论点，这些地方列宁一再用“好”、“对”、“非常好”等评语予以肯定。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过渡时期经济的规律和特点，指出社会革命时期生产力暂时下降以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的必然性，展示过渡时期城乡关系的根本变化，考察国家政权的特殊作用和不断变化的职能，确定转化过程的阶段，探讨过渡时期的经济范畴，等等。有些论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作者指出了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的不同目的。他说：“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这里多少已具备苏联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某些基本论点。

本书还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抛砖引玉的作用：列宁在对此书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点。例如在反驳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时，列宁指出：“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 + m$ 和 IIc 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列宁在批驳布哈林时给阶级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们的集团’（说得不确切），这些人在社会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一

个集团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列宁对社会主义下的矛盾和对抗的提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对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强制规定消亡的先后次序，列宁提出了同布哈林相反的估计：起初消亡的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然后是惩罚和镇压机关，最后是军队。列宁对本书的评论是值得我们结合布哈林的原著进行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列宁的评论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为《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按照作者原定计划，本书是第一部分，其后应有第二部分，把一般理论用于俄国的具体条件，但未能成书。

《过渡时期经济学》是一本在苏联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作，二十年代不少苏联经济学家及经济著作曾沿用此书的观点和体系，我国在三十年代初曾出过多种译本，起过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根据原文将此书翻译出版，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探讨。

序

本书的任务是要推翻那种通常的、庸俗的、quasi* 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对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言过的那种 Zusammenbruch** 的性质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过程性质的概念。谁把无产阶级革命想象为政权由一些人手中和平地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上层组织机构的更替，谁要是这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型式，他就会胆战心惊地急急忙忙躲开人类正在经历的这场世界性悲剧。他不能在烽火烈焰和内战的隆隆炮声中，看到未来社会雄伟壮丽的轮廓。他就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庸人，他的理智就会象他的“政策”一样怯懦。他把自己特有的软弱强加给革命，给革命杜撰出各种可能的定义，但就是没有革命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定义。

严酷的生活经验表明，马克思是多么地正确，他说，“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旧社会无论是国家结构或生产结构，都在分裂，直到最低层都在彻底地瓦解。从来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急剧的改变。但是没有这种改变，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正在从瓦解的要素中，在新的联系、新的结合中，按照新的原则，建筑未来社会的基

* 仿佛。——译者注

** 崩溃。——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5页。——译者注

基础。而且它是作为阶级的主体、作为有计划和不顾任何阻力而实现这种计划的坚强意志的组织力量来建筑这个基础的。人类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病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且只有象无产阶级这种普罗米修斯阶级,才能担负起过渡时期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以求最终点燃共产主义社会的明灯。

我在本书中想分析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打算将来写一部具体叙述现代俄国经济的著作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对这种概括性著作的需求是很迫切的。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但对这些材料需要进行研究和理论上的思考。

作者的口号是: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遗憾的是没有时间来使这本著作在叙述上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只好采取了近乎代数公式般的写法。如果具有相同思想的人,能使这些思想最后定形,而那些相信改良主义类型的幼稚幻想的人,至少想考虑一下事情远比叛徒们在庸俗小册子中所讲的要复杂得多,那末,作者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不待赘言,马克思的方法是作者的南针,这种方法的认识价值直到现在才有了巨大的增长。

尼·布哈林

德文版跋*

自本书写成后，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了。此后俄国采行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它第一次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小资产阶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混合”企业相互间的正确经济关系。俄国的这一特殊转变的根本前提是国家的农业性质，这种转变使我的一些敏锐的批评家提出劝告，要我把本书重新写过。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这些聪明人的不学无术的基础上的，他们由于过份幼稚而不能理解抽象的研究同经验的现实之间的差别，抽象的研究从“理想化的横断面”(马克思语)去描绘事物和过程，而经验的现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比抽象的描写要复杂得多。我写的并不是俄国的经济史，而是过渡时期的一般理论，那些不能理解一般问题的纯粹的新闻记者和狭隘的“实践家”是不能理解这种一般理论的。然而，他们不理解，自然不能由我来承担责任。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进攻”的策略理论实质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我们的一部分德国同志中间这个理论颇为流行，并且想从本书中为它找到论据。不言而喻，要想从本书得出具体行动的结论，那就象要从“贫困化理论”得出此类结论一样，是不可能的。

本书的德文版很可能会给我们的敌人(纯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那些妄图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切根本要素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以某种道德上的满足感，因为我公开承认革命本身有客观的

* 译自共产国际出版社汉堡 1922 年德文版。——译者注

不可避免的破坏作用。能使这些人感到愉快，这也使我感到合乎人情的愉快。而当“健全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悲观印象使社会民主党退回到康德和福伦德去，把他们当作党的官方哲学家，而资产阶级则离开康德改宗印度的托钵僧(凯泽林)，以求在恒河岸边寻得慰藉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然而，革命的工人们将清楚地懂得，一旦“资本主义的外壳被炸裂”(马克思语)，象库诺夫所说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发展进程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至于说到笑，那末事情总是这样：“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尼·布哈林

1921年12月于莫斯科

目 录

序.....	5
德文版跋	7
第一章 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	1
第二章 经济、国家政权和战争	11
第三章 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20
第四章 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	41
第五章 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60
第六章 生产力,革命的耗费和技术变革.....	73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一般组织形式	89
第八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	97
第九章 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105
第十章 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	118
第十一章 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	129
附 图 1—7	139

第一章

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

1.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
2. 经济的主体——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3. 世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
4. 危机和战争。
5. 资本的集中。

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有在生产是无政府状态，产品分配也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才作为不取决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的“自然的”、“自发的”规律，作为“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①的重力定律那样的“盲目的”必然性在发生作用的规律显现出来。马克思第一个指出了商品生产的这种特殊性，他在其商品拜物教的学说中给理论经济学作了一个光辉的社会学的导言，论证了理论经济学是一门有历史局限性的学科。^② 其实，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

①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2页〕。

② 亨利希·迪策耳在〔《理论社会经济学》〕这本著作中也阐述了这种思想，尽管讲得远为逊色，但深奥复杂多了。还可参看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经济和价格》。

的。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总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

同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决不是个体经济的简单的总和。洛贝尔图斯在同巴斯夏的论战中，就已经出色地说明了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经济环境，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他称之为“经济交往”。如果在我们面前的是各个经济的简单的和，那就不会有社会。“和”是纯粹逻辑上的统一体，而绝不是现实地存在的综合体。

某一个社会经济的范围有多大，空间特征又怎样，对纯理论来说，完全是无所谓。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嘲笑那种为德国爱国主义教授们所赏识的“国民经济学”这一名称。同样，对抽象理论来说，关于谁是某种经济的主体问题，也是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之间的联系的类型，即通过交换的无组织联系的类型。相反地，对于不限于引出一般规律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因此，象现代研究家卡尔·梯什卡博士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的那些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梯什卡写道：“正如国民经济是由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von Volksgenossen)的经济——不管是个体经济还是团体经济——的和组成的一样，世界经济是由各国民经济的和组成的。”“受世界市场状况重大影响的各国民经济的和组成世界经

济”。^① 第一个定义同第二个定义并不一致；第二个定义包藏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简单的和的概念是排斥有机的联系的。篮子里的虾的和不是现实的统一体。同样，每年出生的儿童数目虽被“综合成”统计上的“总和”，但它也不是现实的统一体。一种特殊的有机联系的存在——这才使简单的总和成为现实的总体。然而正是这样的总体排斥算术上和数的概念，因为它比算术上的和数大得多和复杂得多。

既然社会是不生产产品而生产商品的社会，那末这个社会就是无组织的统一体。在这里，劳动的社会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表现在被交换商品的不间断运动中，表现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然而，劳动的这种社会性并不是象在有目的的社会劳动组织中那样简单地和清楚地呈现出来的。

商品社会是一种具有特殊联系类型的体系，从这种联系的性质中产生出商品世界的极为特殊的范畴。这种体系不是“目的论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一定计划受到自觉的领导的体系。这样的计划是不存在的。这里甚至不存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实际上，这里不是“社会在生产”，而是“在社会中生产”。正因为如此，不是人统治着产品，而是产品统治着人，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不能纳入所期望的范围之内。如果整个社会在商品生产方式下，从而也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是盲目的，如果它就其总体来说不是目的论的统一体，那末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也同样如此。社会是由那些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在商品社会中，正是这些部分是经济的主体，虽然它们的体系是无个性的、盲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合理的。

这种“不合理性”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

^① 卡尔·冯·梯什卡博士：《现代工业国家的世界经济问题》，耶拿，古斯塔夫·费舍出版社 1916 年版第 1 页。

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不理解这一点。例如：在哈尔姆斯①看来，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协定，也就不会有世界经济。科勃契②一向认为，还不存在世界经济，只有当世界国家产生时才会有世界经济。卡尔沃尔说的是“世界市场经济”。在哈尔姆斯和卡·迪尔③的全部争论中，甚至看不到对问题的正确提法的痕迹。他们正是根据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性质的绝对错误的观念，去寻求作为经济的构成特征的某种“调节”的。为了论证一种科学，他们在寻找一种扼杀这门科学的原则。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觉地起作用的部分呢？在理论上，世界资本主义可设想为各个私人企业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结构是这样的，即集体资本主义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④是经济的主体。

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企业主的垄断同盟、联合企业和银行资本之渗入工业，使无组织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组织，从而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一个企业通过买卖同另一个企业的无组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为通过股份“控制额”，通过“参与”和“拨款”的有组织的联系所代替，其人格化的代表就是银行和工业、康采恩和托拉斯的共同“Dirigent”*。这样，表现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组织之分裂为独立资本主义“企业”的交换联系，便为有组织的“国民经济”内

① 伯恩哈特·哈尔姆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耶拿，古斯塔夫·费舍出版社1912年版。

② 科勃契：《国际政治经济学》，巴黎，日拉尔和勃利叶出版社出版。

③ 卡尔·迪尔：《康拉特年鉴》中的《私人经济学说、国民经济学说、世界经济学说》。伯·哈尔姆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反批评论述）见《世界经济文库》1914年第1号196页以下。

④ 这个术语是本书作者采用的。见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

* 经理。——译者注

部的技术分工所代替。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远远超出社会分工的限界。分工常常是指把总劳动分解成为各种“工作”。^①其中，过去和现在都把社会分工理解为各个企业间的分工。然而，相互“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却是互相需要的，因为一个生产部门为另一个生产部门提供原料、材料、辅助资料等等。

但是不应当混淆两种情况：一是由社会分工这一事实产生的社会劳动的分散；一是否定这种分工本身的社会劳动的分散。事实上，单个商品生产者之所以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有不同的劳动形式。在每个单个的生产部门的范围内，甚至在更专门和更小的生产部门的范围内，也同时有大量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换句话说，商品社会的无政府结构表现于“企业”的单独存在之中。这些“企业”相互间又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它们或者通过买卖而相互联结在一起（不同种企业），或者作为竞争者相互对立（同种企业）。裁缝作坊的老板同布厂主的联系是：他买后者的布，但是对于另一个同行业的老板，他却是竞争者，是决不能用交易同他联结在一起的。裁缝企业和棉布企业的同时存在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反之，数个裁缝企业的同时存在决不表示任何社会分工。

这个区别是必须认真加以注意的。

^① 分工问题研究得较少，但关于各种劳动性质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参看威廉·配第：《经济著作》，第1卷；《政治算术》第260页；《政治算术》中的另一篇文章；（全集第2卷第473页及以下各页）；亚·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1章（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区别）。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也可参看近代著作家的著作。参看古斯塔夫·施穆勒：《分工的事实》，1889年鉴；《分工和社会阶级形成的本质》，1890年鉴；艾米尔·杜尔克海默：《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本唯一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J·B·克拉瓦：《价值的分配》，1908年纽约出版，第11—12页；J·费舍：《经济学基本原理》，纽约1912年版，第193页；弗·奥本海默（《纯粹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倡导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分工，并认为这是一种创见！（第115页）。有趣的是列克希斯在《一般国民经济学说》中的分类。

通常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市场竞争联系起来的，仅此而已。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竞争只是表示单个商品生产者的“存在”之一部分，一种型式，即同社会劳动的分工没有联系的那种关系型式。

虽然如此，由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不同种企业也进行着相互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另一方面，分配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主体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每一个企业决不能实现它本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追求同一水平的利润率这个资本主义最起码的规律，就已经完全使上述的简单关系“变形了”^①。由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垄断，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6—197页〕。

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 *action directe** 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超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此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价格是商品社会的普遍范畴，因此平衡的任何破坏都在价格的一定运动中表现出来。利润的范畴没有价格的范畴是不可设想的。简言之，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种经济现象，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价格，从而也同市场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种经济现象都是市场现象。关于竞争也可以这样说。迄今考察的主要是一般地说作为横的竞争型式的特征的市场竞争。但是，竞争斗争，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斗争也可能在本来意义的市场之外进行。例如为投资范围而进行的斗争，即为扩大生产过程的可能性本身而进行斗争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也很清楚，在这里必须使用一种不同于在市场上横的竞争的“典型”情况下所使用的斗争方法。

现在我们必须再来谈谈现代世界资本主义。

我们已经指出，构成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单位的，不是单个企业，而是复杂的联合体，“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当然，不同“国家”的各个企业间也存在着世界联系，同时这种联系的样式在每一种具体的场合下，可以同这些“国家”本身间的联系的样式完全相反。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各联合体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体系转变为合理的组织，从无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经济的主体。这种转变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

* 直接行动。——译者注

以及资产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结合造成的。同时，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都根本没有被消灭。这些现象不仅保存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世界经济体系同以前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样，是盲目的、不合理的和“无主体的”。

在这里，商品经济决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它在一国范围内要末在消亡，要末在大大地缩减，为有组织的分配所代替。商品市场只不过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不再是“民族的”了。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在两个或几个不同种企业合并成一个联合体的场合下所发生的过程，在这种联合体内，原料先被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再加工成成品；而且产品的相应运动不引起货币等价物的相反运动；“经济货物”在联合企业内部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产品流通的，只有当它离开联合体时才成为商品。同样，在一国内有组织地分配的产品，只有当它的存在与世界市场的存在联系起来时，才成为商品。与国民经济体系相比，区别只在于经济体系的范围和这一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特殊性质也向我们说明了竞争斗争的特殊型式。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实际上是大型的联合企业。互相对立的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仅作为生产同种“世界商品”的单位互相对立着，而且作为世界社会劳动分工的部分，作为在经济上互相补充的单位彼此对立着。因此，它们的斗争既在横的方面进行，也在纵的方面进行；这种斗争是混合的竞争。

向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过渡，总是加强简单的横的市场竞争转变为混合的竞争的过程。既然斗争的方法是与竞争的型式相一致的，那末由此也必然会造成世界“市场上”的“关系尖锐化”。随着纵的和混合的竞争而来的是直接的力量压迫方法。因此，世界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武装斗争。帝国主

义的基本根源也就在这里。

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组织的斗争最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无政府状态，在这里世界范围的社会化劳动遇到了国家“民族”的占有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只要这整个体系没有被摧毁——必然会暂时地使生产力下降，以便随后在同一资本主义的外壳下开始生产力发展的下一个周期。生产力的这种破坏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conditio sine qua nou**，从这个观点来看，危机、竞争的耗费和作为这种耗费的特殊情况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避免的 *faux frais***。在这里，暂时的平衡实际上是用下面两种方式达到的：一是直接降低生产力，这表现在消灭价值上；二是部分地消灭经济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磨擦。后者表现在资本的集中上。

资本集中消除竞争，但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竞争在更大的基础上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它消灭小生产单位的无政府状态，但随后它又使大生产单位之间的无政府关系尖锐化。一般经济体系中的“磨擦”在一个地方消失，只是为了在另一个地方更大规模地再现出来；它们变成巨大的世界机制的各个基本部分之间的磨擦。

资本集中同竞争斗争一样，是在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的：如果并吞的是同种企业，那末这是横的集中，如果并吞的是不同种企业，那末这是纵的集中，最后，如果联合是由一些联合企业合并而成，或由一个混合企业同一个小企业合并而成，那末这是联合的集中。在世界经济中，资本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兼并上，这种兼并同样可以按照竞争斗争的三个基本方面来加以区分^①。

战争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与危机的结果同样的现象：生产力遭

* 必要条件。——译者注

** 非生产费用。——译者注

① 参看我的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到破坏,同时中小世界集团被消灭(独立国家的灭亡),而且产生了靠牺牲灭亡着的集团而成长起来的更加巨大的联合。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并不归结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归结为各个资本家或他们的同盟(辛迪加、托拉斯、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世界经济不仅是商品经济,而且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各个部分间的矛盾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各个企业间的相互的无政府关系;另一方面是作为阶级社会的社会的无政府结构。换句话说:既存在着“纯经济”矛盾,也存在着“社会”矛盾。显然,第一类关系直接影响着第二类关系。生产力的破坏和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使阶级间的矛盾大大地尖锐化了,当这两个因素达到某种结合时,就会发生整个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开始于这个体系中组织上最薄弱的环节。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二章

经济、国家政权和战争

1. 战争和国家。2. 国家理论。3. 经济、国家政权、战争和它们的相互依存。4. 战争的分类。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战争。
5. 阶级战争和国内战争。

1914—1918年的战争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政权问题。如果说从前，在战前时代，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流行着具有浓厚的曼彻斯特色彩的观点，那末从帝国主义国家把千百万人抛向历史的舞台，并立即显示出它作为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时起，对国家政权作分析就提到了理论和实际争论的日程上来了。

包罗一切的国家组织的生活——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国家生活，开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老人在他的著作《列维坦》中说^①，没有一种权力可以同国家权力相比，但是他的“列维坦”*同金融资本的国家机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力量相比，不过是一只小狗。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社会经济结构最终会引起由政治方式表达的尖锐的危机。并且沿着两个基本方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世界的

^① 托马斯·霍布斯：《道德和政治著作集》，伦敦版：“在地上没有象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约伯记》，第41章33）

* 圣经《旧约》中的巨大海兽。——译者注

社会性劳动同“民族”国家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于各资本的国家组织的冲突，资本主义的战争；另一方面，由于第一种矛盾发展而极端尖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引起革命。无论是前一种情况或后一种情况都决定当前国家组织的问题。战争在国家政权的类型和它的社会内容没有变动的基础上引起力量的重新配置。革命却改变国家组织的基础，使新的阶级掌握政权，并且建立新型的国家生活。

因此战争和国家政权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要予以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从一切社会现象都彼此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的，而且这些现象的每一个系列都是维护和发展，或者倒过来，破坏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原因链条中的环节。应当用这个观点去考察战争和国家政权^①。

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生产为这个社会某一部分所支配的剩余产品的机制。这种剩余产品可以采取价值的形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干脆就是产品（奴隶占有制经济）。但是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看到剥削的过程。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最一般的问题：这种剥削过程怎么会成为可能？这种包含着巨大内在矛盾的体系怎么可能存在？实质上由两个社会（阶级）组成的社会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相对的统一体？换句话说，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即保持建立在社会整体分裂基础之上的社会体系的稳定？

答案是清楚的。如果这种体系存在，那就一定有某种附加的

① 马克思认为战争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可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桑巴特在他的《战争与资本主义》（敦克尔和洪勃劳特出版社版）这本小册里，作了完全歪曲的描述。对他的批评可以在考茨基的《战争和资本主义》一文中找到，见《新时代》1913年第2卷第39期。

因素存在,以便牢固地联结分裂了的社会,镇压(肉体上“粗暴”的,思想上“精巧”的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一句话,为了维持这种体系,不仅需要管理物的,而且主要需要有管理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就是国家。

但是不应该认为,国家是某种凌驾于社会和阶级之上的东西。社会上不存在任何超阶级的东西。另一方面,既然说的是少数人的统治,那末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持、巩固和扩大剥削过程。——由此可见,国家组织仅仅是,并且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或者象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①。

这种情况需要特别强调。事实上,充满社会矛盾的整个体系的相对适应性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或者有“第三种力量”存在,以调和阶级、缓和矛盾、促使建立长期的妥协;或者有对垒的一方组织存在,用各种手段——从直接的暴力起到复杂的意识形态罗网止——控制自己的阶级对手的营垒。实际上使用的是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说,建立统治阶级的组织。大多数甚至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说提出来的恰恰是第一种理论,即国家政权“和谐”论。

这种“理论”高见其实在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法典中已经有了,这个法典说,“执政者的宗旨在国内是保证法制,消灭邪恶,以防恃强凌弱。”^② 支持这种冠冕堂皇“理论”的最“严肃的”论点,是国家政权执行着所谓公益的职能,如建设铁路、医院,颁布工厂法,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169页〕,“政治只能是保护财产的方法及扩张财产的工具”(阿·洛里亚,《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巴黎1903年第2版第362页)。

^② 引自露普洛维茨,《国家理论史》,1905年,第8页。还可参看洛也尼,《国家》(《国家论手册》);维郭齐恩斯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霍尔塞列姆,《从社会学角度看战争》,第1卷,第61页。

实行保险等等。

但是，公正的分析表明，国家政权的这些职能绝不排斥它的纯阶级的性质。这些职能要末是扩大剥削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铁路），或维护统治阶级的其它利益（卫生措施），要末是对阶级敌人的战略让步。^① 这里的情况同统治阶级的任何组织中的情况是相同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目的是增加利润，而不是养人活命，向人们提供工作。但是，要增加利润，它就必须进行生产和雇用工人，在某些情况下（在罢工等情况下）它还向工人作出让步，然而正象德国工人所说，它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其为企业主的“阴谋者”的组织。这里，“公益的”职能无非是剥削过程的必要条件。

无论从国家的客观作用，或从国家——作为“创造自身历史”的人们的组织——所抱定的主观集体目标来看，这种国家的社会职能（因而也是它的“本质”）在于保卫、巩固和发展那些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

统治阶级国家组织不同于这个阶级其它组织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国家组织是最广泛的阶级组织，它积聚了全部阶级力量，集中了各种机械的镇压工具和惩罚工具，^② 使统治阶级组织成为阶级，而不是阶级的一小部分或小集团。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经济”行动，只要它包括整个阶级，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质：这里打击的不是个别集团，而是整个阶级，从而也是阶级的国家政权。

国家是一定的人们的组织。因此，它表示的不是人同自然界的
技术关系，而是人们相互之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社会关系。

① 对那些读过为“民族退化”而喊叫的有关人口问题著作的人来说很清楚，一系列预防“退化”的措施，都直接出自维持一定数量高质量炮灰这一愿望。

② 对照汉斯·德尔布吕克：《政府和人民意志》第133页：“归根到底，真正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武器。因此，对国家的内部性质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始终是军队属谁所有的问题”。对照斯宾塞的这个天真的预言：“个人对国家”。

在国家的技术组织定义中，例如在把国家看成是集中的机构这种情况下去寻找国家的“本质”，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集中这一抽象概念，可以以截然相反的社会关系类型作为前提，而社会关系的类型，恰恰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黑人就是黑人，黑种人。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才成为奴隶。”生产资料永远是生产资料。这是一个技术概念。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生产资料才成为资本；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组成所谓资本“本质”的完全特殊类型的关系开始物化在生产资料中时，才是这样，“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语）。

对马克思来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历史性质的，马克思正是从社会现象的历史规定性中来探索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国家完全是一个历史范畴，就是说阶级社会的范畴，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国家的“本质”并不在于国家是集中的机构，而在于这个集中的机构体现了各个阶级间的一定关系，即统治的、政权的、奴役的和压迫的关系，这个机构将随同阶级和最后的阶级统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一起消亡。^①

① 社会民主党完全歪曲了这个观点。本书作者早在战争初期，就在报刊上写过许多文章着重提出这个观点，如在荷兰的《论坛》（1916年11月25日的文章……及其它）中，在挪威的左派机关报《阶级斗争》，不莱梅的《工人政治》杂志中；最后还在《青年国际》杂志（瑞士）以及纽约《新世界》报的一些论战文章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可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欧根·杜林和他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论权威》（《新时代》，32·1）；马克思：《旁批及其它，补遗》，第2卷，第50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读者可以从列宁同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看到对本问题的精彩阐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著的详细引文。一些资产阶级教授，象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也不懂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例如，阿道夫·瓦格纳（在社会政治科学字典中《从国民经济学观点看国家》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最高级”（in höchster Potenz）国家的一切特征，因为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只不过是“滥用”的产物（完全和柏姆—巴维克所说的一样，按照他的看法，放高利贷是“滥用”，至于利润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存在，还会在农村里发芽生长）。耶里温克（《关于国家的一般学说》）也是象瓦格纳那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只不过他对“强力论”感到了神秘的惊慌，并且宣称，“它的实际后果不是巩固国家，而是破坏国家”（175页），这个理论为“不断革命开辟了道路”。也可参看莫普洛维茨的《国家理论史》，第373页以下。

在资产阶级研究家中间，受杜林影响很大的龚普洛维茨和奥本海默最接近真理。奥本海默是这样规定“历史国家”的定义的：

他写道，“从形式看，国家是获胜的集团强加给战败集团的一种法律机关。它的内容是对被征服集团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剥削（“Bewirtschaftung”）。”^① 这里撇开征服和阶级本身只能从“超经济压迫”^② 这个事实中产生的问题不谈，我们应当承认，奥本海默关于“Bewirtschaftung”的说法实质上是正确的（这并不妨碍这位作者在其它著作中对“非阶级的”普鲁士官吏表示同情和恭维）。

从上面对国家政权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它象任何“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一个盖在经济生活上面的简单的玻璃盖子，而是全力巩固产生它的那个生产基础的一股积极的力量，一种有效的组织。

现在我们必需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战争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需要运用我们对待国家政权问题时的观点。战争在川流不息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由于社会生活首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和更替过程，那末战争在这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现在回答这些问题已经不困难了。因为进行战争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各民族”：进行战争的是国家，它在战场上使用“人民”的活生生力量，就象它们在工厂或矿山中使用这种力量一样。战争一开始就运转起来的那个工具——军队是国家机构最本质的部分。这里我们顺便指出，整个社会大厦有其建筑学的特殊的一元论的特征：它的一切部分都具有同样的“风格”。就象在生产关

^① 弗兰茨·奥本海默：《国家和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同时可参看他的《国家论》和《纯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1911年。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施穆勒：《分工的本质和阶级的形成》（第72页，对龚普洛维茨的论战）。在反对这一理论时，特别需要提出美国的发展，虽然对北美的封建主义不能估计不足。见古斯塔夫·迈尔：《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

系中人们属于一定的等级制之中，而且这种制度同阶级集团的划分是一致的，同样，在整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军队中也表现出这种社会等级制。

但是，如果战争是国家的职能，是 *in actu** 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如果作为机构的国家本身是巩固和扩大一定生产关系的手段，那末很清楚，战争首先也执行这项“工作”。在各国的斗争中表现出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人格代表的一定的生产基础的斗争。每一种生产结构都有相同的国家政权型式，从而也都有相同的战争型式。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组织方面（虽然它也是由一般技术和经济条件决定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现象的社会意义。要回答战争的“本质”这个问题，就必须历史地提出这个问题，就象历史地提出国家问题一样。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类似的回答，即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战争是再生产那种产生战争的生产关系的手段。

国家是一个“超经济的因素”。但是它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同样，战争作为国家政权的职能和“超经济”因素，是经济过程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

在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时，必须对问题作一个详细的说明。因为，社会过程不只是扩大一定的生产结构。除此之外，它还是某些形式、某些“生产方式”即“经济结构”为其它形式、其它“生产方式”即“经济结构”更替的过程。但是，“基础”的更替也必然伴随着它们国家外壳的更替。新的生产关系炸毁旧的政治外壳。

* 行动中的。——译者注

① 在前面提到的著作（《战争和资本主义》）中，维尔涅尔·桑巴特描述了战争对产生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桑巴特硬说资本主义是依次由不同根源产生的（一会是由于战争，一会是由于奢侈和爱情。参看他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他的方法——根据这位尊敬的教授的妙论——必然会造成可怕的夸大。

但是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生产关系的每一种型式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性。要在理论上了解某一个时代，恰恰需要从它的特殊性去研究它，需要分析使这个时代成为时代的那些特征，就是说造成关系的特殊型式，首先是生产关系特殊型式的那些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利用这种方法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那就十分清楚，由于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也应当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战争。

上面的叙述已经提供了战争分类的基础。这也就是国家分类的那个基础。每一种生产型式都有它相应的一种国家型式，而每一种国家型式都有同它完全相适应的一定的战争型式。

我们举几个例子。假定我们这里是奴隶占有制经济。那末国家只能是奴隶主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只能是扩大奴隶占有制的手段，扩大再生产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的手段。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的所谓殖民地战争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社会作用，归结起来就是扩大后来转化为工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工业资本及其国家组织为争取销售市场而斗争时，战争就是要“落后的”世界服从工业资本的统治。最后，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披上金融资本主义外衣时，在舞台上就出现了特殊型的国家政权，一种具有集中的军国主义机构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而战争的社会作用就在于扩大金融资本以及它的托拉斯和银行团的统治范围。

如果战争是由社会主义专政政权进行的，情形也是一样。工人国家进行战争时力图扩大和巩固产生它的那个经济基础，就是说，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顺便说说，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社会主义战争，即使是进攻性的，在原则上也是容许的）。与社会化的生产相适应的，也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型式不同于一切以前的政权，正如社会主义生产

方式不同于建立在私有经济所有制关系上的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因此，工人专政所进行的战争的社会意义在原则上也与过去时代所有一切战争不同。

社会主义战争是阶级战争，应当把这种战争同一般国内战争区别开来。后一种战争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它不是两个国家组织之间的战争。相反，在阶级战争中，双方都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起来：一方是金融资本的国家，另一方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我们是在纯粹的形式上考察一切现象的。当然，实际上事情往往要复杂得多。尽管资本高度集中，现代世界经济仍然是相当错综复杂的。甚至世界战争，除了纯粹帝国主义因素外，还有附在总的背景上的一系列其他因素掺杂其间。现在成为——在一个极短暂的历史时期——独立资产阶级国家单位的小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就是这样的因素。但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它，不是这种——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国家小资产阶级；决定世界命运的是帝国主义巨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战争的巨人们之间的斗争。

第三章

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1. 战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2. 再生产过程、生产力和战争。3.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元结构及其无政府状态。4. 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5. 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6. 生产力和革命的耗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不同部分间的冲突，表现为这个体系生产力的增长同它的无政府生产结构间的冲突，正如我们知道的，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冲突。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客观需要是组织世界经济，即把无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变成经济的主体，变成有计划起作用的组织，变成“目的论的统一体”和有组织的体系。帝国主义企图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项任务。海·封·贝克拉特不太精确地表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自由竞争不再起经济生活调节者的作用，于是最后就发出了要求组织的呼声。开始了联合的过程，人们在共同为争夺工业市场(industrielle Marktgebiete)而斗争。这样就产生日益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联合的经济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最后发展为争夺工业品销售市场的民族之间的大规模的政治冲突。”^①要解决这项任务帝国主义是力不胜任的，战争危机导致整个体系的危机。但是在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狭小范围内，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改组的阶段，使这个体系中互相斗争的各部分变成有计划的和有组织的。

这种通过经济职能国家化的改组是为了消灭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解并探索这种改组的根本原因是并不困难的。这种改组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间集团极其迅速的死亡过程，而在组织上和技术上进行得较为容易。在这方面，战争的作用是同巨大的危机一样的。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减少的同时，这剩余价值聚集并集积于（社会上、技术上、经济上）最强大的生产单位中。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加速了，这种加速的集中成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的“消极条件”。战争这一巨大的有组织的过程的需要，是国家化的积极原因。这种战争的规模，它的技术，军事机构复杂的内部关系，军事组织立刻出现的对工农产品的巨大需要，以及战役的结果对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意义，把最大可能地克服资本主义体系中斗争着的各部分的内部无政府状态这项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争的成败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经济上组织性的程度成正比。由于缺乏许多产品，特别是缺乏原料（这种缺乏在国际联系断绝后立即出现，并随着普遍的耗竭和贫困而日益严重^②），上述原因就大大加深了。由于这种缺乏，自然就要求尽量节约地，从而合理地、有组织地进行分配。但因为分配过程是再

① 海·封·贝克拉特博士：《工业的强制卡特化或自由组织》。当代财政和国民经济问题，由香茨和尤·沃尔弗出版，第49期，斯图加特1918年版，第22页。自然，资产阶级的副教授应当象资本主义卫士应做的那样，打着“民族”的幌子来叙述阶级国家。另一方面，他看不到，起作用的不仅是销售市场，而且还有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就是符合下述公式三部分的那些要素：

$$G-W \begin{cases} A \text{ (生产资料)} \\ P_m \text{ (劳动力)} \end{cases} \dots\dots P \dots\dots W' - G'$$

② 阿尔图尔·非列尔，《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在他的著作《面临过渡经济》（《法兰克福报》出版社1918年版）中，特别是在《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这一章（第33页）中，特别尖锐地强调这一点。他的公式是：“我们是在组织贫困。”艾米尔·雷德列尔（在《战争中的经济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广泛的阐述。他说：“以前，战争在经济上是国家财政的问题。但现在，国家是万能的，因此，它的对外行动不是表现为企业的形式，它不再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不再是货币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自然实体都为了战争而动员起来。”（第362页）。

生产总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言自明，分配的组织化也就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某种程度的组织化。不难理解，整个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代表）由于这种集中而大大获得好处。只有十分幼稚的人才把这看成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侵犯。实际上这里没有任何“剥夺剥夺者”的气味，因为一切都集中在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的手中，而不是集中在任何“第三种”力量的手中。反对这一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的人士，首先是商业资本和投机商业的代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就其本质来说一般是排斥商业的，尤其是排斥商业投机的；因而它取消了商业利润和靠投机而得的“差额利润”^①。只要这种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得到实现，它就会破坏这类“神圣权利”。如果认为由此就违反整个资本主义阶级的“权利”，那是可笑的。在这里发生的只是剩余价值在金融资本主义集团中的再分配，只是商业利润转化为由国家银行支付的红利或利息。因此在这里发生的，不是剩余价值的消灭，而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改变了形式。只要问题是涉及到收入和剩余价值分配这类范畴，那末这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本质所在。至于说到剩余价值份额的减少和为了防止革命把它转让给工人，那末这是一个次要问题，没有重大的作用。^②这种倾向的数学限界是整个“国民经济”转变为一个绝对统一的联合托拉斯，在这里所有单独“企业”都不再成为企业，只变成了单独的工场，成为这个托拉斯的分号，因

^① 参看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9章：商品交易所。“但是军事经济关闭交易所，并从而取消了它的所有问题。”（艾·雷德列尔：《战争中的经济过程》。）

^② 玛·斯密特同志在她的《过渡经济时期没有组织的和有组织的过程》一文中（载于《国民经济》杂志1919年第6期），区分了“以形成资本的货币职能为基础的交换”（ $G-W-G'$ ）和“为了把一种商品换成另一种商品”的交换，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配似乎应当是前一种交换到后一种交换的过渡。这是难以置信的混乱。第一，货币在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形成资本的职能”。第二，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向简单商品经济（其公式是： $G-W-G'$ ）的过渡。这里有消灭一国内部商品经济和改变剩余价值形式的倾向。但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而在这里社会分工变成了技术分工，整个经济变成了世界资产阶级的相应集团的绝对统一的企业。

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同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一切经济的（和不光是经济的）组织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原因很清楚。实际上，就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资产阶级组织：国家、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企业主同盟、合作社、银行团、科学协会、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新闻业以及成百个其他组织。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的是，所有这些组织一旦实现了联合、建立了联系和隶属关系，这整个体系将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但哪个组织应当是最高的组织呢？这也很清楚，应当是最大的、最有力的、包罗一切的组织。国家政权正是这样的组织。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把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集中于自身。因此，其余的组织——首先是经济的，然后是其他一切组织——都应隶属于这一国家组织。它们全都“军事化”了。它们全都成为分号，成为统一的、包罗一切的组织的分部。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整个体系才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即立足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经济”在组织上就同“政治”融合在一起，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就同政治力量直接结合在一起，国家不再是剥削过程的简单的卫护者，它成为公然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直接的集体剥削者。^① 在这里，国家政权的发展

^①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除了上述引证的著作外，还可参看如下著作：弗·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5年4月出版；约非教授：《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15年，40，第3卷第5册；古奥特：《战后的经济问题》，载于《经济学杂志》，1915年8月15日出版；卡尔·巴洛德教授：《近年来乌托邦文献中的若干问题》，载于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第6卷第1册；瓦尔特·拉特瑙：《新经济》和《新国家》；格·伯恩哈德：《过渡经济》，柏林1918年版；《垄断问题和工人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论文集）；俄文著作可以提出拉林同志（米·卢利叶）的文章和小册子，特别是关于德国工业组织的论著。也可参看尼·奥辛斯基：《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几章）。

显示出它的全部辩证性质：国家政权是作为统治阶级组织的原始的和唯一的形式产生的；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许多组织中的一个；最后，在把一切其他组织吸收以后，它实质上又重新成为唯一的组织^①。

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是金融资本主义关系的继续，是后者的完成。因此，它的发展的出发点是金融资本所提供的那些组织形式，即辛迪加、托拉斯和银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代替托拉斯这种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技术上把生产联合起来的私人垄断组织的，是国家垄断。类似托拉斯的辛迪加和卡特尔也同样为国家垄断所代替。集中过程由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而加速：这就产生了所谓强制辛迪加和强制卡特尔。混合企业是一种过渡型式，在这种企业里，国家是股份持有者，大股东等等，在这里，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金融资本主义联系的形式表现为所谓“参与”的形式。这些在改造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极重要的形式，早已不是唯一的形式了，这里还包括一系列较为次要的变化：国家对生产过程的调节和监督（强制生产，标准化，对制造方法的调节，对内部技术生产体系的规定）；对分配的调节（强制购销；组织国家供应，国家贮备、规定价格，“配给”制等等）^②。银行起着一种特殊的并且非常大的组织作用。银行把存款放入国家银行，而国家银行方面则集中着巨大的款项（只要提一下军事公债就够了），并且把它投入军事工业。因为存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定期的闲置资本，所以国家银行有组织地“调拨”这些存款，就意味着使工业在实际上隶属于国家银

① 当然，国家资本主义“纯粹型式”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实际上只是表现为一种倾向。

② 关于德国情况，参看约翰·穆勒的材料，载于《国民经济立法》，国民经济和国家年鉴，1915年。关于法国情况见沙·纪德：《法国的粮食供应和有关的措施》（经济杂志，1916年3月号）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材料（也有英国的材料）。

行，意味着把企业家的利润变为由国家银行支付的利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这样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收入也就趋于平衡，变成一种特殊的“红利”，支付这种“红利”的，是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集体企业，一个统一的股份公司，一个托拉斯，其体现者便是帝国主义国家^①。

在这里，有组织联系的型式，在其具体构成上，是不同的；它们按照其职能性质而区别开来：这里我们看到有计划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有各种新的、稳定的生产技术单位（把以前一系列的生产联合体集中起来的强制性托拉斯、国家垄断等等就是例子）；这里也有简单的“调节”（例如强迫性的购销合同）；最后，这里还有更低级的组织过程的因素——规定标准额^②；后一情况可以用规定价格作例子。加速金融资本主义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倾向，是走向更高级的组织型式，而后者造成稳定的生产技术集团，看不到这一点，那是错误的。组织过程完全可以不从生产技术方面开始；这个过程的体现者的主观目的也完全可能不是组织，而比如说，是纯商业的计算，虽然如此，客观结果可能是造成新的生产-技术联合体。这种现象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辛迪加是作为在市场上活动的商业同盟产生的；虽然如此，但进一步的发展却形成了类似托拉斯的卡特尔，之后又形成真正的托拉斯，也就是说，形成不仅是商业上而且是生产技术上的同盟。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银行资本的渗入工业促成了各企业的结合（成立“合并”托拉斯、联合托拉斯等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过程就从流通领域走向了生产领域；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流通过程是整个“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

^①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法规和形式，参看赫契克教授的著作：《战争社会主义的法律技术》（载于1916年6月《德国评论》）。

^② 在这里，这个术语是按照董·波格丹诺夫同志所用的意义来使用的。参看他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倾向的文章以及《普遍组织的科学》。

成部分，而再生产过程对本身的各个部分和阶段来说，具有“强制的规律性”^①。

总之，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改组走向包罗一切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实行国家范围内的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制从属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从属于战争的目的。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考察了组织形式，借助这些形式各国的资本主义结构才能适应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的新条件。但是我们是从小生产克服无政府状态的角度来考察一切变化的。现在要谈一下社会无政府状态。因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不仅包括按企业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论，还存在着这些生产关系的另一种区分。因此在这方面也必定会发生关系的改造，因为不这样，整个体系就会是极不巩固和短命的。在这里，战争的需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为战争和以战争名义动员无产者的身心，如同动员物质生产一样，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前提。

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过程，是以金融资本主义所制定的组织要素为出发点的。同样，社会改组的过程也必定是以先前的发展所造成的因素为基础的。组织的物质形式存在于工人的组织中；存在于工会中，社会主义政党中，部分地存在于合作社中，以及它们的全部辅助和附属机构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工人爱国主义的独特心理中，这种爱国主义一部分是旧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残余的变形，一部分则是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政策中获得相对的和

^① 亚·波格丹诺夫同志对于战争时期的全部组织过程只肯看到“配给证”，即只看到在生产力倒退的基础上产生的统一标准的过程。实际上，统一标准的过程从它的意义来说是深远无比的。这里，生产力的倒退完全不排除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进步。就是在“正常时期”也有这种情况，正是在危机时期，生产力的暂时倒退带来了生产的加速集中和资本主义组织的产生。当恩格斯说到辛迪加和托拉斯时，也犯过这种（*mutatis mutandis*〔情况不完全相同〕）错误。这种错误现在是不该重复了。

暂时的好处的产物。最后，改组的方法就是那个从属于包罗一切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方法。社会党和工会的背叛正是表现在它们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它们实际上已经被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化了，它们已经变为军事机器中的“工人部件”。这些组织的国家化，要以无产阶级心理的独特的资产阶级国家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等价物；这表现在所谓“国内和平”理论的广泛传播，甚至为无产阶级人士所承认。自然，除这些方法外，直接的机械压迫和镇压的方法，直接的惩罚措施的方法也继续得到发展。

通过这种办法，资本主义体系各部分在帝国主义大战的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平衡受到极大破坏的条件下，获得了最大可能的稳定性。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涉及资本主义体系的组织的一切基本倾向，我们也必须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辛迪加，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为组成部分的特殊的“二等”辛迪加。这就是国际“同盟”，这就是“国际联盟”。这些组织的前提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联系，相互“参与”的总和造成的。战争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这种松弛的辛迪加化的过程；其中“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在这里，组织的倾向超出了一国的界限。因而，组织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尝试中获得了它的最高表现。

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的条件下进行的。结构的改造伴随着生产力的倒退。由此最终便造成整个体系的必然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研究破坏过程的根本影响。

我们把社会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和。所以，这一方面是 *in natura** 各种机器、原料、燃料等等的总和，另一方面是 *in natura* 各种劳动力的总和（金属工人、技术员、纺织工人等等的劳动力，也就是各种具体的、熟练程度不同的劳动

* 实物状态的。——译者注

力。)①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一般基础，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事实。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是同再生产的观点一致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同扩大再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停滞状态是同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力的下降表现为周期地消费掉的那部分产品的再生产日益减少。在最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遇到了社会的倒退。

其实，再生产的观点对任何经济研究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它对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和过渡阶段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双倍地必需的。事实上，在所谓“正常”时期，事先就存在着生产循环的周期的重复。诚然，在这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发生特殊的问题，但整个说来，情况多少是“顺利的”。相反地，“危机”时代使任何下一次的循环都成为疑问。因此，在这里，再生产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它正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从字面上讲，再生产不过是重新生产，是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初看起来，可能弄不清到底再生产的概念同一般所理解的‘生产’概念在实质上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在这里需要这个陌生的新用语。然而，正是在生产过程的

① 不能象马斯洛夫(《土地问题》第1卷；《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及其他著作)在他的生产力定义中所作的那样，把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一个不变量和过程相加。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才是生产资料。关于生产力可参看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等等。也可参看莱昂·萨伊的《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生产》条(“生产力就是力的诸要素总的称谓”)；克兰韦希特：《国民经济生产概论》(载于勋贝尔克手册)；伯·哈尔姆斯：《劳动》(政治学辞典)；列克希斯：《生产》同上；列克希斯：《一般国民经济学说》，1910年出版；瓦特金斯：《生产率变化中的三因素》，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15年第12期(第5卷第4号)；弗·奥本海默：《纯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一节(第138—139页)；鲁·希法事：《关于劳动手段的新研究》。精确的表述可以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找到，参看他的著作：《对社会问题的阐述》，第1部分，摩里茨·维尔特出版，柏林1890年版，第60页。(“生产力和生产率应当加以区分。生产率是指生产力的效率和效果。”换句话说，洛贝尔图斯说的是在自然状态下的生产力。)也可参看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体系》。

重复里，在它的不断反复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 *an sich** 因素。”①“其实”，重农主义者就已经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了，但是帝国主义的“博学的”仆从根本把它忘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在其开始阶段产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理论思想的原因，这些思想从战争利润这个事实，从军事工业的“繁荣”，从冶金、化学和其他工厂的股票上涨，得出战争对“国民经济”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这个结论。

我们且来考察一下现实的再生产过程，因为整个经济都带有战争的标志，也就是说，因为已经为军事工业重新分配了生产力，并且总的来说，为军队调整了各项工作。人们通常从经济观点把为战争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种劳动对再生产条件的影响，那末就不难看出这种劳动的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被制造出来。这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两个最大的部门。很清楚，生产资料总是属于社会劳动体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再生产的一个条件。关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大体上也是如此。对生产过程的继续循环来说，消费资料决不是不留丝毫痕迹地消失了的。因为消费过程基本上是劳动力生产的特殊过程。而劳动力也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同样必要的条件。因此，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军事生产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大炮并不变化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火药散于空气中，决不会以物的形状再现于下一次的循环中。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要素的经济效果 *in actu*** 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但是不应当认为，这里经济意义必定同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产品的实物形态联系在

* 自在的。——译者注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柏林 1913年版第 1 页。〔中译文参看三联书店版第 1 页〕。

** 实际上。——译者注

一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供应军队的消费资料。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同一情况。消费资料在这里并不创造劳动力，因为士兵并不出现于生产过程；他们是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的，他们是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因此，只要战争继续进行，那末大部分消费资料就不是用作生产劳动力的资料，而是用作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的特殊的“士兵力”的资料。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再生产过程就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就是说，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的。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重要的情况。军队虽有很大的需求，就是说要供养它，但它并不提供任何劳动等价物。因此，它不仅不生产，而且在消耗。换句话说，“再生产基金”在这里受到双重的扣除。这一情况是最重要的破坏因素。此外，还必须指出战争的直接破坏（道路被毁，城市被焚烧等等），以及一系列间接的破坏（劳动力失去专门技能以及其他等等）。因此很清楚，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每次周转而变得更狭小了。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是扩大再生产，甚至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这种过程可以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战争就是这样的。可见，现实进行的过程是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同关于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文字上的、拜物教地歪曲的说法区别开来。因为混淆这两个过程——一方面是实物的和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过程，乃是关于战争有积极影响的骇人听闻的理论的基础。事实上，从前面讲的可以得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变为以公债券支付的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地进行积累。但是它们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们得到实现的客观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既

然在战争过程中价值的实现是作为收入的实现而发生的，那末它要么是“吃光”不变资本，要么是在资本主义大集团中再分配剩余价值时实现减少着的剩余价值额。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价值符号，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显然，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积累平行发生。

但根据上述一切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支出”是无用的并对过程的破坏方面应作出否定的评价。任何资本主义危机都是生产力的暂时破坏。应当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并超越几次生产循环的范围来评价它。因为它最终会扩大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范围。关于战争，情况也是如此。假定世界大战第二年以大国集团之一的胜利而结束。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经过破坏时期之后，会有许多复兴的机会；在“伤愈”之后，也就是在联系重新建立和不变资本的破坏部分恢复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获得某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以比过去更高级、更集中的形式获得这种可能性。可见，从与“战争”直接相联和接近“战争”的生产循环的角度来看，凡表现为纯损失的东西，从资本主义体系在其巨大历史范围内的整个运动的角度来看，就会表现为生产力的暂时下降，以这种下降为代价换来的则可能是生产力的进一步的而且更为强大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遇到的是危机的一种，虽然这种危机就其规模和形式来说是空前未有的，但决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资本主义体系经过暂时的停滞之后，会以组织上更加完善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

危机或崩溃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震荡的具体性质及其深度和持续时间。在理论上很清楚，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只能继续到一定界限，之后就开始了整个组织的解体和瓦解。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①。扩大再生产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范围、它们的空间扩大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扩展了”，它的内部各部件进行了改组；换句话说，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保持和扩大的限度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在根本上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但在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生产结构的部件经常在改变：只要指出所谓“新的中间阶层”的增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在消极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发生着什么情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更加详细地研究整个社会的构成问题。

首先，什么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呢？

根据马克思下的定义，它们是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和分配这种劳动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工长、技术员、工程师、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等等之间的关系都属于这种关系，并且这些分子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现实的结合上来考察的。因此，生产关系的范畴是涉及社会构成的普遍范畴：这里既包括社会阶级性质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种类的关系（例如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共同劳动，即所谓简单协作之间的关系，等等^②）。在这里应当指出，只要我们说的是直接劳动过程内部的关系，那末生产关系就不是某种不同于劳动的技术组织的東西。实际上它们是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② 彼·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著作《经济 and 价格》中有意在分析中撇开生产关系，以便断定，社会阶级关系是每个社会的永恒属性。关于这一点参看我的文章《司徒卢威先生的戏法》，载于《启蒙》杂志1913年129期。

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工厂不只是技术范畴，而且是经济范畴，^① 因为它是社会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综合体。马克思以资本指挥下 (Kommando des Kapitals) 的工厂等级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样板。技术要素(工程师、厂长、机械师、工长、工人、壮工的劳动力) 同时也是经济组织的要素，既然技术要素要与固定的人群结合在一起，那末它们也就具备了社会阶级特征。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阶级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共同的条件和共同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分配过程方面的全部后果联结起来的人们的集团。生产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引起分配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这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

生产关系是作为一定体系的要素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把联系的一定型式同这些要素对立起来，那就是极大的简单化。社会不是要素的和；但它同时也不是要素及其联系的算术上的和。因为社会联系不是与要素并立的。人们在技术劳动过程中的空间分布及其所起的职能作用是积累并凝结在人的要素中的。因此，社会联系发生着转化，并表现在要素本身的“内部结构”中，社会联系的型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总之：一方面一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的生产方式是联系的一定型式，另一方面，这种型式也造成这些要素本身。

其他一切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如果生产关系体现着一种联系型式，而另一种关系(例如国家组织)则按照另一种型式组成，那末整个体系就会是绝对不稳定的。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不可能设想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资本的政治统治下在生产中也不可能设想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的每一种类型都不可避免地以其结构的一元论为特征，这

^① 参看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种一元论是每种社会体系存在的根本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一元论为特征的。工厂、兵团或内阁的“组成”是按照一个原则建立的，生产关系的等级制的型式在国家政权、军队等等的相应的等级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上层是所有主阶级，最低层是无产者阶级，中间是一系列过渡集团。资本家和厂长，将军，部长或大官僚是大致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尽管他们所属的范围不同，但他们职能的性质属于同一类型；他们担负起这些职能；因此他们不仅带有单纯技术的性质，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阶级性质。工程师、军官、中级官吏，他们本质上也是同一阶级的人们，他们的职能是同一类型的。同样，小职员（邮差、听差、门房）、工人、士兵也具有相同的地位，因而阶级的等级制体系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体系。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在不断地进行。因而，资本主义结构是一元论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论。

我们所说的社会是 *in natura** 要素构成的体系。这个观点现在应当贯彻始终。这个观点同再生产观点一样，对任何“危机”时代，从而对资本主义瓦解时期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在“正常”时期，即当存在着社会体系的动态平衡的条件时，可以停留在社会关系的拜物教的表现上，因为这种表现具有稳定性，以一定的、完全现实的、物质的社会劳动过程为基础。货币关系、价值范畴等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范畴，在“正常”时期我们可以分析这些范畴，因为在“正常”时期，它们是正常的：价值规律是无政府生产结构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平衡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 实物状态的。——译者注

** 必要条件。——译者注

当生产体系处于“不正常”条件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说，没有动态平衡的条件。因此，在方法论上也就绝对不允许分析价值关系和整个拜物教关系的范畴。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研究物和劳动力的自然形式，以这样的单位来进行计算，把社会本身看成是具有自然-物的特征的要素的组织^①。

鲁道夫·哥特谢德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他说：“一般地说，目前这次战争首先应当使我们习惯一件事，即进行深刻的自然经济思维……如果光从货币经济角度来考察一切经济问题，那末它们几乎显得全是无法解决的，相反地，从自然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就比较简单。”^②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出了轨，为什么平衡的范畴不能适用于“危机”时代。

总之，整个问题现在可表述如下：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体系在其自然形式上，在结合的自然要素的形式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劳动价值的公式上，我们这里得到如下的系列：

$C + V + M$ ； $C + V + (M - X)$ ； $C + V$ ； $C + (V - X)$ ； $(C - Y) + (V - NX)$ 等等；与此平行的是，价值同价格将是不可比较的。很容易看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只要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是靠M进行的，那末情况并不危险。超过这个界限，就会一方面开始“吃光”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开始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劳动力得不到发挥职能的保障，得不到执行其形成资本的作用的保障，也就是

① 可惜，甚至许多同志也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超历史的绝对现实性是由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相对规律造成的。在我们这里，甚至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会计学也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上的。而且这恰恰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当货币的价值表现同现实的劳动过程不可比较，而劳动过程并不调节生产力的分配的时候。

② 鲁·哥特谢德：《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解决国家问题的财政社会学文章，维也纳—莱比锡 1917 年第 4 和第 5 版。

说，劳动力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个过程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劳动力被排出生产过程；第二，实际工资降低、形成劳动力的能生产不足、劳动力的非熟练化；最后，技术生产等级制中的上层分子和下层分子之间的联系破裂了。资本主义机器的“下层”螺丝由于没有获得足够量的滑润油而松动了。这里，我们看到联系破裂的两种主要形式：1. 这些联系的腐败及其解体（例如个人缺勤，劳动纪律松弛，职员中的马虎懒散，贪污，破坏商业法规等等）；2. 这些联系的革命的破坏（工人的群众性停工、罢工、对资本家阶级的各种有组织的反抗）。

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上，可以看到这个资本主义关系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它就会席卷资本主义体系所有部门。积聚在下层环节头脑中的对掌权者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的顺从心理消失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职能也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在技术职能同阶级利益相吻合的地方，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阶级利益同维持现有的生产制度相一致的地方，体系的上层环节的人物为这种维持而斗争的心理就日益浓厚了。那种在解体时期破坏生产关系的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机构的联系强制地破裂时期便作为公开的革命斗争暴发出来。那种在生产中发生的事情，也会 *mutatis mutandis** 在军队和国家行政机构中发生。

我们已经知道，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耗尽了社会剩余价值 (M) 之后，就会绝对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瓦解过程。在理论分析上不能绝对精确地断定，瓦解过程什么时候开始，说明这个过程开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数字。这已经是一个 *questio facti***。1918—1920 年欧洲经济的具体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个瓦解时期已经到来，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旧的生产关系体系将要复活。相

* 加以相应的改变。——译者注

** 实际问题。——译者注

反，一切具体的材料都表明，瓦解因素和各种联系革命地破裂的因素正在逐月增长。在理论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国内和平的心理所谓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候，才能存在；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生产力，即整个工人阶级还默然“同意”执行资本主义职能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存在。这个前提一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继续存在了。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确切地断定，（在政治方面）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是一种过渡，它应当被理解为一定历史过程，它表现为旧国家机器的崩溃，国家机器分解成为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决不是这样一种客体，它能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阶级手中，并按照可敬的资产阶级家庭法规继承下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就是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和组织新的国家体系，可是，瓦解了的旧成分一部分被摧毁了，一部分出现在新的结合中，成为新的联系型式。^①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但绝大多数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极为幼稚的关于“夺取政权”的观念，认为只要更换“首脑”、“政府”，这样“整个机构”就被夺取了。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现在在关系的这个方面，不光是通过抽象的考察得到了证实，而且已为经验所证实。

生产关系的转化过程远不是这样清楚的。这里，那些在政治变革的理论方面占主要地位的观念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方面的典型是鲁·希法亭^②的论点，他说，只要无产阶级掌握六个银行（“首脑”），就会使全部工业受无产阶级支配，因为在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银行是生产技术体系——“全部机构”的组织枢纽。

^① 关于这一点参看列宁同志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以及我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

^②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

经验证明,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实际上掌握银行只是破坏了资本的指挥权力。为什么?问题很简单,因为银行是在独特的、信贷货币关系的基础上“管理”工业的。这里的联系型式是信贷联系的型式,它恰恰在无产阶级夺取银行时被破坏了。

按照以上所述,在理论上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等级关系的瓦解的原因。

资本主义联系的瓦解过程及以后的革命破裂的过程,在军队中看得最为明显。帝国主义军队之所以陷入瓦解,粗略地说,是由于“军纪松弛了”,也就是说等级中的下层环节已不能再成为这种等级的环节。联系的革命破裂出现在“整个机构”的大规模的多少有组织的秩序混乱中,而这种秩序混乱是新阶级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前提。这种秩序混乱也就是现存体系的崩溃。因此,暂时的“无政府状态”是革命过程中表现为旧“机构”崩溃的客观上完全不可避免的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机构中大致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是技术关系,社会等级同时也就是技术等级。因此非常清楚,当我们注目于这个社会的人们的技术组织时,体系的社会环节的瓦解和革命地解体——这是崩溃的必然标志——也就是社会的“技术机构”的瓦解。

但由此可以看出,不能把旧的经济机构全部地“夺取”过来。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如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所说,“工业的革命的解体”^①,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用任何诉苦所能避开的。当然,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如果革命和旧生产关系的崩溃不导致技术生产联系的瓦解,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对现实过程的冷静的判断,对这些过程的科学分析告诉我们,这种瓦解时期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是历史上必然要发生的。

^① 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

人们技术等级的瓦解是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产生的，这种瓦解又影响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的一定体系中是融合地存在的。因而，随着“机构”的瓦解必然会产生生产力的继续下降。这样，就大大加速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正在崩溃的（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工业复兴”，而这种复兴是资本主义空想家所梦寐以求的。唯一的出路是体系的下层环节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占居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只有共产主义建设才是社会复兴的前提。^①

在理论上，这自然还没能证明要实施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前提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问题，在逻辑上决不是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相一致的。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继续瓦解下去，“文明的毁灭”，退回到中世纪半自然经济的原始形式，一句话，就是那种安那托尔·法朗士在其《企鹅岛》的结尾中所描写的景象。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待以后再来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恢复的。为了使社会能够发展下去，技术生产机构的要素（人的要素）必须被安置在新的联合中，必须通过新型的联合结合起来。因此，人们面临着下列选择：要么是“文明的毁灭”，要么是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可见，要使生产力在经过一系列生产循环之后开始发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即社会主义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耗费”（“劳动过程的中断”和内战过程中社会能量的直接耗费），是人类社会用来为自己取得

^① 格里涅韦茨基教授在他的书中象一个资本主义的辩护人那样看问题，他的智力视线没有超出辛迪加分子的“世界观”，完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范畴。将来的思想史专家一定会觉得，伟大社会变革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患有这种真正的夜盲症，简直是可笑。

进一步发展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同任何革命一样，伴随着生产力的下降。内战，而且是现代阶级战争——这时不仅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组织成为国家政权——这样大规模的内战，从经济上和从近期再生产循环角度来看完全是一个负数。但是，我们从危机和资本主义战争的例子上已经知道，从这个角度作的考察是有局限性的考察；我们必须从再生产在其广大的历史范围内的继续循环出发，弄清这一现象的作用。这样，革命和内战的耗费虽表现为生产力的暂时下降，但由于生产关系按照新的方法进行了改造，生产力的暂时下降却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打下了基础。^①

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是“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在作为这个机构一部分的军队中以及在生产中的“kommando”*。

在夺取政权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内战过程中，生产力的曲线在组织形式成长的同时却在继续下降。组织形式的这种成长是在“工业的军官”即技术知识分子（他们不愿处在与过去不同的等级体系中）的反抗（首先是所谓怠工）中进行的。但是这个阶层的反抗对于成长着的新体系产生的危险，比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反抗小得多。因此，从保持并发展人类社会的观点来看，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唯有这种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生产体系的相对动态平衡创造条件。

^① 庸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考茨基，关于革命的变革抱有真正幼稚的看法。对他们说来，具有极大的困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干脆不存在的。相反，对经验提供的事实，他们蔑视地加以避开，其办法是把实际发生的革命说成是“不现实的”和“不正确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是一种应受到最大蔑视的方法。例如参看卡尔·考茨基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农业的社会化》的序言。客观上最终会扩大生产力的力量的生产力的暂时下降，这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内战等等）。见尼·布哈林：《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载于《共产国际》，第4期和第5期。

* 指挥权。——译者注

第四章

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

1. 资本主义崩溃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型式。2. 生产关系“成熟”的标准。3. 资本主义经济的衰竭和瓦解及共产主义的建设。4. 共产主义建设是一个历史时代。5. 革命过程的阶段。6. 新的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知道，那种关于“旧机构”整个地和直接地过渡到新轨道上去的思想是多么地幼稚。分析过渡时期中可以用资本主义体系崩溃来说明其特征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看到，技术生产等级体系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表现，这种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分解成各个组成要素。不管这个革命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中间阶段可能是多么短促（在具体的历史上），但是，它是整个发展链条中的必要阶段。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瓦解的不是全部社会-技术联系，而是等级型式的联系。在资本主义体系瓦解时期，在这个体系的革命崩溃时期，以工人阶级为一方向以技术知识分子、官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系都会破裂。但是表现工人同工人，工程师同工程师，资本家同资本家关系的生产关系却没有破裂；换句话说，社会阶层的总划分和人员的组织技术机构的分裂，首先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总的来说，无产阶级内部的联系没有被打断。

而就是这种联系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社会化劳动的基本因素。①

新社会不可能象 *deus ex machina** 那样地出现。它的要素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里讲的是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涉及的是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问题,所以必须在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寻找新社会的要素。换句话说,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一种生产关系一般说可以成为新的生产结构的基础?

很清楚,这个问题一解决,也就解决了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性”问题,而这种“成熟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从前,问题的提法太一般,并且多少有点简单化。就是说,既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前提,所以认为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一定的综合“机构”的存在、由资本主义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全部总和就是“成熟性”的基本标志。但是,从上面整个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样提问题是不够的。因为正是这种集中的“机构”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瓦解,所以它不可能 *in toto*** 成为新社会的基础。②

① 克里茨曼同志注意到事情的这个方面——当然,是用另一种提法,(《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基本倾向》,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3期)。但是,他几乎象所有作者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象皮一样脱落了……总的来说,是领导人的简单更换”……(第13页)。在由于缩减生产和排挤无产阶级而引起的生产力下降的影响下,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部分地瓦解,那是另一类的现象。

* 骗人的魔术;自动装置,——译者注

** 整个地。——译者注

② 自由主义的教授和他们妥协主义的应声虫,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为了装璜门面,却竭力用似乎“科学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因此,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马克思的。例如,帕·马斯洛夫的老师弗兰茨·奥本海默写道,“在数量和力量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无产阶级……剥夺已经完全没有真正反抗(!)能力的剥夺者,从而完全掌握现有的一切生产和分配机制,这些机制不用加以任何的变更就被利用……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化理论。”(弗兰茨·奥本海默:《社会化的理论》,载于工程师海尔曼·贝克博士编的《社会化的途径和目的》文集,“新祖国联盟”出版社出版,柏林,第16页)。普兰格博士把这说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透彻说明。”(见上述文集,第79页)。显然,可敬的教授们认为,圣洁的圣母的特点是德行,同样,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则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著名的第7节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基本因素: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这些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并同这个生产方式同时发展起来。^①这两个因素构成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生产方式的基础。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它们是“机构”的一部分,新组织的一部分。一般地说,任何社会体系都表现为一种物的和人的组织。同时这里的“物”不单纯是外部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存在。机器不是人类社会之外的机器。它只有在社会劳动体系中才成为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作为一种体系同时是“人和物的机构”。^②

物的机构是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它不包含在生产关系概念之内,而属于生产力。而且在生产联系革命地破裂过程中,这种机构可以相对地保存下来。它决不是非瓦解不可的。当然,机器、装置、厂房等在社会震荡时期会受到损失。但是破坏的基础完全不在这里。物的机构遭到破坏主要是人的机构瓦解的结果和劳动过程连续性的中断。因此,问题在于对第二个因素即对“社会化劳动”

的特征,而且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机构的诞生,丝毫也不破坏资本主义的处女性。奥托·鲍威尔也附和他说,“它(剥夺)不能用残酷(!!)的没收形式进行,决不当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使生产资料遭到毁灭,使人民群众陷入穷困,使国民收入的源泉断绝。因此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应当更有秩序更有步骤地去进行。就是说,应该用不破坏社会生产机构,不妨碍工农业经营的方法去进行。”(奥托·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自由”出版社出版,柏林1919年版,第28页。[译文见三联书店中译本第32页。])这位前“社会化部长”显然不想用地上的要素,而是想用天上的要素建设社会主义。

①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31—832页)。

② 海尔曼·贝克博士:《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32页,前引论文集。

的分析。包含劳动关系总和的人的“机构”，包括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些社会阶层。但是基本形式，典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是无产阶级的集中。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合作形式”在决定性的时候表现为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新社会的重心正是在这里。

社会的总劳动力——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是组成生产力的两个概念之一（因为生产力无非是现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和）；同时，象旧经济学家再三指出过的那样，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的劳动机构的基本部分。因此，恰恰应当在这里寻找新的生产结构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机制所训练、所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中看到未来的生产关系的骨骼，同时还看到实现这种关系的力量。^①

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的“成熟”是指这样一种合作体系，这种体系具体体现在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中，同时把人的原子紧密地联结成一个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讲到“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7页〕。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描述工人之间合作关系的话：“雇佣劳动制是全靠（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末尾第252注也引用了这个地方）。十分清楚，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不仅看作是一种实现“暴力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合作关系的社会体现，这些关系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成长起来，并且是社会主义（alias〔在另一个地方〕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哈马舍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莱比锡1909年版）杜撰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发挥的这个观点同《资本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才在《资本论》引用了有关的地方。

可见，正是这个因素是“成熟”的标志，当然，这个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从属现象，而且从社会·组织技术观点来看，这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

从这种社会组织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是非常清楚的，而所有“驳到”这一点的有关议论，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形而上学的澜言。为资本主义竞争所分裂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有计划的组织；在一定时期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是对“能够”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论证。确实，我们暂且撇开生产过程的具体历史外表，而只从内部的抽象生产的逻辑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也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劳动的社会化在技术上使任何具体的社会结构有可能实行计划组织；或者是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如此微弱，劳动处于如此“分裂”状态（象马克思所说的“zersplittert”），以致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实行社会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在前一种情况下业已“成熟”，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尚未“成熟”。这样提问题是对任何一种有意识的和形式上的“社会化”结构都适用的问题的一般提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对国家资本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成熟了”，那末对共产主义建设时代来说，它也成熟了。^①

共产主义建设的特殊问题不在于缺乏社会性劳动的基础，而在于各个分裂了的社会阶层的新的结合，首先在于技术知识分子加入新的体系。但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加以分析。

我们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巨大震荡，看作是这个体系的崩溃，许多 quasi* 马克思主义派的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中伤者都把

^① 社会妥协主义理论的无比的社会卑鄙性，正好在于这些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妥协”，反对社会主义，它们口头上三番五次地承认社会主义，但没有实际行动。

* 似乎。——译者注

这种震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①这种观点的逻辑基础是对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辩证过程的完全无知。世界大战，革命纪元的开端等等，正是我们谈到的这种客观上“成熟”的表现。因为这里非常紧张的冲突是极度增长的对抗的结果，而这种对抗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断地再生产着和增长着。它的震荡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相当准确的指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可悲的表现。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再三预言过的 *Zusammenbruch**。他们是正确的，认为没有崩溃，没有社会平衡的破坏，没有流血的斗争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只是可怜的改良主义空想。^②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那就产生了需要解决的抉择问题：“文明的毁灭”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由上面所作的分析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上我们看到，生产-技术-社会阶层瓦解的时代总的说还保持了无产阶级的统一，他们首先而且最早体现了未来社会的物

① 首先是考茨基。战争以前他“期待”灾变，但它“没有成熟”。战争时期他防止革命，因为国际是“*Friedensinstrument*”〔和平的工具〕，在大炮声中无法行动。战后，他防止社会主义，因为灾变使“国力疲惫”。不用说，他是有一套看法的。

* 崩溃，大灾难。——译者注

②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尼·奥辛斯基：《社会主义建设》第1章，以及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恩格斯的下列预言是饶有兴味的：“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54页〕。

质基础。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要素，在革命进程中只有一部分瓦解了。另一方面，它空前地团结起来，重新教育自己，组织起来。俄国革命及其相对软弱的无产阶级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明，而俄国的无产阶级是组织力量的真正取之不竭的贮藏所。

社会主义的“数学或然性”在这种条件下变成了“实践的确实性”。

但同时需要彻底放弃一种想法，认为维持和发展新制度所必须的条件即生产力的进步——从主观上说，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在变革一开始立即就能开始实现。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是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

象前一章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崩溃时代，资本主义是无法拯救的，因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拒绝执行自己资本主义的、创造资本的职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是这种创造资本的职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职能。这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才有可能。^①只有无产阶级从被剥削的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时候才有可能恢复劳动过程即社会再生产。

在这种范围内和在这种基础上，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总的来说，形式上来说，即不管过程的社会内容来说，是同摆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进行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任务一样的，即节省一切资源，

^① 资产阶级教授们写了大量关于“社会化”的“著作”，当然，都避开这个基本问题不谈。请参看卡·毕歇尔：《社会化》，第2版，杜宾根1919年版。奥托·诺伊拉特：《社会化的实质和道路》。卡·梯什卡教授：《经济生活的社会化》，耶拿1919年版。也可参看奥托·鲍威尔的著作；鲁道夫·哥特谢德：《经济社会化还是国家破产》。在国外的共产主义著作中，我们只能举出匈牙利同志，一位工程师尤雷斯·黑费齐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然性》，维也纳1919年版。

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并尽一切可能加以集中。穷竭是战争的结果和崩溃时期生产过程连续性遭到破坏的结果，从社会-组织的技术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穷竭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需要提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怎样能有一个哪怕是相对平衡的体系，或者准确些说，怎样能够创造向这种平衡运动的条件，这样就可以了解集中化的和形式上社会化的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生产资源的减缩即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促使实行有计划、有调节、有组织的经济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是内在的经济逻辑，这种逻辑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结构下决不会消失，相反将更加强烈地被感觉到。劳动过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继续下去。大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不被剥夺和收归国有。最后，经济的穷竭将更强烈地促使实行社会经济过程合理化的方法。^① 这些条件总括起来要求一种，并且仅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工人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转形为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它继续存在的条件的东西，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它需要实践上予以解决的一个组织任务。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它必须重新教育自己。这个任务只有用特殊的方法，即组织工作的方法才能解决。不过这些方法已经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好了。

^① 鲁道夫·哥特谢德十分机智地抨击“领袖们”的怯懦立场：“我们几极不能相信，这样明显不可靠的论据现在能够阻挡经济社会化的加紧进行。例如，有些人认为，当一切生产和交往停滞，并缺乏必要的经营手段时，最不适宜实行经济的社会化。相反，在市场情况繁荣的时候，人们会说，万事顺利。这是十分明显，用不着实验的事情。人们对于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容易地加以说明。但是在经营衰落，经济的改造不可避免的时候，最先应该实行的，无疑是把个人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的社会化或国家的破产》，维也纳1919年版，第11页）。请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这是一位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写的。

当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少年时期的基础是单个的私有经济单位——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经济过程几乎完全是自发地进行的；因为活动着的不是有组织的集体，不是阶级主体，而是分散的，但却是十分积极的“个体”。所以毫不奇怪，这个时代的口号是“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资本主义不是被建设起来的，而是它自我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系，是无产阶级这个有组织的集体主体建设起来的。如果说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自发的，那末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就是说，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因为缔造它的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成长为马克思所说的“revolutionäre Assoziation”** 的阶级。因此，建设共产主义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工作的时代；无产阶级将解决自己的任务，建设新社会的社会技术任务，这一任务自觉地提出并自觉地得到解决。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商品拜物教和它半神秘的范畴也就消失了。①“社会主义革命将提出社会主义方法(决不是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作为防止社会崩溃，保全、甚至扩大经济基础的更完善(比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关系积极的和有意识的干涉，拯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方法将是这种积极组织过程的继续，但仅仅是为了拯救和发展自由的社会。起初，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能做到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新的节约，直接地拯救社会；接着开始恢复生产力；然后导至

* 自由放任。——译者注

** 革命的联合。——译者注

① 资产阶级学者深深地中了拜物教的毒，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混乱认作是最好的情况。例如彼·司徒卢威先生根本否认经济过程有合理化的可能，他信奉“这一过程基本的和内在的二元论的科学信念”(《经济 and 价格》第1卷第60页)。真是 *der Wunsch ist Vater des Gedankens!* (愿望是思想之父！)

生产力新的、更高的发展。在这条道路上，将一步一步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建设社会主义，它既是一种强大的大生产，又是一种明朗的、单纯的、自由的社会关系的体系。”^①

什么是革命过程的“阶段论”呢？对这个问题需要给以回答。因为一系列的荒谬观念正是由于不了解各个阶段更替的规律性。

德国工程师海尔曼·贝克^②“在反驳”马克思时断言，“社会灾变(革命)不是经济上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正如“反军国主义”革命的例子所表明的，这里“本应在一连串事件(Entwicklungsreihe)末尾发生的统治关系的更替(Machtverschiebung)，却在一开始就实现了。”但是不难看出革命过程的基本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是历史的 prius*；这种冲突在“无产阶级造反”中获得了自己主体-阶级的表现，也就是说，以一定的方式决定阶级的意志。推动力来自经济领域，准确点说，来自生产力和经济外壳之间的冲突。随后就开始灾难性的迅速“反作用”，从意识形态范围转向生产力，而且在这个过程期间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平衡的条件。这一辩证过程经过这样一些阶段：^③

1. 意识形态革命。经济条件破坏了国内和平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认清自己是一个应当成为主人的阶级。“工人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被粉碎了。代替它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将来

① 尼·奥辛斯基：《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载于《国民经济》第6—7期合刊，第5页(1918年)。马克思十分清楚地看到灾变和转形期的长期性。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自己的话说：“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5页)。

② 海尔曼·贝克：《前言》(《社会化的道路和目标》第10—12页)。附带说一说，贝克先生对革命的解解释完全仿效已停刊的《新生活》。

* 推动力。——译者注

③ 宽里茨曼同志在《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任务》这篇十分机智的文章中，第一次表达了这种说法(《国民经济》，1918年第5期)。

行动的“工作计划”。

2. 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转化为行动,转化为国内战争,转化为争取政权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整个国家机器的庞大组织被摧毁。代替它的是一种崭新的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苏维埃共和国。

3. 经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集中了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是经济变革的强大杠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打碎了。旧的经济结构不再存在。完整无缺的联系被强制地砍断了(“剥夺者被剥夺”)。旧体系的要素被吸收到新的结合之中,在长久的和痛苦的过程中诞生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奠定了。

4. 技术革命。社会结构改组所获得的相对的社会平衡保证生产力有可能正确地起作用——虽然初期是在狭窄的基地上。下一个阶段就是技术方法的革命,即增加生产力,改变和迅速改善合理化的社会技术。

不言而喻,当我们谈到这些革命发展的阶段时,指的是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心、它的主要特征、这个阶段的典型特点。在这种范围内,用演绎法得出的规律性又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得到它的最初的经验证明。不理解各个时期的这种更替,就会得出十分荒谬的和在理论上无知的结论。^①

^① 十分遗憾,罗·尤·维德尔教授最近(1918年)的“著作”是这种理论上无知的典型,在《知识就是力量》——那里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欧洲文明的毁灭》一书中,可敬的教授对发展的前景一窍不通,却概括过程的最初阶段,因此讲的那些东西十分可笑。“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心的丧失……很快就爆发社会革命这一期待的破灭……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没落尚未到来……”(《骄傲时代的破灭》,论文集,第75页)。这是在1918年出版的!在《社会主义还是小市民》这篇文章中,勇敢的作者不仅批评巴黎公社,而且对它最优秀部分进行造谣中伤,名义上说的是巴黎公社社员,实际上描写的是俄国共产党员,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原则。十分清楚，最初的时代必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它在形式上将会同资产阶级专政时代相似，就是说，是翻过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辩证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在新的基础上的平衡的最一般条件。存在着遭到强烈破坏的生产的物质技术骨骼(集中的生产资料,其中一部分先在帝国主义战争,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为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所破坏,同时也由于人的技术机构的瓦解遭到损失)。但这是属于生产力的。在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着技术-社会等级阶梯的业已解体的环节-阶层。我们知道,崩溃时期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消灭要素;它意味着消灭要素之间的联系。要素本身部分地也消灭了(由于内战、穷竭、过早的耗损、营养不良等),但这并不是崩溃时期的基本方面。同样可以说,(在工人之间,阶级内部的关系中;在工程技术人员即“新的中等阶层”成员之间,等等)多少保存着集团内部的联系。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这些联系在无产阶级中间,在某些方面甚至在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这个时期十分紧张和十分迅速地教育自己,团结自己,组织自己。因此,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整个大厦的骨架。但是社会生产组织问题在于各种旧要素的新的结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那部分实质上是凌驾于生产之上的上层分子(他们的生产地位表现为他们是在生产之外的,如各种食利者、剪息票者^②),他们对建设来说是无用的;他们要末死亡,要

“正是现在,当许多工厂主已经离开城市,从而‘压迫工人的剥削者’已经消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公社社员;应该作布尔什维克)不想促使人们去努力劳动,为什么他们纵容懒散和没完没了的旷工”等等,等等。在1920年,在实行劳动军、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杰出的人物”,教授谦逊地自认就是这样的人物,确实有鸡的“智力”,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是这样。

② 关于他们的特征,见尼·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未被其它集团所吸收。其次，组织者类型的原资产阶级以及处于他们之下的技术知识分子，显然是建设时期所必需的材料；这是组织的和科学技术的经验的社会结晶。显然，这两个范畴应当从新给以配置。怎样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在结构上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熟时期“专家”问题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旧型式的社会联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和心理的凝结物留在这种范畴的人们头脑之中。他们怎么也抛弃不了“健全的资本主义”这种固执的思想。因此，清除这些技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旧式联系，是使新的社会生产结合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

这种“清除”过程是十分痛苦和十分难受的。它会引起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的消灭。技术知识分子为正在瓦解的和被强制地砍断的旧式联系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他们抗拒社会生产阶层的新型结合，因为在这里占首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技术职能作用是同它作为社会阶级集团的垄断地位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地位只有在资本统治下才能是 *a la longue** 垄断地位。因此这个阶层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革命的建设阶段内部的基本问题就是克服这种反抗。工人阶级不断地对自己实行再教育，并且继续“*Bildung der revolutionären Assoziation*”** 的过程，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下，全部工作就落在工人阶级和由革命斗争的整个进程培养出来的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肩上。新的结合，就是说技术知识分子隶属于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怠工情况下，通过无产阶级的强制来实现。只有随着这个社会范畴头脑中积累起来的旧式联系的清

* 长期的。——译者注

** 建立革命的联合。——译者注

除和慢慢地吸收新的关系和新式联系，体系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这里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分析新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既然生产过程的逻辑本身要求完全固定的联系型式，一般说来，人员的技术生产要素怎么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合呢？要知道一个工程师或技术员是不能不向工人下指示的，因此，他应该是处于他们之上的。同样，红军中的旧军官不可能不处于这支军队的普通战士之上。无论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是内在的、纯技术的、业务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是应该保存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这里需要注意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的一系列情况。

首先，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对生产实现无产阶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有范畴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消失了。技术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着生产过程的组织者的职能，而从社会角度看，同时又是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收入的特殊范畴——的传动机制。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技术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执行着资产阶级的总的任务。技术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等级中的空间上的一定地位同它作为榨取剩余价值工具的职能是相符的。随着资产阶级专政辩证地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技术职能也就由资本主义的职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职能了，而创造剩余价值则转化为创造（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用于扩大再生产基金的剩余产品。与此同时联系的基本型式也改变了，虽然在等级表中知识分子仍旧保持着“中间”地位。因为最高的国家-经济权力^①乃是无产阶级的集

^① 我们用“国家-经济”这个词是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同“政治”融合起来，而国家失去了纯政治性质，并成为经济管理的机关。

中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技术知识分子一方面站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之上，但另一方面它归根结底又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无产阶级国家-经济组织就是这种意志的表现。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转化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表现在生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上，尽管生产等级体系的一些东西在形式上还保存着，但整个这种体系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了，有了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结构的性质^①。同时，这种体系既然破坏了等级的社会阶层性质，也就能导致消灭整个等级。

第二、技术知识分子在暂时地事实上退出生产过程后，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就能比较稳定地共处。只有从技术知识分子集体头脑中清除掉那些积累起来的旧联系，技术知识分子才能够坚定地复归。因而，进入新的社会-技术大厦的是按照盲人赫拉克利特的全部规则内心获得新生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复归不是重复走过的道路，而是一种辩证的过程。^②

^① “资本主义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工业和商业领导者阶级’”（马克思），这些人组成了在资产阶级身边，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特殊专家范畴。这些工业官僚不直接属于资本家阶级，但却以密切的关系同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受的教育，从资产阶级那里领取部长们的薪俸，参与创业利润和分取红利，并把自己的“积蓄”投资于股票和股份，随着资本在股份公司中失去个性，随着善于利用别人资本经营谋利的人拥有愈来愈大的影响，这些工业官僚就愈来愈紧密地参加资本家的“家族”，并同这一家族的利害休戚与共。

因此，要他们服务——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就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彻底地铲除他们赖以生长的那种土壤即环境。“不能使他们仍然处于过去的社会联系之中”（尼·奥辛斯基，前引书，第54—55页）。还可参看姆·维恩德里包特同志的文章《托拉斯和辛迪加以及现代的生产联合》，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特别是第31页。

^② 从这一观点来看，十分清楚，在诺斯克-谢德曼政府挽留旧专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吸引这些人参加建设事业之间是有原则性差别的。在那边，在民主化的资产阶级政权下，他们被纳入他们过去的“社会联系”之中，在这里，在无产阶级统治下，他们被放到另一种联系之中。在那边，他们仍然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在这里，他们只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地位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新的心理状态。奥辛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

第三、既然建立起人员机构的新的体系，那末——从上面整个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机构的基础定然是在资本主义环境和在阶级搏斗的呼啸声中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苏维埃，工会，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工厂委员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拥有较多的在组织-技术上熟练的工人为干部的各种专门的经济组织。现在这是自下而上提升起来的总的“*revolutionäre Assoziation*”的基本网。但同时这也是这样一个圈子的人，在这个圈子的空隙中也有技术知识分子起着作用。从前技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大组织家组成了上层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组成了经济管理体系（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国家资本主义管理机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基本结构是从下面提升起来的、并重新受过教育的各种无产阶级组织的不同联合体。

最后，第四、在这种体系中，技术知识分子开始失去自己的社会阶层性质，因为在无产阶级中间一批又一批新的阶层成长起来了，它们逐渐同“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并肩而立。

通过这种途径又重新确立起社会的平衡。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客观困难，但无产阶级的统治以及它的自我教育和自觉纪律，保证了劳动过程的可能性。结构的平衡是通过社会-生产的人的要素和知识分子服从无产阶级国家最高领导的途径来达到的。

我们现在稍稍详细地来考察一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行政经济和行政技术机构的一般结构问题。在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有资产阶级组织（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等）从属于国家

指出：“不能容许他们（即‘专家’）成为敌对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人”（前引书，第56页）。在知识分子辩证地“复归”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技术知识分子的这种复归预先要求清除他们旧的社会生产联系和旧的意识形态。读者当然会理解，我们讲的不是限界十分明确的时期，而是变动的过程，“趋势”。

政权，并同国家政权融成一体。在摧毁资产阶级专政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时，这些行政机构也一起被摧毁。旧社会的托拉斯、国家调节机关等组织发生瓦解。通常（我们在前一章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组织不可能作为“完整的机构”拿过来。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起过自己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些有时是十分巧妙的组织的全部极其复杂的综合系列用自己的触角掌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客观上起了加强和加速生产资料集中和无产阶级集中过程的螺丝钉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瓦解时，它们的物质技术骨骼、物的骨骼留了下来。正如从总的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首先接收的是集中的生产资料，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骨骼，它主要表现为机器体系和（如马克思所说）机构的“脉管体系”，同样，无产阶级在这里掌握的不是旧的行政体系的人的部分，而是物的部分（建筑物，事务所，办公室，打字机，所有各种各样的用具；容易查找的登记册，最后各种各样的物质示意设备，例如图表、模型等等）^①。除了其它“集中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这些东西之后，它就建设自己的机构，各种工人组织为这种机构提供了基础。

工人阶级拥有下列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它由夺取政权的工具变成政权的工具；共产主义变革的政党——它是无产阶级行动的 *spiritus rector**；工会——它们由同企业主作斗争的工具变成管理生产的机关之一；合作社——它由同中间商作斗争的

^① 贝克工程师在《组织科学体系》一书中，把“技术手段”分为两类：相互理解的手段（“*Verständigungsmittel*”）和活动手段（“*Betätigungsmittel*”，特别是劳动工具）。附带说说，属于相互理解手段的有，“符号，色彩，绘画，文字和语言”（《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38页）。俄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文中演绎得出的原理。最老的辛迪加之一，糖业辛迪加，一直到各个工厂组织全都垮台了。其它部门同样如此。关于冶金业可参看维恩德里波特前引文章，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和9—10期。

* 推动力。——译者注

工具变成国家一般分配机构中的一个组织；各工厂委员会或类似组织（在德国是“Betriebsräte”，在英国是“workers committees”和“shop stewards committees”）。——它们由工人同当地企业主作斗争的机关变成一般生产管理的基层辅助组织。

这些组织，以及在这些组织基础上专门建立的崭新的组织的网组成新机构的组织脊梁。①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工人组织职能的辩证变化。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置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力量。②

现在我们应当提出无产阶级机构组织体系的一般原则问题，也就是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十分清楚，这里在形式上工人阶级所需要的那个方法，与国家资本主义时

① 格·策彼罗维奇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俄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书第2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莫斯科1919年版）中清楚地表明，“有机”时代的习惯观念是怎样地煎熬着甚至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们。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管理的经济组织不是新的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机构的派生机构。但是他自己引用的实际材料，每一行都同这个看法直接矛盾，并且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逻辑上这同对时代的总的估价方面存在着可怕的理论混乱有关，这一点我们将有机会在别的章节中加以讨论。举几个例子。策彼罗维奇同志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这样写的：“由工人组织代表组成的，并且只有得到党中央信任的人领导的这些国内经济管理的上层机关，实质上是临时政府经济委员会的继承者”（指克伦斯基之流的政府）。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理解“实质上”的继承呢？非常清楚，这里是彻底破坏旧的组织，并且建立崭新的组织。“实质”只在于管理的职能。但是，策彼罗维奇同志无论是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辛迪加，还是托拉斯，都把它们看作是旧机构。这些机构只是“本身内容……应当作重大的改变”（第170页）。策彼罗维奇同志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生产联合，这完全是另一种组织机构，它们是在死亡了的、崩溃了的、瓦解了的资本主义机构的遗骸上成长起来的。我们建议读者从这个角度去仔细研究策彼罗维奇著作的最后几章，以便再次确认旧观念的明显幼稚性。

②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断言，职能的改变就是阶级特征的改变，这是直接嘲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无产阶级在专政时代进行着阶级斗争，但是它是作为统治阶级，作为组织者和创造者的阶级，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对一切“健全的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来说却是百思不解的东西。

代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法是相同的。这个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隶属于无所不包的组织，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从转形过程的内在逻辑本身中产生的。工人机构的最基层组织应当变成一般组织过程的体现者，而一般组织过程是在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中，即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中得到物质表现的工人阶级集体智慧有计划地指导和领导的。^①例如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辩证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

任何一种新的结构都不能在它成为客观必然性以前诞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崩溃把社会引入了死胡同，停止了生产过程，社会生存的自身基础。生产过程的恢复只有在无产阶级统治下才有可能，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客观必然性。

新诞生的社会的稳定只有在一切有组织力量最大限度的结合、联系和共同行动下，才有可能达到。因此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全体工人的机构的一般形式同样是必需的。新而和谐的社会的大厦从战争的腥风血雨中、从混乱和废墟中、从贫困和破产中成长起来。

^① 愚蠢的“批评家们”喜欢从右的方面嘲笑我们的协会、报纸、节日，说它们是“衙门式”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衙门是工人阶级的衙门，对这一点他们却可耻地保持沉默。这只不过用来掩盖希望“衙门”永远处在无产阶级阶级敌人手中的强烈的愿望。

第五章

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1. 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和农业。2. 生产关系和农业。3. 国家资本主义和农业。4. 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城市和乡村。5. 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原则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①

马克思的这个说明，在过渡时期必需比任何时候予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时期，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事先维持一定的相对比例关系——因为讲的是为整个体系的平衡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的分配——条件下，如果说在这个时期可以就生产过程的抽象形式，即将这一过程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来加以考察的话，那末现在这样做就不够了。

实物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此同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各种“具体”劳动部门，并且首先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体系中这两个部门之间增长着的比例失调关系早在战前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帝国主义式地寻求“经济补充”，即为工业国寻求农业基地——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曾讲过的“城市”和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0页）。

“乡村”之间那个矛盾的表现，不过已具有世界规模了。^①原料问题——当代的基本问题——和粮食问题是最尖锐的问题。所有这些使我们把城市和乡村问题作为需要作特别分析的问题列出来。

首先我们应当考察一下，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是怎样地影响到农业的。

我们先孤立地考察这一过程。不言而喻，这里实质上可以看到与工业方面的同样现象。战争夺去了大量的生产力；它把劳动力调作别用，使之脱离生产劳动；它夺走了农具；它使农业丧失畜力，减少牲畜数量和肥料数量；它缩小可耕地面积；它夺走了在农业中能比在工业中相对地说起更大作用的劳动力（因为这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从而缩小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生产基础的缩小表现为产品产量的下降。这就是总的情景。

但是农业再生产过程在现实中并不是单个的和孤立的再生产过程。这是总过程的一部分，总过程的前提则是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可见，既然谈的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那末农业生产就取决于工业的再生产条件（机器，劳动工具，人造肥料，电力的供给等等）。工业中的消极扩大再生产加剧了农业中的类似过程。反之，消费资料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要素，消费资料量的下降又加剧了工业中的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作为统一的过程，消极扩大再生产表现为产品总量（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消费资料）的不断下降。

生产基础的缩小，在这里反常地表现为农业的货币“赢利”的

^① 从这里决不应当象考茨基所想的（见他在《新时代》上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那样认为，帝国主义的根源仅仅在这一领域。从再生产角度看，公式中的三个部分的变化都是重要的

$$\underbrace{G \text{---} W \text{(生产资料+劳动力)} \text{.....} P \text{.....} W'}_{\text{(一)}} \text{---} \underbrace{G'}_{\text{(三)}}$$

公式的第一部分相当于“原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第二部分相当于资本投资范围，最后，第三部分相当于销售市场。在这三个领域中都发生着变化，因此，各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沿着这三个方向进行的。

提高。^①但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会引起工业品价格的同样上涨（而照例甚至要提高得更多）。虽然如此，农业在战争时间却迅速地摆脱了债务，积累了货币形态的资本，并建立了产品贮备。这个矛盾，象雷德列教授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可以用下列情况加以说明：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产品实际产量减少的结果，而其产量的减少又使农业根本不可能得到工业品。由此可见，农业的生产基础比工业的生产基础保持得好一些，农业虽然处在消极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但它拥有的产品量相对地说，比工业要多得多。这是十分重要的差别，它也不可能不在资本主义体系瓦解时期表现出来。

然而，最重要的差别是这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经济结构。这一结构的特点是经济型式的极端多样性，这反映和表现出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较低。在这里我们大体上可以分出这样一些范畴：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济；资本主义农民经济（“富农”，“Grossbauer”），它同样使用雇佣劳动和靠雇佣劳动而存在；“劳动”农民经济，它不剥削雇佣劳动；最后，是半无产阶级的小农经济。这些型式中人员之间关系的不同的结合造成了各色各样的情景。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我们看到大致与工业中相同的生产-

^① 艾米尔·雷德列（《战争中经济的重新配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战争和经济》，第7卷，1918年，第34页）引用下表来说明“赢利的变化”：

	总收入	费用 (Kosten)	纯收入
战前.....	100	75	25
现在的最低限.....	200	95	105
平均概率.....	250	95	155
最高限.....	300	95	205

“在投机买卖中价格会更高……所以收入将会更多”。因为“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和固定价格之间的差额不断增大，所以十分清楚，实际的“Verschiebung”（“变化”）要大得多。

社会等级：大地产的经济结构总的来说与工厂的结构是相同的；上层是资本家-企业主；其次是主要管理人(经理)；然后是熟练的知识分子(农艺师,会计师等)；再低一层是“职员”；在职员之后的是熟练工人(从事农业机器,运输,电站等工作),最后是“壮工”。在富农或 Grossbauer 经济中则是另一种相互关系,那里生产阶梯通常限于两个范畴:主人和工人。“劳动”经济没有等级阶梯,而半无产阶级经济则以自己的人员组成另一种经济——大地产或工厂等级阶梯的最低梯阶。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知道,能够决定生产立即合理化的基本因素是(不管这一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劳动。因此十分清楚,连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于农业也应当采取略为不同的“组织形式”。

很清楚,对资产阶级来说,迫切需要使农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农业——特别是在震荡时期——是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生活可以不要礼服、电灯或书籍,但不能没有粮食。军队可以光着脚,但它不能饿着肚子。因此促使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因素特别强大。而与此同时,立即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资本主义怎样解决这个任务呢?

两种办法:第一、部分大生产单位国家化;第二、通过流通过程间接调节生产过程。

从以上所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第一种方法的相对“弱点”。诚然,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支配了农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例如国营森林),但它却没有例如象工业中的托拉斯那样的据点。因此生产的直接资产阶级国家化的规模相对地说比较小,而通常是在各种“地方公有化”和“市有化”的形式上实行的。因此,第二种方法,即通过调节流通过程或组织分配来调节生产的办法,具有更大的意义。国家粮食垄断制、农产品配给制、产品义务交售制、固定价格、

工业品有组织的销售,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是要使生产向国家化方面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为落后的发展型式,看到了组织过程的开始阶段,正象在工业中一样,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正是流通过程(科奈尔*、瑞恩**、辛迪加)。

在这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能够依靠特殊类型的辛迪加式的农业联合组织,首先是依靠合作社。整个农业生产的机制,甚至包括细小的个体经济,通过对流通过程的调节实际上也得到了调节。农产品“自由贸易”的体系从根本上被破坏了。诚然,农业的特殊条件,中小商品生产经济的巨大比重也在这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表现在“非法的”“自由”市场上、投机的黑市交易(德国人叫作 Schleichhandel)上;但是只要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体系是巩固的,农业终究会被纳入总的机构,有组织的工业则是这种机构的基本部分①。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论点: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既然以工业中的生产关系瓦解作为出发点,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在农业方面遭到崩溃。

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腐朽在这里表现为农产品投机贸易的经常性中断。联结的革命中断在最初阶段促进了城乡的分离。

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可以看出城乡间的这类联系:1)信贷货

* 囤积投机。——译者注

** 资本主义最简单的垄断形式之一,短期售价协定。——译者注

① 俄文方面可参考尤·拉林同志的小册子:《最低纲领主义的空想者和现实》,“社会主义者”书籍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拉林同志在这本小册子中十分正确地指出:“一句话,如果农业本身在组织方面内部还不够成熟的话,那末现代德国……资本主义倒是蓄积了足够的物质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能够从上面和从外面把农业联合和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计划地管理的机体。换句话说,不应当从必须预先使每个经济部门都各自达到技术组织上的成熟这个观点来考察一国在物质上的‘成熟程度’,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从全部生产力的平均的一般状况中滋生出来的东西”(第17—18页)。

币、金融资本型式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银行系统); 2) 国家和公社的组织机构; 3) 城乡间部分通过和借助于组织机构、部分不通过这些机构而进行的最实际的交换过程。现在让我们来考察,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 城乡间的关系方面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 信贷货币和金融资本型式的联系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被掐断了。银行一旦被占领, 信贷关系就中断了, 并且再也谈不上任何“信贷的恢复”了, 因为习惯关系的整个基本体系已经破坏, 任何“信用”都已消失, 而按照资产阶级的看法, 无产阶级国家乃是集体的强盗。

国家和市政机构在旧式国家机制几乎全部瓦解的时候, 也同样瓦解成各个组成要素。那种表现工业统治农业和城市统治乡村(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机构不再作为一种严整的组织体系而存在。

最后, 表现“国民经济”统一的实际交换过程, 其规模大大缩小。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瓦解作了详细的分析之后,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 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已经破坏了交换的基础, 把城市投放的产品量, 也就是乡村必需的实际的产品的等价物缩减到最低限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崩溃, 生产过程几乎停止了; 人们靠还是在战争中保留下来的并由无产阶级所继承的旧的贮备、剩余物资过活。在“正常”时期是足值的货币, 也最终显露出自己是一种没有独立价值的中介符号。因此, 对握有大量农产品的人来说, 几乎失去了把这些产品运送到城市去的任何刺激。社会经济分裂为两个自主的领域: 饥饿的城市和拥有——尽管其生产力遭到了部分的破坏——相当大量无处销售的“剩余”产品的乡村。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瓦解达到了自己的极点。“社会经济史”的这个阶段表现为社会劳动两个主要

部门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继续生存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转而研究新的平衡条件之前，需要考察一下“乡村”自身内部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基本形式。

在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下列原理：在“乡村”相对的稳定和拥有相当大量的产品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内部关系的瓦解过程一定进行得慢得多；另一方面，既然在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所没有的那种多样性的经济结构，那末，转化过程的形式本身在这个过程的一切阶段都会不同于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分析过的那个过程。

我们先来谈谈资本主义大经济。在这里，联系的断绝过程与工业中所发生的情形最为相似。然而，在形式上有某些不同。第一，在这里这一过程比在城市里要进行得慢些。这是因为在农业中，在生产消费资料的地方，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表现得并不那么尖锐。转到部分的实物报酬制，实际上就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对断绝体系人员之间的联系的刺激就大大地减小。第二，在这里无产阶级本身远没有受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机制”的“严格的训练”。它的成员（半无产阶级成分），劳动方法（劳动的季节性，在劳动过程中空间上的极大的隔绝状态等）——所有这些都妨碍它的思想革命化和制订“革命的工作计划”。但是这些因素只能使总的发展路线放慢，却不能否定这条路线。城市和工业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外部推动力，来加强独立发展的过程，而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裂，即按照工业中的那条路线发生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①

^①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最新小册子《农业的社会化》（柏林，保罗·卡西列出版社1919年版）中写道，“城市中的革命，不可能不影响农村的工人。当他们也卷入罢工热的时候，那是十分不幸的……”（第10页）。当考茨基接着提出警告，反对在农业工人中瓜分大田庄，这是对的。但是反对“罢工热”，这就等于对普鲁士大地主卑躬屈节。在乡村推翻资本主义，正如在城市推翻资本主义一样，是总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农业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象考茨基所说的“罢工热”，象有个

但是，乡村生产关系的破裂还按照其它方向进行，这是由乡村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决定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一部分人员机制（小农户的半无产阶级业主）本身是资本主义等级中的最下层环节；其它一些成分（“中农”，“劳动农民”）则不仅是市场上大经济的“竞争者”；他们在十分复杂和形形色色关系（租金，高利盘剥，依附农业银行等）的隐蔽的和掩饰的形式中，常常成为剥削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等级里下层和中下层成分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格局中是没有地位的，并且它也不是社会化的劳动，而只是这种劳动的附属物。可是这种形式的比重却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在它的具体总和中来考察整个社会体系的。当体系中附属的最下层环节是由大量的独立农户组成时，生产联系的这种性质也就决定着联系的瓦解型式，在这里，这种型式表现为农户之间的斗争，即以劳动农民和半无产者为一方，以大农和半地主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斗争着的成份的具体结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取决于不同经济型式的比重，取决于这些型式的变异（因为这是经常变动的、过渡性的，具有许多细微差别的范畴）。就本身说，如果离开全部其它经济复合体，这种联系的破裂也包含着回复到更为原始的形式的可能性，因为在这里积极的力量正是小私有者的分散的劳动，而不是无产者的社会化劳动。但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演进中，联系的这种破裂是资本主义体系崩溃总过程的组成部分^②。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关系

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所说的“罢工狂”），工人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地主——即使他是冯·杜能——不会自愿地实施那怕是考茨基的纲领。不了解这个道理，排除阶级斗争，是考茨基之流的主要罪过。还可参看奥托·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

② 这里在上面描述的过程和发达的宗主国与它们殖民地联系瓦解之间，可以进行类比。如果孤立地看待下面这个过程，那末殖民地的起义本身客观上包含着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可能性。但是在现象的总体中，这是副产品，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制度崩溃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崩溃是人类社会主义复兴的先决条件。

越不发展，这种革命的意义就愈大。这种斗争会引起而且通常总是引起力量的巨大浪费和物质生产基础的分散（部分地瓜分大地产、农具、牲畜等），^①也就是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取得新的平衡：一方面是农业本身内部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城乡间的平衡。

这个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②

我们已经知道，新平衡的一般型式，应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条件下的倒过来的（辩证的否定）平衡型式。

我们首先来考察农业内部的过程。

大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的人员间联系的破裂应当由这些人员新结合的组织来代替。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和工业方面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是它由于两方面的因素而复杂化了：第一、资本主义大经济作为一般大经济部分地遭到破坏；第二、农业无产阶级本身的成熟程度要低得多。第一方面在农民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很清楚，让步的大小视农民的一般比重和农民分为不同范畴的情况而有很大的摆动。第二种情况将在组织内部造成大量的磨擦；无产阶级自我教育过程的进程较慢。

至于农业生产其它部门中的平衡，那末它有一种在作为发展

① 参看哥伊赫巴尔格同志的文章《农业的社会化》，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5期；又米柳亭，《社会主义和农业》；尼·波格丹诺夫，《苏维埃经济组织》，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

② 因此考茨基说得对，他写道（《农业的社会化》，序言，第12页）：

“土地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最复杂的革命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问题。”然而，考茨基的整个不幸也正是在于他恰恰看不见和不懂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在他看来，基本的“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各个社会集团的阶级斗争都是没有的。他所以有这种观点，从逻辑上看，在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关系和技术劳动关系。

的起点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建立平衡的趋势。非常清楚，如果撇开城市中的发展不管，那末这种状况本来是会给“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周期提供推动力的。但是，在城市中消灭商品经济和工业中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会落空。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伴随有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这二者之间的隐蔽的或比较公开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城市的组织作用能采取哪些形式呢？并且怎样才能城乡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呢？

显然，只有城乡间“新陈代谢”的实际过程才能是城市发挥决定作用的牢固而稳定的基础。因此，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更新，在社会主义格式下工业的复兴，是较为迅速地使农村卷入组织化过程的必要条件。

但是，既然工业的复兴本身要受生活资料大量流入城市这一因素的制约，那末十分明显，这种流入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平衡”，只有靠 1) 留在城市里的部分资源和 2) 国家-无产阶级的强制才能达到。这种国家的强制(没收余粮、实行实物税或采取某种其他形式)是有经济上的根据的：第一，直接的原因——农民自己希望发展工业，从工业得到农业机器、工具、人造肥料、电力等等；第二，间接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防止大地主、高利贷者、银行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等的经济压制得以恢复的最好手段。可见，在这里，国家强制并非杜林式的“纯粹暴力”，从这一点说，它是实行发展整个经济这条主要路线的因素。^① 由于工业无产阶级是依靠形式上社会化的（由无产阶

^① “社会学家”考茨基绝对不懂得这一点。他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的小册子(《农业的社会化》)序言中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允许农民随意经营(第10页)；这里考茨基暴露出自己的全然无知(因为他甚至连苏维埃经济也不懂得)。可是在下一页(第11页)他却抨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压制”农民，夺走余粮养活城市和军队。“聪明

级实行国家化的)大经济的,所以它也就直接组织着生产过程。缺乏农具也可能刺激部分农户在生产上联合起来(农业公社、共耕社、劳动组合)。但是,对于小生产者的主要群众来说,要使他们加入有组织的机构,主要就得通过流通领域,即形式上采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时的办法。^②国家和公社(在理论上不应把公社同国家机关对立起来)的分配和采购机关就是新体系平衡的主要机构。

在这里,产生了关于这样一些农民组织的问题,它们还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就在流通过程中,即在农业合作社中把分散的生产者连结在一起。因为对农业中资本主义体系联系瓦解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小生产在这一瓦解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稳定性。诚然,农业合作社有转变成在资本家地主上层领导下的农业辛迪加的趋势,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完全变成这样的辛迪加了。所以合作社机构也会受到损害。同样地十分清楚,合作社的某些形式也必定要垮台——信用合作社的命运就是这样。但同时毫无疑问,农民经济的稳定性必定会在农民合作机构的相对稳定上得到表现。农民合作机构今后的命运如何?它是否会象辛迪加和托拉斯那样,必然地要瓦解?或者不会瓦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更加周密地详尽研究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作为不同经济型式的阶级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斗争。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

的”考茨基连反对邓尼金战争的意义都不懂得,不懂得连最愚昧无知的农民都懂得的东西。对革命共产主义政党的赤裸裸仇恨,支配了这种“规矩的家庭”出身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思想。

^② “由于小生产的优势,它(即社会化。——布哈林注)的方针,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是调整城乡间的流通过程多于组织生产。”(考茨基,前引书,第9页)。

无产阶级。”^①“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的。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投机小贩和奸商进行投机活动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②争取还是反对商品市场的斗争，是为生产型式而进行的隐蔽的斗争，大体上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城乡间相互关系中形成的那种经济环境。这里同城市中发生的情况，有深刻的差别。在城市，为经济型式而进行的主要斗争是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的。在农村，如果就战胜大资本主义来说，那末这一斗争正在结束。但同时也可以说这一斗争正在——通过其它形式——复活，这就是体现着社会化劳动的无产阶级要实行国家计划，而体现着分散的私有制和市场自发势力的农民要保持商品的无政府状态和猖獗的投机活动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既然简单商品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那末上述两种趋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但由于农民本身的胸中长着两颗“心”，而且他愈穷，无产阶级倾向的比重就愈大，所以这种斗争也因农民本身的内部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状况怎样影响到农民的合作机构的命运呢？很明显，这里的情况同工业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合作机构可能萎缩（在城乡交换这种联系日益减弱的情况下）；它可能遭到破坏（在富农在乡村占优势的情况下和富农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它可能被吸收到一般社会主义分配组织中去而逐步得到改造（在产品交换的实际过程得到更新和城市起决定性的经济作用的情况

① 尼·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第890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88页〕。

② 同上，第891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89页〕。

下)。因此,在这里,机构的完全瓦解在理论上不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新的平衡是在不断的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它的确立过程是缓慢的和痛苦的。工业中再生产恢复得愈快,无产阶级开始实行最深刻的任务——技术革命愈迅速,这个过程进行得就愈快,技术革命彻底改变着经济的保守形式,并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以强有力的推动。但是这个题目已经是属于下一章的范围了。

第六章

生产力,革命的耗费和技术变革

1. 生产力的概念。2. 生产力和社会性再生产。3. 生产力和危机。4. 生产力和战争。5. 生产力和革命。6. 无产阶级革命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条件。7. 无产阶级革命的耗费。8. 无产阶级革命耗费的形式和生产力的下降。9. 新的社会平衡和技术变革。10. 技术变革的方法。11. 技术变革,城市 and 乡村。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一般地涉及生产力和革命的耗费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因为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估计。因为社会的生产力、其水平及其运动归根到底决定着全部社会现象。而一切结构上的平衡,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社会体系的人员之间的平衡,其稳定性取决于社会和外界环境之间的一定平衡,取决于其性质决定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平衡。

但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生产力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如果想一般地根据分工来说明特殊劳动工具即机器的产生,这是同历史有明显矛盾的。机器就象那拉犁的牛一样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应当算作生产力(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不是机器,而是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厂才是一个经济(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范畴,即

生产上的社会关系。”^①

显然，马克思这里说的生产力是指生产中物的和个人的要素，根据这一点，生产力范畴就不是经济范畴，而是技术范畴。另一方面，我们从他那里也可找到生产力的另一定义。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里，马克思在许多地方使用的“生产力”这个名词，意思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完全一样。^②然而，马克思在把社会劳动生产率叫做生产力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劳动力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如果在分析的最初阶段可以依据不明确的概念的话，那末嗣后就会感到概念不准确所引起的后果。

首先，这一概念的含意是什么？在讲到生产力的时候，是要用它来说明人控制自然界的程度，掌握这一自然界的程度。归根到底，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所达到的发展阶段。首先需要从这一观点看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阿列克谢也夫译，圣彼得堡 1906 年第 3 版，第 134 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按照布哈林的俄译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译文为：“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27—128 页。）——译者注。

^② 例如参看《资本论》第 1 卷普及本第 451、541—543 及以后各页；第 3 卷第 1 部，这里对平均利润率作了分析。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愈快，剩余价值所囊括的消费资料和积累资金就愈多”。（第 539—540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663 页〕。或者讲得更明确些：“被亚·斯密叫做固定资本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充分执行职能，不过它们是逐渐被消耗掉并且一步一步把它们价值转移到商品上去，一步一步地帮助产品的生产的。它们是衡量生产力进步的真正尺度。”（第 543 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

《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卷第 498 页也是这样说的：“生产力或劳动能力。”相反地，“生产力”（“生产资料”）——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 47 页。

一看马克思的定义相互间的关系。洛贝尔图斯建议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他在《社会问题概论》一书中写道：“需要把生产力同生产率严格区分开来。生产率指的是生产力的功效或有益效果。如果用二十个工人代替十个工人去工作，或者用两台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机器去代替一台同样的机器，那末生产力就提高一倍；如果十个工人生产了迄今二十个工人生产的东西，或者一台并不比另一台大的机器，生产效率却比它大一倍，这就是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劳动在这里也是最后的尺度。较大量的劳动就是较大的生产力；在同样数量的劳动下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就是生产率的提高。”^①问题的这种提法，相当清楚地表明了生产力概念“不明确”的原因；原来，这是一个介于技术和经济之间的边缘性概念。在经济上，重要的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在技术上，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物质等价物，即现存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同一个数学量 $\frac{M}{a+b}$ 的两个方面，这里M等于产品总量，按有用之物的随便什么单位（能量的量或别的什么，在这里都无所谓）来计算；a和b是社会劳动的单位，其中a是死劳动的单位，b是活劳动的单位。如果从“物的”观点看这个公式，那末我们就拥有1.不同种类的产品量；2.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量；3.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量。这三个量是互相依存的，在这里根本的因素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分为劳动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原料、辅助物等等）。这两者本身又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的。具体的生产资料一般要求有相应数量的、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的劳动力，因为生产过程有它自己的技术逻辑，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生产中的物的和人的要素是按照完全一定的形式和完全

^① 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社会问题概论》，第60—61页，注释。另见本书第3章所开的关于生产力的参考书。

一定的比例相互联系着的。但是,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本身在其物的规定性上分为互相制约的两个部分。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生产资料的积极部分,即劳动工具、社会的技术体系作为分析的基本点。如马克思所说的,正是生产资料的这个部分“是生产力进步的真正尺度”。

因此,如果我们说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或退步,那末我们指的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下降;如果我们说生产力的分配和重新分配,我们说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和重新分配;如果我们说实际上消灭生产力,我们说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如果我们需要给生产力下一个社会学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的技术体系,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可变“要素”。

然而, $\frac{M}{a+b}$ 公式中各部分的这种相互联系(在这里 a 和 b 表示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劳动力的现存量)的前提是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即平稳的动的平衡状态。一旦破坏了社会平衡,就会失去这些量在技术上的既定比例性(从而,用一个量取代另一个量的可能性)。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和过去一样用 $\frac{M}{a+b}$ 来表示。但是 (a) 已不再表示生产资料的全部现存量, (b) 也不是劳动力的全部现存量(即可以使用的量); (a) 和 (b) 的比例关系在正常条件下是一个既定的、技术上确定了量,而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了。

生产力的变动是同生产的变动,即再生产的过程联系着的。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体)在这个过程中 *in natura** 被再生产出来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因此,根据再生产的观点, $\frac{M}{a+b}$ 公式应当从 (a) 和 (b) , 即再生产过

* 在实物形态上。——译者注

程中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a)和(b)在这里不是孤立的总体,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机地联系着的量。它们只有进入劳动过程,才能成为生产力的直接组成部分。

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一条稳定上升的曲线。相反,即使 a priori* 也应明白,在对抗性社会,在建立在生产和社会无政府状态之上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不断地发展。因为在这种社会,平衡规律是通过经常的或定期重复出现的破坏平衡的途径实现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平衡的恢复是以平衡的破坏作为出发点的。而由于平衡的每一次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其作用就在于在更广泛的,但同时也是更为深刻的矛盾的基础上恢复平衡)都是同生产力的下降联系着的,所以不言而喻,在对抗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定期破坏才有可能。

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①

这种对矛盾的“强制平衡”,即新的平衡的条件的建立,伴随着生产力的破坏。新的平衡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旧的矛盾,等等。因此,从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过程。^②每一次都是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并且是在愈来愈大

* 直觉地。——译者注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582页。〕

② 本书作者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一书中着重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的规模之上建立新的平衡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出色地分析了这种消灭生产力的主要形式，并且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现实的物的（‘实物的’）角度和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价值的）角度。

“说到危机引起的资本的破坏，要区别两种情况。

只要再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实际资本就会被消灭。不使用的机器不是资本。不使用的劳动等于失去了的生产。闲置不用的原料不是资本。不使用的使用价值（以及新制造的机器）或没有最后完成的使用价值，长期堆积在仓库中的商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破坏。这一切无非是表示再生产过程的停滞，表示现有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没有起生产资料的作用……这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它们的交换价值都化为乌有。

但是，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贬低……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的下降。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破坏。一个人亏损了的东西，被另一个人赚了去。……至于纯粹的虚拟资本（公债券、股票等）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或者不破坏再生产的过程，那末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①

但是，由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再生产过程“一般地”也遭到破坏，所以这里也出现物的形式的资本的破坏。另一方面，由危机加速的资本集中创造了继续运动的“高级形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是以其暂时的和局部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以降低其水平为代价的。

^①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第2卷第2册第267—26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565—566页〕。

实际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竞争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这种竞争是以社会生产的分散性为基础的。如果存在合理的调节体系，那末就会依照必要的比例按部门和企业来分配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自觉的调节者。因此，平衡规律——价值规律——作为自发的规律起作用，“象房屋倒在人头上时的重力定律”一样。但正因为它是社会自发势力的盲目规律，所以它只能通过不断的破坏才能得到实现。在这里平衡的破坏是建立新平衡的必要条件，而在新的平衡之后接着又是破坏，等等。不断破坏平衡，通过破坏平衡又不断实现平衡，这些波动的机制是竞争的机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生产力的不断浪费换来的。这种浪费（“竞争的耗费”）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动的平衡这一链条上的每个新环节是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在集中过程的基础上再生产这种平衡的。

也必须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战争，因为战争不过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竞争的方法。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联合竞争的方法。因此，战争的耗费不过是集中过程的耗费。既然这些耗费并不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破产，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它们就起着正面的作用。

一般说来，危机也好，竞争也好，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从生产力下降时再生产过程的诸环节的角度；从该生产体系的再生产的角度，这时生产力的暂时下降本身是其继续向前运动的条件；从旧体系的破产和社会转化的角度，这时旧体系的矛盾把旧体系炸成粉碎，而破产的耗费则转变成革命的耗费。

这种革命的耗费本身可以从物质生产力遭到破坏的那些再生产周期的 *sub specie** 来考察，或者从向能消除生产力的发展同

* 角度。——译者注

其结构的“桎梏”之间的矛盾、较有生产成效的新社会结构过渡的 *sub specie* 来考察。向作为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形式”的新结构过渡，如果不使生产力暂时下降，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过巨大正面作用的一切革命的经验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靠生产力的巨大耗损和破坏换来的。既然说的是革命，事情就不能不是这样。① 因为生产关系即人的劳动机构的“外壳”是在革命中“爆炸” (*wird gesprengt*) 的，这就意味着而且也不能不意味着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从而也就是生产力的破坏。

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事情绝对是这样，——那末 *a priori** 必须明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有生产力的巨大衰落，因为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把破坏旧关系和按新方式改造旧关系进行

① 美国的国内战争所引起的破坏是人所共知的，这次战争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革命时代的破坏是人所共知的，经过生产力的严重衰落时期，它又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法国革命运动中的最积极成份雅各宾分子受到现代共产党人所受到的完全相同的指责。下面是刺杀马拉的凶手沙罗塔·科尔德案件的摘录：

“出于什么动机使您决定采取如此可怕的行动？”

“他的罪行。”

“您指责他犯了哪些罪行？”

“他在全法国点燃的国内战争使法国破产。”

“您提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

“他过去的罪行是他目前罪行的标志。是他安排了九月大屠杀；是他维持了国内战争的炮火，以便被任命为独裁者和别的什么，还是他侵犯人民的主权，造成今年5月31日逮捕和监禁国民公会代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法庭》。当代人的回忆和文件。塔尔列教授编，第1册第59页）。

难道雅各宾党革命者和反革命的女吉伦特党人之间的对话不正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话”的原型吗？无怪乎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预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者要分裂成“山岳党”和“吉伦特党”。这个预言以天文学的准确性得到了证实，考茨基之流完全穿上了有德行的，然而并不太聪明的吉伦特分子的服装。有个时候考茨基曾经为雅各宾分子辩护。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Nous avons schange tout cela*”（这一切我们早就变过来了）。

* 首先。——译者注

得这样深，这样透。尽管如此，恰恰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由于经济外壳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能相容而产生的。世界的生产力同社会的国家民族结构不相容，于是矛盾就用战争来“解决”。战争本身是同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的生存不相容的，所以矛盾只有用革命才能解决——真正解决。^①

只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②才能拯救这个社会并推动它继续发展。但是，工人阶级只有付出牺牲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牺牲是正在破裂的资本主义“外壳”进行反抗所必然造成的，而资本主义“外壳”的体现者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③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是由共产主义变革的深度，生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所决定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根本性改变，因为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类型的法律表现的私有制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应，在革命后取得了社会平衡；在经济领域只是对从前的东西作某些修正，在政治领域则是把政权从一种类型的私有者之手转到另一种类型的私有者之手。因此，这里非常清楚，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衰落，这种衰落在根本、彻底地摧

① 列·克里茨曼同志（见他的论文《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载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年》文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版第70页）说得完全对，“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生产力（机器、材料等等）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是用愤怒来回报威胁它的破坏的。危机时期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激发生命义愤的时期。资产阶级想用破坏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办法来减少耗费和减少属于资产阶级的劳动力的不工作状态，靠牺牲无产阶级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危机，而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不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反抗。”（作者原加着重号）

②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40页：“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60页）。

③ 从这个观点看，“谴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造成破坏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正是工人阶级才是使社会能够复原的力量。“旧制度”的反抗，这才是应对过渡时期的破坏“负责的罪魁”。

毁旧的关系时是不可避免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规律。^①

革命的一切实际耗费都归结为再生产过程的缩小和生产力的下降。这些耗费按形式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I. 生产要素在物质上的消灭。这里包括消灭生产资料(工厂、机器、铁路、设施、牲畜等等)；在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进行国内战争和阶级战争过程中消灭人力——工人等等；消灭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由于使用不良、暗中破坏以及某些零件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损坏；消灭技术知识分子(在国内战争中，由于经济崩溃等等的普遍后果)。

很清楚，这里说的一方面是消灭生产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是消灭生产的人的要素。

II. 生产要素失去专门技能。这里应包括机器和一般生产资料用旧使坏；工人阶级(体力上)的衰竭；技术知识分子劳动力失去专门技能；向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代用品”过渡(无产阶级中妇女、非纯无产阶级成份等等占很大比重)。

III. 生产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这里包括上面详细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劳动体系的解体，社会分裂，各种平衡的破坏，它们导致再生产过程的暂时瘫痪；这里还包括城乡联系的解体，国家间联系的解体，等等。在这种解体过程中不仅整个劳动机构中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批评家”先生们把经济破坏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不成熟的证据。从我们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最“成熟的”关系下(暂时的)破坏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批评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56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马克思立即由此做出结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尤·拉林同志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最低纲领主义的空想者和现实》中在理论上已经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生产力的下降。

的人力部分，而且物质部分都脱离实际生产：这时机器、其“体系”、整批工厂“停工”，它们实际上是消失了。生产力在这里并没有在物质上被消灭，但是它变成了潜在的生产力。它们 *in natura** 存在着，但是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

生产力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是过渡时期生产力水平下降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它是同社会的结构改组联系着并且是实际上不可分割的，是从这种改组中必然产生的，因而必须作为理论分析的中心。这里还应当列入改组本身的其他耗费：例如开始时工人阶级不善于“掌握”生产要素，建设时期的“错误”等等，即用于社会劳动机构改组的全部能量，加上这一过程的全部 *faux frais***。

IV. 重新分配生产力，把它们集中到非生产性消费方面。这里首先必须看到为满足国内的和阶级的社会主义战争的需要服务。在革命过程扩展为世界革命过程的情况下，国内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在无产阶级方面进行这种战争的是正规的“红军”。非常清楚，从再生产的最近几个周期来看，象任何其他战争一样，这种战争的耗费造成同样的经济穷竭。能够进行这样的战争，是因为结构的组织过程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着。但是既然战争在继续，那末因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而造成的生产力下降也在继续。这种战争不仅要求有物质的资源：它还夺去优秀的人员、工人行政管理组织和组织者。

不难看出，在上述所有场合事情归结为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中断、停止，而有时甚至瘫痪，这等于生产力的下降，“否认”这一点，就象“否认”革命过程本身一样，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阐明这种下降的职能意义。在这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有的“确认”，有的否认这些事实，而在

* 在实物形态上。——译者注

** 意外开支。——译者注

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这些现象，然而唯一正确的（因而也是公认的）方法是从转变过程的角度，即不仅从社会再生产的近期周期，而且从巨大的历史范围的广泛角度来看待生产力的暂时下降。

不言而喻，由于生产力下降的过程表现于生产要素的直接消灭，所以战争期间生产力缩减得愈厉害，这过程就显得愈可怜。后一原因所造成的生产力下降是同它们的“革命的”下降联系着的：战争和革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所引起的爆炸，在社会转变过程中是连结在一起的。^①

① 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莫斯科1919年版第64页）在《工业的革命瓦解》一章中用下列因素的影响来解释它：1. 由于开采减产和运输瘫痪造成的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完全紊乱；2. 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影响致使劳动普遍无组织和许多原因致使生产率下降造成的劳动危机；3. 物质方面以及管理技术方面技术上的无组织状态……；4. 市场的极端不稳定和衰落……；5. 由于工业在技术上的无组织和财政破产……造成的复员的灾难性过程；6. 由于劳动工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供应的完全紊乱、银行的国有化等等造成的工业的财政破产。”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包括在我们的分类法之中。但是，格里涅韦茨基先生不是归咎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进行的战争和对新社会的反抗，而是归咎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当然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看法，在他看来，“战后前景”的繁荣是资本主义前景的繁荣。实际上，欧洲的“粮食独裁者”Mr. Hoover〔胡佛先生〕所说的同样如此（见《国民食物》1919年8月13日）：“整个欧洲在签订和约时的经济困难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生产力瓦解’。没有必要去详细考察生产力下降的原因。它大体如下：

工业和商业的解体最初起因于战争，但是由于停战期间为政治上的改组进行了斗争，由于创建新政府（它们都缺乏经验）和这些政府之间在改组经济关系时发生的磨擦，这种解体还在继续。

工人坚持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要求对于管理自己的劳动有发言权。这种要求是正当的，不幸的是（!!!），它同这样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了：把劳动强度限制在客观所必需的程度以下，就会增加就业总人数或者改进工人的状况。

居民的一大部分由于缺乏生活必需品，由于战争中精神上 and 肉体上过分劳累，因而体力衰竭，由此引起的反射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

设备和工具遭到了破坏，组织上也遭受了损失……这是由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人手也减少了……不过从整个情况来说，这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煤的生产解体了……人手的损失和煤矿或其设备在物质上的限制只是造成解体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停止生产力的下降不可能始于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生产平衡之前。这是恢复再生产过程的最必要的条件。只有在对人的劳动机构进行改造——这种改造要消灭发展生产力的障碍，突破由“发展的形式”变成“发展的桎梏”的“外壳”——以后，才可能出现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技术变革，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而是人的集体同外部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变革。

在这里，开始时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积累”^②的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产实质何在？就在于资产阶级政权动员了大量的居民群众，掠夺他们，把他们变成无产者，使他们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生产无产阶级，这就是原始积累时期的“实质”。“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Umwälzungen)，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vogelfreie”)无产者抛向市场。”^③这样，资

很小一部分原因。最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人的因素，即劳动强度的限制。

继续维持封锁……无疑甚至使开放国家的企业经营也受到了破坏……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政治上、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混乱。”

在关于战后世界经济状况的经济综合报告中，工程师罗德写道：《世界经济的黑夜和早晨》(开姆尼斯“捕鸟者和制绳人”工业出版社版)：“现在一切只能依靠德国工人。在出口部门的工人还在罢工的时候谈论恢复出口，这听起来简直是一种讽刺。”(第49页)美国金融家万德利普的证词也与此类似。参看A·捷连科的报告：《关于在北美的俄国合作社贷款问题备忘录》。当然，所有这些先生们只看到“工人阶级的懒惰”，而看不到企业主的怠工。他们天真地认为，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只是由工人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而资本家则坐在“全人类的”宝座上严格地维护“生产的利益”，“独立自在的”、“纯粹生产”的利益。然而，实际上纯粹生产的理性具有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一切特点，这种实践理性有着钱袋的叮铃响声而同柏拉图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② 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术语(在《真理周刊》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普及本第647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22页]。顺便指出，译者通常把“vogelfrei”一词天真地译成“象鸟一样自由”。

本通过掠夺、阶级暴力和抢劫动员了生产力，使之成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但是，从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必然应该是从动员活的生产力开始的。这种劳动动员乃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要素，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辩证否定。它的阶级实质不在于为剥削过程创造前提，而在于在消灭剥削的条件下恢复经济；不在于对一小撮资本家施用暴力，而在于劳动群众的自我组织。

上面我们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瓦解过程的不仅是活的生产力的消灭或失去专门技能，而且还使活的劳动力完全脱离劳动过程。因此非常明显，无产阶级着手恢复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应该从动员脱离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开始。但是它不能局限于这一点。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无产阶级继承到遭受严重损害的物质机器的技术骨骼时，活的劳动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向普遍义务劳动制过渡，即把广大非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纳入无产阶级国家劳动过程是绝对必要的。^① 创造集体的、有效的、活的群众性生产力是继续工作的起点。起初，最重要的劳动部门是运输，燃料、原料和粮食的采购。^② 由此开始发展的上升路线，随之出现的将是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专利“权”和营业秘密，统一计划等等，使向电力过渡成为可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下对土地及其一切“附属部分”（瀑布、河流、泥炭矿层等等）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集团的垄断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

① 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② 这种任务在任何社会类型的经济复兴中在技术上都是必要的。例如参看格里涅布茨基：前引书；谢·伊·古谢夫：《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迎接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还可参看俄共中央委员会迎接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经济生活报》。

展,甚至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使用电力,建造新的电力站等等都遇到私有制所规定的界线^①,那末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后将是真正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技术的革命。“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这完全正确地说明了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技术特征。^②

工业的电气化,大型电力站的建设,广大的运输网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它不仅将促使分散的小私有者成为社会性工作者,它还将使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合理化并使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它用最新技术去取代原始的,几乎是野蛮时代的工具,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的不成比例现象,工农业发展之间的不成比例现象,这种不成比例现象是由于存在地租和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它在战前就已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③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卡·考茨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J·黑费齐《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技术上的必然性》。

② 见电气技术工程师和专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论俄国工业电气化的出色的小册子。还有收在文集《社会化的道路和目标》中的W·A·弥勒:《农业运输的社会化》。

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归因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地肥率递减”的“自然”“规律”。尼·列宁同志的著作《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有对这一“规律”的出色分析。资产阶级科学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从而用自然的范畴偷换社会范畴——这就是这种“科学”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部分第280页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对技术发展作了全面评述:“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土地上被赶走为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16页。〕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乡村生活”特有的“愚蠢”状态也将消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分布将取决于最合适的自然条件(接近燃料、原料的产地,等等)。“Standart des Industrie”* 问题将在没有资本主义壁障下得到解决,而生产力的发展将迈开大步坚定地稳步前进。

* 工业标准。——译者注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一般组织形式

1. 国家资本主义。2. 社会主义专政体系。3. 社会化*。4. 国有化。5. 市有化。6. 社会化的其他形式。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则上”抽象地脱离开生产过程的历史社会形式。因此对它来说，一定社会形态的统治、剥削、阶级特征等等关系是“不重要的”。毫不奇怪，这种“原则性”只是把在实践中对资产阶级不无好处的、不可思议的理论混乱提到“原则”的高度。正是在战时和战后时期，这种混乱达到了顶点。它首先表现为把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粗暴地混为一谈。

威纳尔·桑巴特在《社会主义的基础及其批判》^①的导言中对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是带有反盲目求利倾向的实践上的社会合理性”。这个不配称为定义的“定义”有深刻的文献根源。因为存在着一种成为牢固偏见的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把柏拉图的奴隶主“共产主义”、洛贝尔图斯的普鲁士容克“国家社会主义”、战争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

* 此处原文为“Социализация(обобществление)”，本书均译作“社会化”。——译者注

① 威纳尔·桑巴特：《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批判》，柏林阿斯塔尼出版社1919年版第1册第7页。

主义混为一谈，其充分的根据就是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具有“带有反盲目求利倾向的社会合理性”。但是很明显，这种观点决不比在战时对帝国主义所下的既幼稚又狡猾的愚蠢定义好一些，按照这个定义，帝国主义是一种超历史的，有时甚至是普遍的生理机能。^①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在逻辑上是由于以“普遍”、“整体”、“社会整体”及其他漂亮词句的名义出现的国家的阶级特征被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被抹煞了。生产关系只是从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制度这个角度来考察的。但是，由于这一公式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经济结构类型，既适合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类型，也适合于有计划地调节关系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不管这种关系是否具有阶级的或非阶级的特征，因此很明显，正因为这一公式太一般了，包括了就阶级特征而论直接对立的社会结构，所以是不中用的。

如果我们现在来谈国家资本主义，那末我们就会看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特殊的和纯历史的范畴，尽管其中既有“社会合理性”，也有“反盲目求利倾向”。因为它同时也是形式之一，是一种最“完善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生产关系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时决不能荒谬地抛开这个基本的阶级特征。从社会力量的对比来看，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多倍式（自乘）权力，在这里，资本的统治取得了强大的力量，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力量。^②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的统治下，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

^① 一个法国作家对帝国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帝国主义是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靠牺牲其他生命形式实行扩张的意愿。根据这个观点，一只母鸡，即使不下金蛋，只啄取谷子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因为它“吞并了”这颗谷子。

^② 参看我的文章：《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载于《共产党人》第3期，1918年5月16日出版，第9页。

生产过程的合理化。

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合体，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显然谈不上任何“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原则上就排除这种可能性的。^①

无产阶级国家在存在之初，在“剥夺剥夺者”以前要调节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活动，“合理地准备”这种剥夺，以便保持所有“机构”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是可以提出这种形式的可能性问题的。如果这种体系是可能的，那末这不会是资本主义，因为后者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不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高表现，而是革命发展中的某种过渡阶段。但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允许有这种形式是建立在非常流行的幻想之上的——似乎无产阶级能够“掌握”全部资本主义机构，又不触动其资本主义贞操，而资本家老爷们也能够甘心情愿地服从无产阶级政权的一切命令。因此，这里是以事先排除任何平衡的条件下的平衡状态为前提的。^②

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果这个名词没有被通常的使用所糟蹋）的社会主义专政体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对立。

① 这个看来如此明白的思想，却不为许多同志所理解。例如策彼罗维奇同志在上面引用过的关于俄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著作中关于十月革命后的时期写道：“甚至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准备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工人同时也是生产的主人……。”（前引书第170页）工人怎么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成为“生产的主人”——这自然是谁也无法理解的，因为这种奇怪的体系同干的水毫无二致。当然，它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而不是“存在”于“对大家都是重要的”现实之中。波雅尔可夫同志曾在《五金工人通报》（彼得格勒1918年1月出版）中对这个体系下了更为“精确的”定义，把它说成是工人阶级应在“没有企业主”下建成的“展开的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基本概念不清所导致的荒唐公式。更不必说资产阶级的和妥协主义的文献通篇充满着更为恼人的混乱。

② 见尼·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载于《共产国际》第9期（《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94—602页）。

在这里，生产关系的类型起了根本改变，资本在生产中的最高权力被消灭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之基础——所有制关系改变了。这里也存在着“带有反盲目求利倾向的社会合理性”，但是这些特点是建立在全然不同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就完全改变了生产过程的整个性质。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国家，集合的、集体的资本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生产过程是落入资本家阶级之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并具有把这种价值变为剩余产品的趋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是一小撮寡头剥削群众的一切形式中最为完善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使任何剥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它把集体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私人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集体的无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尽管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在这里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①这种对立也决定了上述两

^① 最近在外国出版的相当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都避开这一基本问题。只要举出弗兰茨·奥伦堡：《社会化的类型和阶段。一种意见》，慕尼黑—莱比锡，敦克尔和洪堡出版社1920年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在第5页上作者对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这包括对为全体人民而生产和分配的领导，包括对由全体人民来生产和分配的领导。”在第6页上他也区分了下列阶段：第二节标题下——“把成熟的企业转入全体之手；完全社会化（国家化）”；第3节标题下——全体参与经济生活；合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要象这位令人尊敬的德国研究家那样，在如此少的“博学的”几行里写出如此多的谬论，这是难以“做到”的。他把“社会整体”既看作“一般”国家，即世界上不存在的国家，也看作明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化”，仅此而已；另一方面，“Vollsozialisierung”（“完全社会化”）是Verstaatlichung（国家化）；按照奥伦堡的意见，完全“社会化”不同于不完全“社会化”，正如社会化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按部门排列、分类和分列的！鲁道夫·哥特谢德在他的专门阐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对此也一窍不通。见鲁·哥特谢德：《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解决国债问题的财政社会学论文》，维也纳—莱比锡1917年第4版和第5版。在奥托·诺伊拉特的一篇极有意思的报告《社会化的实质和道路》中，作者企图避

种体系的一切职能的对立,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似的。例如,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下,普遍劳动义务制是对工人群众的奴役;相反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它不过是群众的劳动自我组织;把工业动员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加强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巩固社会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结构中,一切形式的国家强制都是压榨,它保障、扩大和加深剥削过程,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强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总而言之,形式上相似的现象在职能上的对立,在这里整个地取决于组织体系在职能上的对立,取决于组织体系的对立的阶级特征。^②

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渡时期的一种形式,而是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是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都是充分和谐地建立起来的。只有在这里才第一次出现绝对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进化的道路“成熟”成为共产主义,同社会的国家组织一起消亡。

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集中起来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杠杆完成的。借以完成这一过渡的措施的体系通常是用“社会化”“социализация”或“обобщест-

开问题的实质。他说他对社会化需要什么样的实力手段这个问题是不感兴趣的。然而,他已接近问题的正确提法,比博学的饶舌者和卖弄风情的蠢巴特要站得高得多。参看如下的话,“社会化的前提是,经济计划由某个起决定作用的中心来实现。这种管理经济不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例如它能够保证特权者集团具有较好的生活状况。在斯巴达,一种管理经济保证斯巴达人得到奴隶的劳动收益……我们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分配的管理经济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4页,作者原加着重号)然而,取消“实力手段”,即阶级斗争和阶级问题,却使问题的整个提法模糊不清了。

^② 顺便说说,社会民主党庸人对共产党提出的所有“责难”,都源于不了解这种情况。这些先生们最多也只是反对“果天托特人的道德”,从而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野蛮之间建立原则“平等”。事实上,难道“民主派”能够否认狼和羊的“平等生存权”吗?要知道,如果这样,那就是破坏神圣的正义!

вление”^①这个名词来表示的。从以上所述就已清楚，这个名词并不十分确切。如果社会化是指整个劳动过程满足社会的需要，即满足作为体系的全社会的需要，那末这种“社会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曾经有过。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劳动”正是这个意思。洛贝尔图斯在提出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本质这一论点的时候，也肯定了这一点。可是，很明显，现在说的并非这一点。这里说的是能在根本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类型的那些措施。换句话说，“剥夺剥夺者”也应当是社会化过程的内容。因此，社会化指的是把生产资料转入社会之手。然而正是这里表现出这个名词的某种不确切之处。因为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自觉的经济主体不是“全社会”，而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仅如此，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末，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愈来愈小，最后完全消失。这样也就给“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②如

① 用这个名词来代替“剥夺剥夺者”和“没收”，这是国际妥协主义思想的特色。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把“社会化”同声名狼藉的“整体”联结在一起，也就是把资本的国家政权的措施也包括到“社会化”里去。尤其可参看埃德蒙德·费舍的著作。

② 奥托·鲍威尔在其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中把社会化同国家化对立起来，把社会化看作是由工人、职员、官吏为一方，消费者为另一方，作为中立者的国家为第三方这三者的代表组成的机关的联合；许多措施中的一项是把工厂租赁给农业合作社（即辛迪加）。专政问题没有象应有那样提出来；国家是“一般民主”。在瓦·冯·拉特瑙那里，这种十足的资产阶级观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他看来，“社会化”将这样实行：生产集中于专职的资本家集团手中。关于这种“社会化理论”，卡尔·梯什卡博士（前引书第25页）正确地指出，这种观念乃是中世纪行会的复活。然而梯什卡教授本人对社会化的阶级实质也毫不理解。在海尔曼·贝克《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那里，社会化过程的主体也是“有利害关系的企业主同盟”（第51页）。在德国工程师代表会议上，普兰格博士在辩论中把这种结构叫做“高尚的资本主义”，这就暴露了他的全部意图。埃·费舍（《从私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白痴，一直在玩弄社会化的概念，把它用于两种相同的含义，依靠这种戏法获得出色的结论：社会化早已有之。奥本海默教授很好地理解了问题之所在，用不成熟的理论来捍卫资本主义阵地。对他来说，凡是现在力图搞社会化的人，就是“暴乱分子”、“布朗基分子”等等。

果我们把社会化理解为把生产资料转交给作为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之手，那末就会产生这种转交的具体形式问题。我们在前几章已经在实质上考察过这个问题。这里只需把反对共产主义变革的人所经常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很明显，既然在过渡时期经济主体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那末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式就是生产的国家化或民族化^①。然而，非常清楚，“一般”国家化(民族化)掩盖着由国家本身的阶级特征所决定的全然不同的物质阶级内容。如果不象资产阶级科学界的代表所做的那样把国家机构看作具有中立的神秘特性的组织，那就必须认为，国家的一切职能都是有阶级性的。由此可见，必须把资产阶级民族化同无产阶级民族化严格区分开来。资产阶级民族化导致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无产阶级民族化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形态。正如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对立面，无产阶级民族化是资产阶级民族化的否定、完全的对立面。

关于各种形式的“市有化”、“地方公有化”等等也必须这样说。把这一概念同国家化概念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极端不正确的。因为所谓“地方自治”的体系在任何阶级社会(从而，在存在着国家的社会)里，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的地方机关的组成部分。^②国家政权的一定阶级特征造成这种政权的地方机关具有同样的一定阶级特征。因此，必须象对待不同类别的“民族化”那样，把无产

^① 后一个名词当然是非常不确切的。首先，它把“民族”(“整体”)同国家，即统治阶级的组织，混淆起来了。其次，它带有民族国家时代的烙印。我们保留这个名词，是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尽管它在逻辑上缺乏存在的理由。(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我国一般译作“国有化”，这里一律按照俄文直译为“民族化”。——译者注)

^② 所谓“市有社会主义”的幻想就是由于对此不理解造成的。当然，在资本主义瓦解和革命过程中，在无组织的发动中，无产阶级夺取个别地区，在资本的国家政权下实行无产阶级的“市有化”是可能的。但每个读者都很容易理解，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范畴。本文所讲的则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体系。

阶级的市有化同资产阶级的市有化严格区别开来。

不言而喻，除了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直接掌握生产过程的这些基本形式以外，还有这同一过程的一系列低级形式（特别是对农村而言）。这里同无产阶级国家的联系较少，但毕竟存在联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推翻旧制度和建设新制度的杠杆。因此归根到底，一切形式的社会化过程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

第八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

1. 国家的阶级性质和管理的方法。2. 在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时期的无产阶级工业管理。3. 在危机时期的无产阶级工业管理(“军事化”)。4. 在转变时期不同阶段的管理和管理训练。5. 可能的发展进程。

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的不同职能意义是由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和国家政权的不同阶级特点所决定的。^①有一种观念认为,一定的阶级在细节上都是同唯一的、不变的管理形式联系着的,这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可能处于不同条件之下,管理的方法和形式必须适应这种条件。管理的方法和形式是由技术合理性的标准所决定的,并且不同的形式具有相同的阶级内容,——既然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和国家政权的一定阶级性质业已确定。

资产阶级的实践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从“广泛民主”的形式转向限制议会权力,采取“小内阁”制度,加强总统的作用,等等。但是限制“议会权力”和“议会制的危机”是否等于限制资产阶级的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呢?丝毫

^① 请比较恩·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不是。相反地，这些现象标志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其政权的集权化和军国主义化，正是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这在帝国主义时代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斯宾塞认为，“工业国家”实质上应是反军国主义的，因为黷武主义是封建制度的特点，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点变成了普遍的形式。世界性的竞争斗争把全部发展置于战争的标志之下，迫使资产阶级改变自己的统治形式。但是，只有庸俗思想家才会在这里面看到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甚至极其错误地把所谓“个人政制”同阶级统治对立起来。相反地，在种种条件的一定配合下，阶级统治恰恰在个人政制上可以得到最合适的表现。例如表现为专制制度的地主统治就是这样。国内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这时它在“圣剑”专政中找到了自己的最完善的（即适合时局条件的）表现。管理形式的改变在工业管理领域也可以看到，它取决于技术合理性的需要。

但是，如果这些原理一般地是正确的，那末它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来说也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应当严格根据发展的具体阶段去观察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工业管理的不同体系。只有用这种观察方法才能理解在该体系固定的阶级“本质”的范围内管理形式的必要更替，不同管理体系的不可避免的不同方案。

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和破坏时期，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掌握经济上的战略枢纽的时期。一般地说，这一时期的开始早于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各阶段（其意识形态阶段，政治阶段，经济阶段，技术阶段）的界线并不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时期“套”一个时期的。为生产的社会化而斗争，即为无产阶级的工厂而斗争，是同革命浪潮的增长并行地自下而上

地全线展开的。它表现在：象革命的“工厂委员会”（俄国）、“生产委员会”（德国的“Betriebsrate”）或在斗争过程中团结工人阶级的代表机关和有时是广泛的委员制机关这样一些组织往旧体系打入楔子并劈开它。首先必须分析这一阶段。

在所考察的时期，社会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是决不可能再在旧的基础上保持任何平衡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作为一般规律在这一时期跟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技术知识分子对“安排好生产”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防止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上。工厂愈来愈成为“没有主人的”工厂。最先企图给放上新“主人”——工人阶级——的，就是上述无产阶级组织。这种广泛的委员制、工厂委员会体系是不是技术上最完善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它的职能作用根本不在这里。在所考察的时期，问题在于采取初步的措施建立新的平衡，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建设真正较为完善的形式。甚至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者也认为管理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本家组织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①在这里，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只在于探索新的平衡体系。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根本不可能把“完善的技术管理”作为当前任务提出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不仅是物质要素，还有人力要素的某种稳定。而在所考察的时期恰恰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前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毕竟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实际上人的技术-劳动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因此同企业中缺乏任何组织基础，经济机构陷于完全紊乱比起来，工人基层组织在工厂“夺权”，即使从“纯生产”的逻辑来看，也是件好事。夺权从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具有无可

^① 例如请比较泰罗制。

估量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工人阶级作为组织基础用于生产过程。按实质来说，这里的任务是经济上的战斗任务：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这种体系必然伴随着广泛的委员制、彻底的选举原则（并且这种选举是在政治旗帜下，而不是在技术工龄的旗帜下进行的）、频繁的更迭和由于广泛的委员制造成的分权和责任分散，所以在技术上远不是完善的。^①但是，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巩固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阵地，它建立自己的基层管理机构，这些基层机构相互间迅速建立联系，同早在“资本主义怀抱”中就已成熟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结在一起并通过这种途径建立无产阶级经济机构的新组织。旧的瓦解，新的粗具轮廓，——这就是上面分析的生产管理形式。

在这里，同军队中进行的过程作类比是恰当的。提出广泛的选举制原则以取代帝国主义的严格的隶属系统：在军队机构的一切环节建立无数的委员会；军队问题成为广泛讨论和争论的对象；“旧政权”在军队中威信扫地和动摇瓦解；新的机关并且通过它们新的阶级成了政权的真正枢纽。这个过程的主观意义何在？首要的和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旧军队的瓦解和被摧毁。其次是通过摧毁旧军队而得以教育和造就未来无产阶级军队的积极的组织力量。谁也不会断言团队委员会会使军队成为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要知道客观任务并不是要维持旧军队的战斗力。相反地，是要瓦解其战斗力并为另一种机构培养力量。

然而，尽管两种过程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还是有一点巨大的差异。在生产中保持着整个过程的巨大连续性。之所以是这样，是

^① 因此，当奥托·诺伊拉特说“Ausschüsse”（“委员会”或“理事会”）就其结构而言不适于纯事务性的生产职能时他是正确的（另见弗·奥伦堡前引书）。但是所有这些“批评家”都根本不懂——或者佯装不懂——这些过渡形式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必要意义。工程师海尔曼·贝克（前引书）正确地提出了问题。

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已经提供了未来生产机构的基础，首先是工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军事组织。因此在军事领域中，发展是以巨大的飞跃进行的，整个过程表现得更为显著、猛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更为革命。

无产阶级的军事化生产的类型同上述情况有显著不同。任何组织的“军事化”类型都是当该体系处于危机状态时出现的。在战争中无论是战斗机构(军队)的各个部分，还是其“整体”都经常处于毁灭的威胁之中。所以在这里这一组织的存在条件本身要求这一组织有非常明确的类型：高度的准确性，无条件和绝对执行命令，当机立断，意志统一，因而最低限度的讨论和谈论，最低限度的委员制，最大限度的一长制。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组织的成份不是内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不是由自身去执行全部决定的，所以军队是依靠惩罚制度的，正是在这一领域惩罚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在士兵是从那些本身同战争无利害关系的分子中招募来的情况下，在战争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惩罚因素必然特别强有力。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样。但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强制和惩罚因素也起着巨大作用，非纯无产阶级分子的百分比愈大，无产阶级中间不觉悟或半觉悟的分子的百分比愈大，这种作用也就愈大。^①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军事化”^②——首先是在军队组织中——

① 如果民兵制是指理想的民兵制，在这里大家都象乐队成员听从指挥的指挥棒那样自愿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那末恩格斯的话对它就完全适用了：“只有以共产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有教养的社会，才能十分接近民兵制度，但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完全达到。”（转引自弗·梅林：《马克思传》，彼得堡，国家出版社 1920 年版第 242 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2 卷第 21 页〕）。

② 实际上“军事化”之类的名词在这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无论无产阶级国家的军事组织还是军事形式的工业组织，在这里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红色军国主义”，实在是一种不纯正的词组。但是语言的贫乏和“习惯”迫使我们使用“军事化”这个名词。

乃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工人阶级组织农民的方法。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典型形式——苏维埃国家体系——处于危急状态，所以非常明显，它应当具有军事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这就是说，管理的事务机构应予压缩，由广泛的委员制改成有限的，以最节约的方式分配工人中现有的全部组织者和行政人员。

在濒临经济崩溃危险的情况下，必然以强化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危险是由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经济穷竭造成的。由于无产阶级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在这里经济机构的基本组织已经充满工人管理人员，在这里工人组织已经成为这些机构的基础、核心，所以这里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机构实行改组，方向是减少委员制，而在某些场合（在个别工厂等等）实行一长制管理。一长制并非削减阶级的权力，也不是削减其组织作用。这是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紧凑的、压缩的形式，适合于快速工作、即工作的“军事”速度条件的形式。在技术上这种形式要完善得多，因为它的作用不在于摧毁旧的，或仅仅保障新关系的统治，或教育群众；这里的重心恰恰在于建立事务机构，在于准确地稳步进行工作。革命解决这一任务是在普遍建立无产阶级行政机构的基础之后。在这里注意力的中心已不必集中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问题——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这里的重心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而在于寻找能保证有最高办事效率的管理形式。自下而上的广泛选举制原则（通常甚至是由各工厂的工人进行的）被根据候选人的技术和行政工龄、专门知识、坚强果断状况进行仔细挑选的原则所取替。领导工厂管理的是负责人员——工人或专家工程师。但他们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机关挑选和任命的；他们也由工人组织提出和推荐。在这种体系下，任何工程师除了执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职能以外，不能执行别的任何职能。

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这种形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和合适的；它的首要前提是业已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固，业已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某种社会平衡。这种体系在变革的最初阶段，在破坏旧联系和掌握生产单位的阶段是不可能的和不合适的。这一点必需予以特别强调。^①

这里还需要提出一个同已经分析过的问题有联系的问题，这就是管理方法同管理的培训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全部苏维埃体系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吸收最广大的群众直接参加管理。在我们谈到国家机构的经济组织的时候，事情同样如此。在最初阶段，培训的职能是同管理本身的职能融合在一起的。也不可能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者和技术知识分子那时在反对无产阶级，工人还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但他们的双肩要承担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无产者边管理边学习，边学习边管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业经广泛实行的委员制体系这个形式正好合适。这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学习管理的学校。但是，显而易见，不应把需要当做美德。在以后的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阵地巩固了，也由于造就了内行的工业管理的坚强骨干，管理的基础已是从工人中挑选出来的行政人员阶层；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分子象浪子回头一样，回到了生产过程中来，——所以管理的职能同学习这种管理的职能分开了。已不是用管理本身不断发生的错误作代价去学习管理了。愈来愈多的群众在特殊的机构用比过去的阶段所能采用

^① 因此，例如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相应时期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其他国家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相应时期来说则是绝对不适用的。在这里我们无法细谈这种管理体系，谨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参看下列资料：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经济生活》1920年3月下半月和4月上半月；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

的要系统得多的特殊方法和手段去接触和学习工业行政管理。^①

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的可能进程如何？由于经济上的尖锐危机（穷竭的危机）行将过去，由于将积聚起愈来愈多的能够管理和善于管理的人材，因此不再需要极端的军事管理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具有毫无疑义的优越性，但也有由强制纪律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缺点。在需要果断迅速行动的条件下，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时候它的缺点为它的优点所掩盖。然而，一旦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发达的”管理体系的新阶段就取代了它，这个新阶段决不是过去走过的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阶段是正题，第二个阶段是反题，而第三个阶段是把它们联结到某种高级的统一体之中。发展当然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随着国家政权和人与人相互关系上的任何强制规定的消亡，共产主义的人类将创造出“对物的管理”的最高形式，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委员制或一长制问题本身都将消失，因为未来的人们将做统计计算所得出的无情结论所要求做的事。对人的管理将永远消失。

^① 在俄国托洛茨基同志第一个提出了这种思想。海尔曼·贝克工程师出色地表述了这一点：“多数人的会议是不能作出决定的，至少在关系到错综复杂及决定的结果非常重要的经济生活时是这样。首先必须再一次指出，企业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地干涉企业的技术和经济管理过程，正如议会不应不断地干涉国家管理机关的日常事务一样。企业的管理绝对不能由委员会和评议会来掌握，而应由负责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来领导……所有这些集体机关的作用仅仅在于制定企业的规章，规定生产领导的方向和精神，经常监督企业领导的活动……而委员会和评议会的第二个重要职能是选拔配备企业的领导”（《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52页）。而在一个地方写道：“只有固执己见的人才会否认工厂委员会和工人评议会 是政治组织的有价值的新创造，尽管它们现在经常沦为无益的清谈俱乐部……恰恰应当防止因某一组织形式在最初发展阶段的不成熟而忽视其真正内核”（前言，第8页）。尽管这么说，但贝克本人远远没有理解转变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他的组织计划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这一计划就其结构而论，是绝对不适用于作者为它规定的时代的。

第九章

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①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客观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和历史辩证的方法。2. 生产体系的平衡假设。3. 这些观点在过渡时期的变态：使用价值的非生产性获得，缺乏正常的再生产等等；缺乏平衡。4. 商品。5. 价值。6. 价格。7. 工资和利润。8. 经济思维的“自然化”。

在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时涉及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和范畴。这种分析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里不存在稳定的东西。如果一般地说当前状态的科学研究的是流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本质”，那末由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正是在过渡时期中，“形成”的范畴取代了存在的范畴。流动性、可变性、运动——过渡时期比巩固的生产体系内“正常”发展着的关系更具有这些特点。因此在我们面前就产生一个问题，马克思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方法论上的方法和“思维范畴”是否适用，它们在现在，在摧毁资本主义和奠定新的社会基础的时代是否适用。

^① 这一章是以我的朋友尤·皮达可夫同志的手稿为基础写就的。我们本想共同写作，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实际任务使皮达可夫同志放弃了这一工作并破坏了其整个计划。这一章我只好按照全书的提纲作部分删节，部分补充，部分改写。皮达可夫同志的文本有许多地方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但是，即使是本章加工过的部分，基本的东西仍然是属于他的。——尼·布

实际上，“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并利用这种抽象力的时候，马克思创造了完整的概念体系，认识活的经济现实的工具体系。不仅在天才人物的手中，而且在以后的经济生活现象研究者——不是辩护士和诽谤者，而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者——的手中，这些概念都是科学地掌握经济过程的极其重要的手段。科学地掌握经济过程，意味着在其发展中理解它，在现象的产生、进化和消失中理解每一个现象，并且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去理解——在这种科学掌握的情况下，马克思所明确表述的概念就能“非常可靠地”起作用。理论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经济理论的整个大厦的基石，全部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商品、价值、价格这些概念。

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响了。剥夺者在被剥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已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共产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着整个经济体系，褻渎地摧毁资本主义的“永恒”殿堂。经济上的巨大进展、巨大变动的过程开始了，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的改造过程开始了。新和旧交错在一起，新同旧在斗争，有时是战胜旧的，有时则无力地后退。我们必须从认识上掌握这一复杂的过程，而在这里不得不一再地求助于抽象力。^②

当我们第一次认真地试图真正科学地掌握我们称之为过渡时期经济的那种极不安静的具体的东西时，我们发现理论经济学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XVI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06页〕。

② 当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不需要利用经验材料。恰恰相反。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狄茨出版社第2版第XXXVI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03页〕；还请比较尼·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9年版第14页。

旧概念刹那间拒绝服务。我们看到奇怪的矛盾。政治经济学的旧范畴仍然是实际概括不断变化着的活的经济现实的形式。与此同时,这些范畴没有任何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进去,即摆脱庸俗的思维,在整体上和在发展中理解经济生活的过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商品、价格、工资、利润等范畴乃是基本关系的观念形态说法,在现实中这些基本关系既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它们不存在,同时又似乎存在,它们存在,似乎又不存在。它们是某种奇怪的虚幻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的虚幻存在,就象古老的斯拉夫观念中的死人的灵魂或虔诚的基督教中的多神教的神灵。因此,马克思在相应的生产关系的非常现实的存在的基础上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过考验的旧工具开始失效了。而在实际生活中,它们还继续被不加分析地看作真正理解经济生活现象的手段。^①

现在理论上应用这些范畴的前提,是对其历史局限性有充分的理解,理解其作用的范围,理解在跳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的经

^① 这也表现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著作上。我们随便举最严肃的出版物《国民经济》的一期,1919年第5期来说。先讲И·И·米海伊洛夫的文章《铁路运输》。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数字:“总收入”、“经营开支”、“人员薪金支出”、“每俄里经营开支”,最后还有“纯收入或赤字”。引用的全部数字都是卢布的数额,并向读者提供同1910—1918年,甚至同1919年上半年的比较。接着作者认真而顽强地计算1913、1914、1915、1916、1917、1918年每一普特的“成本”(也是用卢布计算)。在做了这些算术练习之后,他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运输成本在四年中增加了五十多倍。”所有这些计算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卢布的汇率”所完成的跳跃比马克思写的拜物教一章中的商品或招魂术者的桌子更为希奇古怪。我们能不能把卢布当作计量的单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市场的调节作用消失,那末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然而,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部分存在着“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部分“固定价格”,部分资源“无偿”取得。但这还不够。如果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得到额外的数量,也就是说,如果货币的值变得空无内容,那末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文章的作者甚至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而这不是唯一的现象。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殊的庸俗化的典型例子。

济关系下其应用的条件、含义和限度。因此我们面临的是，第一，分析理论经济学的起点，“方法论”，查明其基本概念的作用；第二，考察在过渡经济体系中产生的它们的变态和对它们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区分出三个特点：客观的社会观点，物质生产的观点，最后，问题的辩证历史提法。

客观的社会观点确认社会比单个的经济主体——一个人占首要地位。它不把个人看作是一个“原子”，一个孤立的鲁滨逊，而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物质生产的观点确认生产重于消费和总的说重于全部经济生活。第一个(客观的社会的)观点，如数学家所说的，是必要的，但对说明整个方法决不是充分的。社会是作为某种稳定的体系而存在的。这一体系存在的物质条件是什么？“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② 社会的存在是受社会的生产所制约的，这种生产具有“明确的社会性质”。社会本身首先被看作“生产的机体”，而经济则被看作“生产的过程”。生产活动决定消费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基本条件的生产是既定的因素。^③

辩证历史的方法是从社会的特殊历史形式中去观察社会的，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则从它们的具体表现中加以考察，把它们看作一定社会形态的规律，这些规律只在该社会形态的历史

① 卡·马克思：《导言》，第 XIII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7 页〕。

②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列宁校订的译本，圣彼得堡 1907 年版第 43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68 页〕。

③ 例如，请比较《资本论》第 1 卷第 27 页：“不论什么样的形式”等等。

界限内发生作用。^①因此经济范畴也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②它们决不象资产阶级科学所断定的那样具有永恒的性质，资产阶级科学之所以要使它们永世长存，是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世长存。^③

除了马克思方法的这些基本特点以外，还必须指出方法论上的一种方法，它可以有条件地叫做平衡的假设。鉴于这种方法极端重要，而通常对马克思学说的阐述中对此又不理解，所以需要特别详细地谈谈。

马克思从理论上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从这个体系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体系既然存在，那就是说不管它是好是坏，社会需要总会得到满足，至少人们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能生存、活动和繁殖。在社会分工——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此为前提的——的社会里，这就是说整个体系应有一定的平衡。要生产必要数量的煤、铁、机器、印花布、麻布、粮食、糖和靴子等等，等等。要生产这些东西，就要相应地花费必要数量的人的活劳动，拥有必要数量的生产资料。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偏离和摇摆，整个体系在扩大，在复杂化，在发展，处于不断的运动和摇摆之中，但是总的说来，处于平衡状态。^④

找到这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经济学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条件下对整

①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伟大革命作用就在于此：“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致库格曼书信集》第4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9页〕）。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俄译者李沃维奇，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XX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3页〕。

③ 关于上述方法论原理详见我的著作《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

④ 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争，上引版本第XI页。

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产物。

“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①

这里可以简短而清楚地看到解决基本问题——价值问题的全部方法。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看一看《资本论》的整个结构，我们就会看到，分析是从巩固的、稳定的平衡体系开始的。逐渐加入复杂的因素。体系开始摇摆，它变成活动的了。然而这些摇摆并未失去其规律性，尽管平衡遭到了最激烈的破坏（危机），但作为整体的体系仍然保存着；通过平衡的破坏建立起新的平衡，可以说更高一级的平衡。只有懂得了平衡规律，才能继续前进并提出体系的摇摆问题。不是把危机本身看作平衡的终止，而是看作平衡的破坏，并且必须寻找这种运动的规律，不仅知道平衡是怎么被破坏的，而且知道平衡是怎么重新恢复的。危机并没有越出体系的摇摆范围。在考察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一体系在运动，摇摆，但通过这些运动和摇摆，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平衡。价值规律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平衡规律。生产价格规律是变形的商品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规律。市场价格规律是这一体系的摇摆规律。竞争规律是被破坏的平衡不断恢复的规律。危机规律是定期使体系失去平衡

^①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8页〕。

和恢复平衡的规律。

马克思经常是这样提问题的：出现平衡，为什么能够出现？平衡被破坏——它是如何恢复的？这也就是平衡的假设，是在不提出平衡可能不恢复和体系可能灭亡问题这一典型情况下对整个体系的考察。^①

从平衡的角度观察社会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盲目的社会制度，当然同 *harmonia praestabilitata** 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是从这一制度的存在这一事实及其发展这一事实出发的。后一种情况要求这种平衡的类型是动的平衡，而不是静的平衡。

这就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关于这

① 请注意《资本论》（第1卷第320—321页，斯杰潘诺夫和巴扎罗夫译）中下列极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叠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于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3—394页）这些话包含了 *in nuce*（萌芽状态）的马克思的全部商品经济理论，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所有考察中悄悄提出来的平衡原则起什么样的作用。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本人顺便指出了自己的这一科学的方法：“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资本论》第3卷第1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12页〕）这也就意味着从平衡的状态考察社会经济。

* 预先规定的协调。——译者注

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瓦解时期和对无产阶级统治时期的“意义”的问题。

社会客观的方法是必须遵守的，也无需作任何限制。实际上，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的主体，其动因及其行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即使他是个体的商品生产者。任务就是要分析社会体系的改造情况。在这里：1.集体的、集合的、自觉的经济主体——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全部所属机关在发展；2.由于保留着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体系，所以也保留着市场的非理性的盲目“命运”，即仍然保留着社会自发势力，但它已日益受定形的、有社会自觉性的中央的调节影响；3.最后，既然存在着瓦解社会联系的成份（例如，形成闭塞的自然经济单位），所以一方面，它们的活动受经济环境的“掣肘”（它们的内部改组是社会变革的函数）；另一方面，它们日益被吸收到建设过程中去，经常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经济组织的系统影响（劳动义务制、各种各样的实物赋税等等）。这样，即使个别成分脱离了社会生产过程，但它们仍然处于接受经常影响的范围之内，人们仍然从社会生产体系的观点去考察它们；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它们作为社会吸收的对象，作为新社会制度潜在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然而，尽管客观的社会方法仍然起作用，但这种方法却具有另一种逻辑色彩。在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结构时，一切规律性都带有自发的规律性的性质，“盲目”力量的性质，因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非理性的。在分析过渡时期结构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里的社会经济过程正在日益合理化。

物质生产观点总的说来也是必须遵守的。然而，它在发生重要改变并受到限制。第一，生产过程本身的长短并不是 *a priori**

* 事先。——译者注

规定了。准确点说，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事先规定的，并预定在这一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更新生产要素，而在过渡时期，在整个社会劳动机构受到震动的情况下，再生产过程是成问题的。因此，在这里问题不是“怎么能够进行生产？”而是“能否进行生产？”同样，从生产力的角度，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在正常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理论见解的隐蔽的前提，那末这里的问题便既涉及保持其固定不变状态的可能性，也涉及其崩溃的可能性。

第二，生产过程可能会大大缩短，有些地方还会中断。既然社会没有死亡，这就由其他方法来补偿：1. 比较经济地分配以前的（纯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中的剩余，——这里消费过程脱离了生产过程，变得同后者不可比了；2. 从农村强制取得农产品（这里与“正常”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取得的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直接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因此，进入再生产周期的只有“国民经济”的一半）；3. 以非生产性方法取得产品（战利品，供应仓库的转手，等等）。

第三，由于生产过程脱离了消费过程，所以，甚至在保持自由市场的地方，消费的动机就在现象的表面突出出来了。

辩证历史的方法不仅不应受到限制，而且相反地，应当提升到第一位。正在形成的新关系的形式，它们同旧关系的相互交错，有时是异常奇妙的结合——所有这些使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成为 *sui generis** 综合体。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提出形式经常变化的原则，提出过程可认识的原则的辩证历史观点，在分析各社会阶层简直象地质层系那样异常迅速变动的时代时，理应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相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 一种。——译者注

平衡假说是无效的。应该把平衡看作是体系应达到(如果它将存在的话),但也可能达不到的一种状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在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附带加一句,在体系的人员之间)都不存在比例关系。因此,把适用于平衡状态的范畴、概念和规律移用于过渡时期,是根本不正确的。可以反驳这一点说,既然社会没有死亡,那就存在平衡。然而,这种说法只有在我们考察的那段时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的情况下才会是正确的。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亡的。但是这同一社会体系能够在短期内处于“不正常”状态,即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场合,某种相对的平衡是以部分地破坏这一体系本身为代价换取来的(因为我们没有非生产性补偿,并且有也不能 *a la longue* *)。

因此,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变态的共同特点可以表述如下:在分析过渡时期时许多方法论上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允许的,这种简单化在稳定的生产体系的条件下则是适当的和允许的。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该经济形式怎么能存在,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如何。

在过渡时期问题的提法变成:在一定的时刻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如何,它在这种条件下能存在多久;怎么可能进行生产的;是否可能建立平衡;在建立平衡的情况下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相反的情况下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起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运动的规律如何,等等。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概念,以便弄清它们在所考察时期内的适用程度。因为“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

* 长久。——译者注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09页]。在那里,这一思想还有另一种表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

如果我们确定了同这些范畴相适应的实际关系存在的基本条件,那末我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范畴的适用范围。

商品。这一范畴首先是以社会分工或其分裂及因此造成的缺乏经济过程的自觉调节者为前提的。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同表现了社会分工,其价值表现了没有自觉调节者的体系的各部分之间的普遍的劳动联系。为了使某种产品或一样东西成为商品还不一定要有稳固的社会联系。例如在所谓“偶然”交易中。在这里常常是第一次建立社会联系(在少有的探险中的海外商人,少有的殖民地商品,“Raubhandel”^{*}等等)。^①然而,在所有这些场合商品都不是普遍的形式。这里没有作为社会结构类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这里甚至可以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例如早期的殖民地交易)。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才存在着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的社会联系,商品才会成为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

价值是在我们拥有正规的商品生产的时候出现的。这里必须有通过交换建立的无政府联系的经常形式,而不是偶然的形式。这里也必须有平衡状态。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体系的平衡规律。从这个观点看来,象牙同串珠的交换(这里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交换实际上就是欺骗)显然不是价值的交换。并不是任何一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如小孩子们交换笔,或无产阶级国家实行城乡间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商品交换都是价值的交换(如“自由市场”上按“荒谬的”价格进行的交换并不是价值的

^{*} 掠夺贸易。——译者注

^① 马克思(在《批判》导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2页])把生产关系同派生的(abgeleitete)生产关系区别开来。现在说的就是后者的形成。

交换,虽然它是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见,价值这一处于平衡状态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那里也不存在平衡。

一般地说,价格是价值关系的表现。但不是永远如此。前者可分为三种情况:1.价值在量上同价格相符(简单商品体系的静的平衡);2.价值在量上不相符(典型情况);3.价格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商品所固有的派生的量(例如作为资本化的地租的土地价格)。需要把价格不依据价值关系情况下的虚假形式同上述情况区别开来。这里价格完全脱离了价值。由此可见,在过渡时期虚假形式的状态必然会接近于典型的状态。

这一现象本身又同货币体系的崩溃联系着。货币是联结整个发达的商品生产体系的物的和社会的纽带、枢纽。显而易见,在过渡时期,在消灭商品体系本身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货币的“自我否定”过程。首先,它表现在所谓“货币的贬值”上,其次,表现在纸币的分配脱离产品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脱离纸币的分配。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

工资变成没有内容的虚假的值。既然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雇佣劳动也就消失了。在已经社会化的生产中是不存在雇佣劳动的。而既然不存在雇佣劳动,那末也就没有作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价格的工资。工资只留下它的外壳——货币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将同货币体系一起自行消灭。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工人”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

既然我们说的是新的生产周期,那末利润范畴以及剩余价值范畴就都同样消失了。然而,在“自由市场”还存在,投机活动还存在等等情况下,还有投机利润,这种利润的运动规律同正常资本主义体系下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商人的垄断地位,这种地位能为

他从其他领域吸取大批产品。

一般说来，过渡时期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冲破商品拜物教的外壳。相应的意识形态范畴随着社会自然经济关系体系的发展而消失。既然如此，经济过程的理论就有必要转向自然经济思维，也就是说把社会及其各个部分当作自然形态中的各种因素的体系来观察。

第十章

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

1. 暴力和强制及其同经济的相互关系。2. 过渡时期中的暴力。3. 国家政权是集中的暴力。4.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意义。5. 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暴力和强制。6. 强制是劳动人民自我组织的表现。7. 强制的消亡。

在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即在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现律性的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纯经济”范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sanft)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①毫无疑问，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暴力和强制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把暴力看作历史的基点的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发展的。^②另一方面，有一系列相反的理论是建立在否定暴力上面的，这些理论不过是不愿看到顽强地要求得到解释的、经验所提供的许多现象和事实。马克思主义不能“拒绝思考”实际提供的作为巨大的历史因素的东西。英国掠夺公社土地和原始积累时期，古代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普及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62页〕。

② 杜林的著作就是这样；早期的作者中有莱帕洛维茨，现代作者中有弗兰茨·奥本海默。

埃及大规模的奴隶强制劳动，殖民战争，“大暴动”和“光荣革命”，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军，——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难道不都是同强制问题联系着的吗？当然是联系着的。庸俗的研究者会满足于把一切都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辩证方法论者应当按照历史的前后关系、它们同整体的联系、它们的特点、它们的（有时是实质上完全对立的）职能意义去分析这些形式。

社会暴力和强制（而我们说的仅限于此）同经济有两种关系：第一，它是作为这种经济的函数出现的；第二，它本身又影响经济生活。在起后一种作用时，它可以朝两个方向发生影响：或者它沿着客观发展着的经济关系的路线进行，——这时它就会满足业已成熟的社会要求，加速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进步形式；或者它同这种发展相抵触，——这时它就延缓发展，成为发展的“桎梏”，并且按照一般规律，它必然让位于带有另一种数学符号（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强制形式。^①在“危机时代”暴力的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战争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这两种火车头都是暴力的形式——并且是其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谈到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

^① 关于这一点见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斯图加特，获茨出版社1914年第8版第191—19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22页〕。另见恩格斯：《暴力和经济》等（《暴力论》的第4部分，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由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

种经济力。”^①

在一种生产结构取代另一种生产结构的过渡时期，革命暴力是助产婆。这种革命暴力应当摧毁社会发展的桎梏，即一方面摧毁已成为反革命要素的旧式的“集中的暴力”，旧国家和旧的生产关系形式。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暴力应当积极帮助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建立新式的“集中的暴力”，新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起经济变革的杠杆作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②因此，一方面暴力起破坏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联合、组织、建设的力量。“超经济”力量实际上是“ökonomische Potenz”*，这种“超经济”力量愈大，过渡时期的“耗费”也就愈小（当然是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0页（普及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19页〕。

② 考茨基和鲍威尔之流对“不管来自何方的暴力”都表示不满和反感。科学共产主义的创造者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例如恩格斯论杜林时就写道：“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听着！听着！——布哈林注）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19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23—224页〕。）考茨基关于“残忍”和“人道”的议论不禁令人想起恩格斯论及“真正社会主义者”时的光辉语句：“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的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条。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化，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怯懦的庸人特点也非常适用于党内关系。马克思说：“这些老太婆的特点是，他们想把所有真正的党派斗争都掩饰一下并且加一点糖”（转引自梅林《马克思传》第92—93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8—150页〕）。这难道不正是后来“不偏不倚的”、“中立的”、“独立的”理论家们的真正形象吗？

* 经济力。——译者注

下),这一过渡时期就愈短,就能愈快地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平衡,而生产力的曲线就能愈快地开始上升。这种力量并不是某种超经验的神秘的东西,它是正在完成变革的这一阶级的力量,是它的社会力量。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程度。而当革命阶级集中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它是最有组织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政权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国家政权是经济变革的最强大的杠杆的缘故。

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革命的阶级、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国家,是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和创造新的经济关系的要素。“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①由于这种政权是对付资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所以这是一种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它把生产中的物质骨骼转交给无产阶级支配,并逐步把生产中非无产阶级的生产人员安置到新的社会生产联系的体系中去。另一方面,这种“集中的暴力”也部分适用于内部,是劳动人民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强制的两个方面: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强制,和对无产阶级自身以及接近它的社会集团的强制。

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会受到下列各方的反抗:1.寄生阶层(过去的地主、各种各样的食利者、同生产过程很少关联的资产者企业家);商业资本家、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2.从上述阶层中招募来的不从事生产的行政贵族(资本主义国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

家的大官僚、将军、主教等等)；3. 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组织者和经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组织者、工业界的“实干家”、大工程师、同资本主义世界有直接联系的发明家等等)；4. 熟练的官僚——文职的、武职的和教会的；5. 技术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多数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动物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记者、教师等等)；6. 军官；7. 富裕的大农；8. 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9. 僧侣，甚至普通僧侣。

所有这些阶层、阶级和集团，都必然在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领导和将军们的军事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击退这些进攻，使敌人瓦解。对他们的另一些斗争方法(怠工)需要实行镇压，等等。只有“集中的暴力”能做到这一切。随着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随着其力量日益凝集在社会革命能量的基本结晶体——无产阶级专政周围，敌对阵营里经济上有用的非寄生集团的旧心理也开始出现迅速瓦解的过程。需要查明这些人的人数，把他们集合起来，安排到新的位置上去，放到新的劳动领域中去。而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起强制作用的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组织能加速吸收这些对新制度也有用的成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过程。不言而喻，没有强制性的压力就不可能多少有计划地、合乎社会需要地吸取这些力量。因为还存在于这类人头脑中的旧心理残余——一部分是个人主义心理，部分是反无产阶级心理，使他们把合乎社会需要的计划看作对“自由的个人”的权利的严重破坏。因此国家的外部强制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在对这些阶层不断进行再教育的情况下，随着他们阶级的变形，变成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强制因素才会愈来愈少。显而易见，一个集团在资本主义等级体系中地位愈高，心理上的再教育过程也就愈为困难，愈为痛苦；对那些其生活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有最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进行社会改造

尤为困难。革命初期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斗争，使他们处于能够做有利于社会的工作的条件之下，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合理地安排这些力量，对他们采取视其心理状态不同而分别对待的正确政策，——归根到底，做到所有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批准”*im Werden*① 保卫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中的暴力”。

然而，强制不仅用于过去的统治阶级和接近它的集团。在过渡时期，它也——以另一种形式——用于劳动人民本身，用于统治阶级本身。对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进行极其详细的分析。

在过渡时期，不能以阶级的单一性作为先决条件来限制对问题的分析。在研究资本主义机制的抽象规律时，不必探讨各阶级内部的分子运动和这些“实际总和”间的细微差别。在那里，作为某种整体的东西，它们是比较单一的。把这种观点——在对“纯粹资本主义”作抽象的理论分析时，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用来分析形式不停地变化的，具有所谓原则动态的过渡时期，那将是方法论上的极大错误。不仅阶级间的机制，而且阶级内部的机制都必须予以注意。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都是极其善变的東西，在“危机时代”其变动性尤其大。②

马克思说过，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其自身的本性。在社会斗争进程中事情同样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过程就在于此。如果从阶级内部存在着许多阶层这个观点来观察这一过程，那末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中下层不断接近其先锋队的过程。这也就是使“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忏悔

① 在过程中。——译者注

② 因此考茨基及其一伙的观点是荒唐的，他们把革命看作是议会表决的做法，在这里事情是由数学的数字（一半居民 + 1）决定的。见尼·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7—8期（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20—244页）。

的老爷^①对“人民”的看法是 *in concreto** 把每一个“下层阶级”的成员理想化。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依据的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去实行统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个阶级是纯粹的，其每一个成员都是理想的平均数。无产阶级先锋队积极率领其他人。它是一个觉悟的、深思熟虑后行动的、善于组织的整体。它把表同情的中间阶层吸引过来，这个阶层本能地“同情”变革，但不能清楚地说明目标，确切地指出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在先锋队和这一极其广泛的阶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一批批新的力量不断地被吸收到先进阶层中来。这个过程也就是使阶级成为阶级的那种内部的结合。在表同情的中间阶层之后有漠不关心的阶层，然后还有所谓“损人利己”的阶层。然而，教育过程也包括这些阶层：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发展，人数在增加，吸收愈来愈多的本阶级的各阶层，而这个阶级也愈来愈成为“自为的阶级”。

如果我们稍稍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大致这么一些集团：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即同农村脱离联系的、典型的、长期从事工业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工人贵族，有时同资本的利害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国家的印刷工人，等等）；定期进入和脱离工业领域的季节工人；拥有私有财产（小房子，有时还有土地，等等）的工人；同农村有联系，有时经营农业的工人；在战时成为工人而未经资本主义训练，往往来自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工人；由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政治特征选拔出来的工人（例如铁路工人中间的某些阶层）；

^① “忏悔的老爷”指俄国解放运动民粹主义时代的人物，他们是封建家庭出身的儿女，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而“到民间去”，参看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译者注

* 具体地。——译者注

农业工人、纯雇农和半雇农，等等，等等。结果出现一幅工人阶级中各个不同种类的人物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意识”的五彩缤纷的图画。显然，在这些集团中也有完全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集团，它们带着非常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和“损人利己”的欲念。但是甚至工人阶级中的比较广泛的阶层也都带有商品资本主义的印记。因此强制性的纪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内部的自愿的纪律愈少，即无产阶级内的某个阶层或某个集团愈缺乏革命性，就愈强烈地感觉到纪律的强制性质。甚至结合成变革的政党，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自己的队伍里为自己规定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这个先锋队的许多组成部分在这里不大感觉到这种纪律，因为这种纪律是同内在的动机一致的，但不管怎样，这种纪律是存在的。^①但是它不是靠别的力量规定的，而是表现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全体的集体意志。

不言而喻，这种强制的因素在这里是工人阶级的自我强制，它是由定形的中央向不定形的和分散的外地发展的。这是把工人阶级各个部分联结起来的自觉的力量，它对某种人而言在主观上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对全体工人阶级而言在客观上是对其自我组织的促进。

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有“个人”的完全自由，将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外部准则，将会有无需强制的主动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没有任何主动精神，只有来自敌对阶级的强制。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是同强制同时并存的，这种强制是作为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各个部分规定的。强制和主动精神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表现了过渡时期本身的矛盾性质，

^① 在苏维埃俄国，根据党的倡议，共产党人犯了罪要比“普通人”受到更大的惩罚。

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已经超出资本主义强制的框框，但尚未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者。

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自由”是这个社会为数众多的虚构之一，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迫使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自由”可归结如下：第一，为自己挑选老板的相对可能性（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辞职”和“被解雇”的可能性；第二，这种“自由”指的是工人自身间的竞争。后一种意义上的“劳动自由”，早在资本主义时期已被工人组织部分制止，那时工会把工人联合起来，把阶级的各个分散部分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变得更强有力，从而部分地消灭了工人相互间的竞争。工会提出工厂只招收工会会员的要求；它们用抵制（即采用暴力）去对付工贼这一资产阶级“劳动自由”的生动体现，等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关于“老板”的问题消失了，因为“剥夺者已被剥夺”。另一方面，无组织、不团结、个人主义、行会狭隘性、资本主义社会恶习的残余以对整个无产阶级的任务不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苏维埃专政，工人国家的任务和要求集中表现了这种整个无产阶级的任务。由于这些任务无论如何必须执行，所以很清楚，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正是为了工人阶级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必需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表明整个机构已有较高程度的组织性，整个无产阶级政权已较为巩固。^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整体利益”的名义来为强制辩护的，

^① 俄国孟什维克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实行强制的哀号，同资本家关于工会破坏劳动自由的哀号完全一样，因为工会在罢工时布置纠察队，不让资本家利用工贼。众所周知，资本家集团的最无耻勾当正是在保卫劳动自由的口号下干出来的。

而事实上这是为了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强制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工具。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唯一的一个完全没有私有者偏见的阶级。但是，它必须同有时人数众多的农民并肩行动。如果大农（富农）积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措施，那末无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就应给富农的旺代* 以或大或小的有力反击。但是中农群众，甚至部分贫农群众是不断动摇的，他们仇恨资本家地主的剥削，这种仇恨把他们推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私有者（而在饥荒时期还有投机者）的感情又把他们推向反动派的怀抱。后者表现于反抗国家的粮食垄断，追求自由贸易（这就是投机活动）和追求投机活动（这就是自由贸易），反抗劳动义务制和整个地反抗国家制止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形式。由于穷竭的城市在最初阶段无法为送往“公共炉灶”的粮食和贡赋支付等价物，这些刺激尤其明显。因此，在这里强制也是无条件的绝对必要的。

总之，对过去的资产阶级集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强制是异己阶级所实行的强制，这个阶级同它所强制的对象进行着阶级斗争；对非富农的农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所实行的强制，就农民是私有者和投机者而言，是一种阶级斗争，就农民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者而言，它则是从劳动上组织农民，团结、教育农民和吸引农民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手段；最后，对无产阶级本身来说，强制是工人阶级自己规定的组织方法，即加快强迫自我组织的方法。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

* 旺代为法国的省名，18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该省成为多年的反革命中心地。
——译者注

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同时也是各阶级的变形时代。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了不断的社会分解；它使农民分化，消灭“中等阶层”，使阶级矛盾达到最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专政在初期表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最惹人注目的分裂，而在建立某种平衡之后，又开始重新把人类集合到一块来。遭到失败、被击溃、被制服，变得贫困和习惯于体力劳动的过去的资产阶级，在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和再教育。其一部分死于国内战争，但其活下来的那一部分已是另一种社会范畴了。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在总的潮流中最为稳定的农民终于也被纳入总的轨道，虽然缓慢，但确实无疑地在接受再教育。无产阶级自己也同样在“改造自己的面貌”。这样一来，阶级的专门特点在消失，作为阶级的各阶级开始解体，而向无产阶级靠拢。阶级的变形时期到来了。这种变形的杠杆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集中的暴力，它在最终消灭任何暴力。作为阶级的最高表现，它在消灭任何阶级。作为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阶级的制度，它在为一切国家的死亡做准备工作。它在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的时候，同时也在消灭自身的存在。在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代替外部纪律的是正常的社会的人对劳动的单纯爱好，在这里人们行为的外部准则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形式的强制都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

第十一章

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 共产主义体系

1. 世界经济的平衡体系。2. 战争是对生产平衡的破坏。3. 自最薄弱环节开始的体系的崩溃。4. 共产主义革命的类型。5. 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6. 共产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殖民地。7. 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形成及其联盟。8.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消亡。9. 世界共产主义体系。

在战前，世界经济体系处于动的平衡状态。各国间的交换过程，国际间的资本运动（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用对世界经济及其组成要素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正常”过程的牢固纽带，把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联结起来。对于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规律，纯理论是在其抽象的形式中把它们当作抽象的、“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来分析的，同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在国家划分的领土范围内得到具体实现，这些规律首先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体系的自发规律。世界价格，从而“in der letzten Instanz”* 作为它们调节者的世界社会劳动；世界竞争，世界市场，对世界平均利润率的追求；对统一的世界平均利率的追求；工资的拉平及使工资趋于一致的世界水平的趋势，这种世界趋势使劳动

* “最终”。——译者注

力从一国流向另一国；世界工业危机，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处于动的平衡、但在矛盾中发展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事实的表现。

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它们都成了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世界性的战争。正如由于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的连锁联系使危机具有世界危机的性质，战争也必然会具有世界性大血战的性质。危机之所以蔓延开来，象波浪那样展延，是因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的平衡的破坏，必然象沿电报线传播那样，传到它的所有其他部分去。在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平衡遭到破坏，它必然会使整个体系受到巨大的震动，变成世界大战。世界经济联系的破裂意味着把它分解成许多小单位，而在这种破裂的条件下各参战国平行进行的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则最终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这种崩溃是从哪些环节开始的呢？不言而喻，它恰恰应从组织上和资本主义方面最薄弱的环节开始。^①

其实，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在战争成为具体事实的时候，世界经济内部各私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性，是由于生产关系内部的改组，改组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因此，可以总的说，这些体系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水平成正比的。没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拨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这种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联系着的稳定性，既包括生产方面，也包括社会阶级方面。然而，只有当一般

^① 某些经济落后性的思想家就经济机体的巩固性问题发挥了相反的观点。例如古列维奇将军的关于战争和国民经济的著名著作中就是这样。另一方面，pur sang（纯粹的）年青的俄国帝国主义者也看到了危险（固然是在不超出资本主义界限的“灾祸”的有限范围之内）。例如参看《大俄罗斯》文集中彼·司徒卢臧的文章。还可参看谢·普罗柯波维奇：《战争和国民经济》。

资本主义关系处于某种“成熟”阶段时，才可能产生国民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本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力越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组织和新资本主义垄断关系的总体越发达，这种形式就越完善。一个国家愈落后，愈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愈不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愈薄弱，这种形式就愈不完善。但是，不仅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技术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巨大冲突中最稳定的体系应是拥有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最发达的技术的体系。这种技术具有决定性的军事意义。组织形式的完善部分地补偿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权（它同资本的经济组织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中的集中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①

决不应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后顺序问题同这一革命类型的高低问题混为一谈。革命类型的高低取决于无产阶级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的比重。无产阶级的集中程度愈高，共产主义革命的类型就愈高，就愈难胜利，但也就愈容易建设。^②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前提是集中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的劳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些前提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力量特别强大的资本的“列强”中。另一方面，正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体系，其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特殊状态，这就给“伟大的”帝国主义体系创造了剥削殖民地的可能性。而在这一基础上又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帝国主义“祖国”和工人

① 不言而喻，这里是以其他条件相同为前提的。简单的机械的力量优势也可能在较为落后的集团一边，如果在数量上它们是一个较大的量的话。

② 相反观点的最庸俗的“标本”是民粹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弗·特鲁托夫斯基的著作《过渡时期》。

阶级之间暂时“利益一致”的可能性。这种“Interessengemeinschaft”*又大大地阻碍了以断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任何一致性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但是只要革命成为既成事实，那末革命类型最高的是那些工人阶级占整个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生产资料最集中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因素，第一，提供了新社会的物质骨骼，第二，提供了新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俄国实现。在这里国家机器在组织上最为薄弱。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刚刚粗具轮廓。总的说来是个农业国，它在技术上的薄弱造成了军事上的空前失败。国家机构是如此不稳固，使得无产阶级在各大的城市中心能够较为容易地把它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容易取胜的原因就辩证地转变成产生巨大困难的根源了。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大量存在的同真正社会化劳动相对立的分散零碎的小私有者的劳动，这一切都是组织有计划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巨大障碍。革命之所以容易取得胜利，还由于追求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得到反对地主的农民的支持。但这些农民又是建设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时期的最大阻力。

相反地，在德国革命要痛苦得多。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所作的反抗要顽强得多；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取得胜利要困难一些。尽管这里革命发生得要晚一些，但革命的类型却会高一些。^①

因此，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观察革命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出下面一条总的原理：世界革命过程是从世界经济中发展水平最低的那部分体系开始的，那里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新关系的形

* 利益一致。——译者注

① 读者在尼·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的通俗谈话）中可以看到对革命状况及其类型的光辉分析。

成却比较困难；爆发革命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革命类型的高度成反比。

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停止它的崩溃，停止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在缔结和约以后，生产力还在继续下降。帝国主义者想用否定世界经济的办法来组织世界经济。战胜国想通过残酷的剥削摆脱困境，归根结底，这种剥削又会消除这种剥削的可能性自身。而世界竞争的魔鬼则对它们玩弄恶作剧，迫使它们相互斗争。于是，历史 *a posteriori** 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其不幸的后果，这些后果以令人震惊的真面目突然出现在“战胜者”的面前。①

战时经济上的孤立和联系的破坏，这种状态在战后留下的后果，一环一环地加剧生产力的破坏过程，也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即使只在一个国家内也能大大加剧摧毁旧意识形态的过程，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化”，而以前的全部发展已为此打好基础。世界无产

* 用实际材料。——译者注

① 约翰·凯恩斯在其《和约造成的经济后果》（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20 年版）中就缔结和约后的欧洲写道：“和约没有对欧洲的经济复兴作出任何规定，没有规定使战败的中央帝国成为好邻居，没有规定巩固欧洲的新兴国家，没有规定拯救俄国；它也丝毫没有要求协约国本身之间的经济上的利益一致；关于如何调整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动荡的财政，关于旧世界体系和新世界体系之间的平衡，在巴黎没有达成协议。”（第 211 页）凯恩斯对形势作了如下说明：“当前局势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欧洲内部生产率暂时绝对下降；第二，交通和交换的崩溃……；第三，欧洲缺乏购买力来买大西洋外的通常商品。”（第 216 页）关于即将临近的社会灾难，见第 213 页；关于统治阶级的情绪，见第 222 页。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为时已晚地驱使帝国主义者热衷于搞世界经济统一范围内的合作。例如工程师罗德尔（前引书第 50 页）鼓吹说：“正如一个大建筑物的石头互相衔接、互相支撑一样，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前进的要求中，一个民族依靠另一个民族。如果一块石头受到冲刷，那末就必须及时换一块好的，以免整个建筑物增加危险”，等等。所有这些凄凉的议论以下列悲剧语言结束：“活着还是死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历史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回答是坚决的否定。

阶级在头一批苏维埃共和国中拥有自己的掌握最大限度的社会的和物质力量的组织。因此，在正在瓦解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些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新的结晶中心，吸引无产阶级力量的中心，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因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大踏步地走向灭亡，尽管它企图往自己的身上注入新的生命。生产力在下降。生产关系在瓦解，在爆炸。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没有经济平衡，平衡的破坏采取越来越急剧的形式。也不存在社会阶级的平衡，事情正发展为决定性的冲突。政治组织，准确点说，资产阶级国家正经历着危机，因为世界帝国主义没有能力执行绝对统一的、各个部分相同的政策。资本主义军队在瓦解。只要世界生产无政府状态及其表现——世界竞争——迫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接受它的盲目意志，那末，整个过程就愈来愈具有自发的瓦解性质。资本主义关系的自发性在其破坏的基础上造成一种预示末日临近的富有特色的不稳定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瓦解着的世界结构中，出现发展着的新型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原则上存在着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恢复社会的平衡；这恰恰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中汲取自身的补充力量的组织；是具有新的经济关系体系的无产阶级国家，瓦解着的旧的资本主义集团变得愈衰弱，这种国家就愈巩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自发过程的体现，因为这里的关系是完全没有调节的；不自觉的“市场”起着自觉的调节者的作用。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让世界联系仍然保持无组织状态，却用对经济关系的自觉调节来代替不自觉的过程，用资产阶级的阶级计划取代商品社会的自发规律。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瓦解的时代，重新放任这种自发力量，它同过去的商品自发力量不同之处是其运动的方向：过去这种自发力量是资本主义积聚和集中的杠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杠杆，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杠杆；现在这种自发势力则是使组

织体系解体为一个个小单位的杠杆。并且,在这种自发的解体过程中,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才可能有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和合理化过程,但已经建立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之上了。旧体系的瓦解和解体,新体系的组成,这是过渡时期根本的和最普遍的规律。因此,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偏离,合力总是沿社会主义路线前进的。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它们的军事冲突中,在阶级战争中(旧军队在这里瓦解)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整个发展过程使得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保持社会平衡。

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最大因素是帝国主义国家同它们的无数殖民地之间联系的瓦解。所谓“民族国家”在战前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最纯粹的虚构。事实上,实际存在着殖民政策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是个复杂的体系,有坚强的核心和从属的外围,也存在着这一殖民政策的客体,它们都带着不同色彩和不同程度的从属性。正是在形成这些巨大的形体中,有组织的“超经济的”暴力起了巨大的作用,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暴力本身是一种经济力。“Machtpolitik”, “Armee und Flotte”^{*} 及帝国主义的其他魔力是组织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手段。国家的联合曾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联合归根到底是依靠武装力量的。因此,随着资本的国家政权的瓦解,必然会开始出现帝国主义体系的瓦解、殖民地的脱离、“列强”的分裂、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分立。从社会力量斗争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殖民地起义、民族起义、小型民族战争等等。当然,殖民地起义和民族革命(爱尔兰、印度、中国等等)同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绝对不会有任何直接关系;它们的地区的和直接的意义决不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这里通常不起政治领导作用,因为它还很弱。尽管如此,这些殖民地

* “实力政策”,“陆军和海军”。——译者注

起义和民族革命仍然作为组成部分加入伟大世界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在转动世界经济的整个车轴。因为客观上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崩溃的因素，这种崩溃使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易于取得胜利。

如果各国无产阶级是彼此孤立的，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斗争过程中，所有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联结、联系、结合、联盟就是必不可免的了。即使对资产阶级来说，在过渡时期客观上也需要有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联盟：它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指望消除危机；它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抵抗无产阶级。因此产生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然而，已开始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它的极端紊乱，新产生的大量摩擦都大大加强了分散的倾向，因而资产阶级正在崩溃。瓦解的自发力量超过了资产阶级的组织家的理性。对无产阶级来说，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无产阶级的部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克服瓦解，所以，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国家体系联合的客观必然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随着重心向无产阶级国家及其联盟转移，世界经济的整个面貌也改变了。过去的殖民地和落后的农业国，虽然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但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经济联系。它们逐渐被卷入社会主义体系，其形式略同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农民的农业被卷入这个体系。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在逐渐成长。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成长，资产阶级的反抗日益被削弱，最后，剩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综合体大概将连同其所有的组织 *in corpore* * 投降。^①

* 全部。——译者注

① 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算是典型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不会全部瓦解，而这在社会转变的典型场合却是必然的。

但是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已是对一般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的开始。只要资本主义集团的反抗在增强，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就必须增强。由于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是包括一系列无情的阶级战争——更不必说国内战争了——的整个时代，所以很清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消亡的。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将会结束。外部的强制规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陆军和海军，这是最尖锐的对外强制工具；其次是惩罚和镇压机关、系统；然后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等等。不是按国家划分，而是按经济合理性原则分布的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巨大的能量储备，过去用于阶级斗争、战争、军国主义、克服危机、竞争等等，现在用于生产劳动。阶级的变形、新一代的劳动教育和培养、整个生产过程的合理化，更进一步加速了生产力的增长。分配失去了强制的等价的“按劳”分配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和下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体系。^①自人类存在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所有各个部分都是和谐地建立起来的体系：它既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它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与人的斗争，把整个人类联结成为统一的集体，这个集体将迅速地掌握不可胜数的自然财富。

积极地建设人类的未来和清楚地看到这个未来的无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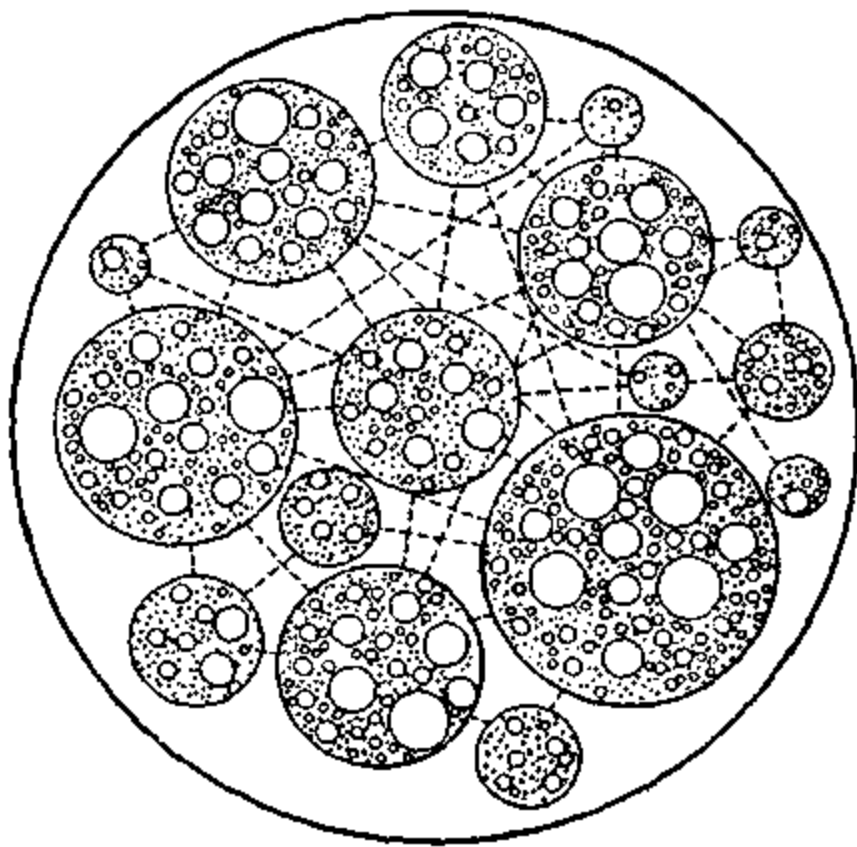
① 卡·巴洛德教授天真地以为，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就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对我们提出许多极为可笑的责难，但这些责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无知。见卡·巴洛德，《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友策）第34期，1919年8月23日出版。

可以用伟大的科学斗士的话来说：*Novarum rerum mihi nascitur ordo.*^①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一新制度。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抗拒的。

① 一系列新事物都是为我们诞生的。——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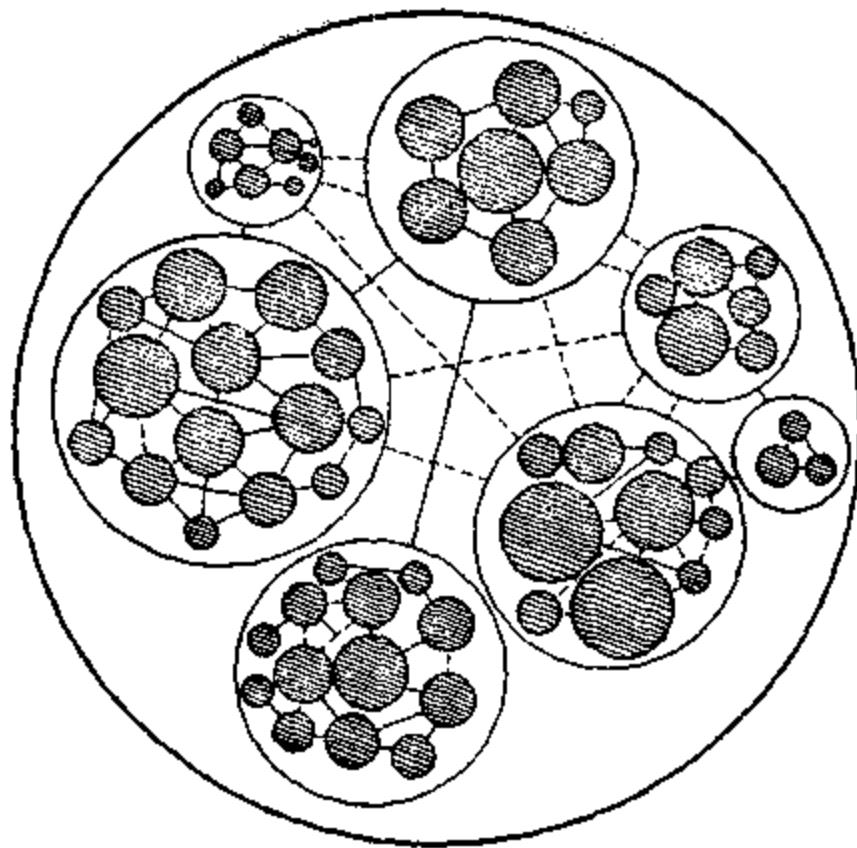
图一 (第一章)

A.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



1. 小圆和小点表示各无组织的“民族”经济内部的单个企业。
2. 虚线表示各民族经济之间的联系，其联系形式主要是通过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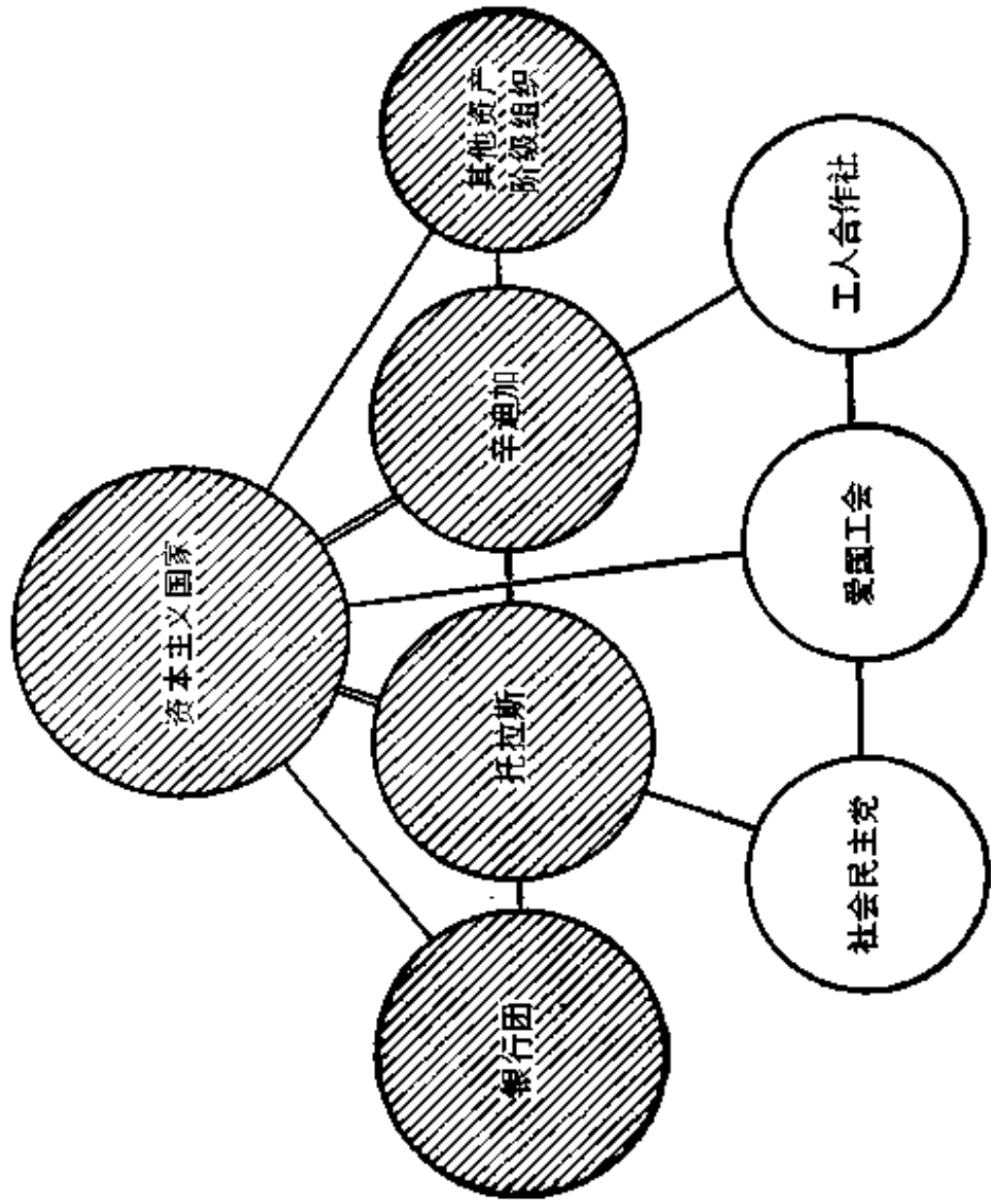
B.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



1. 小圈表示组织上相互联系的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它们的体系构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2. 虚线表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不巩固的联系；实线表示主要通过参加和投资建立的巩固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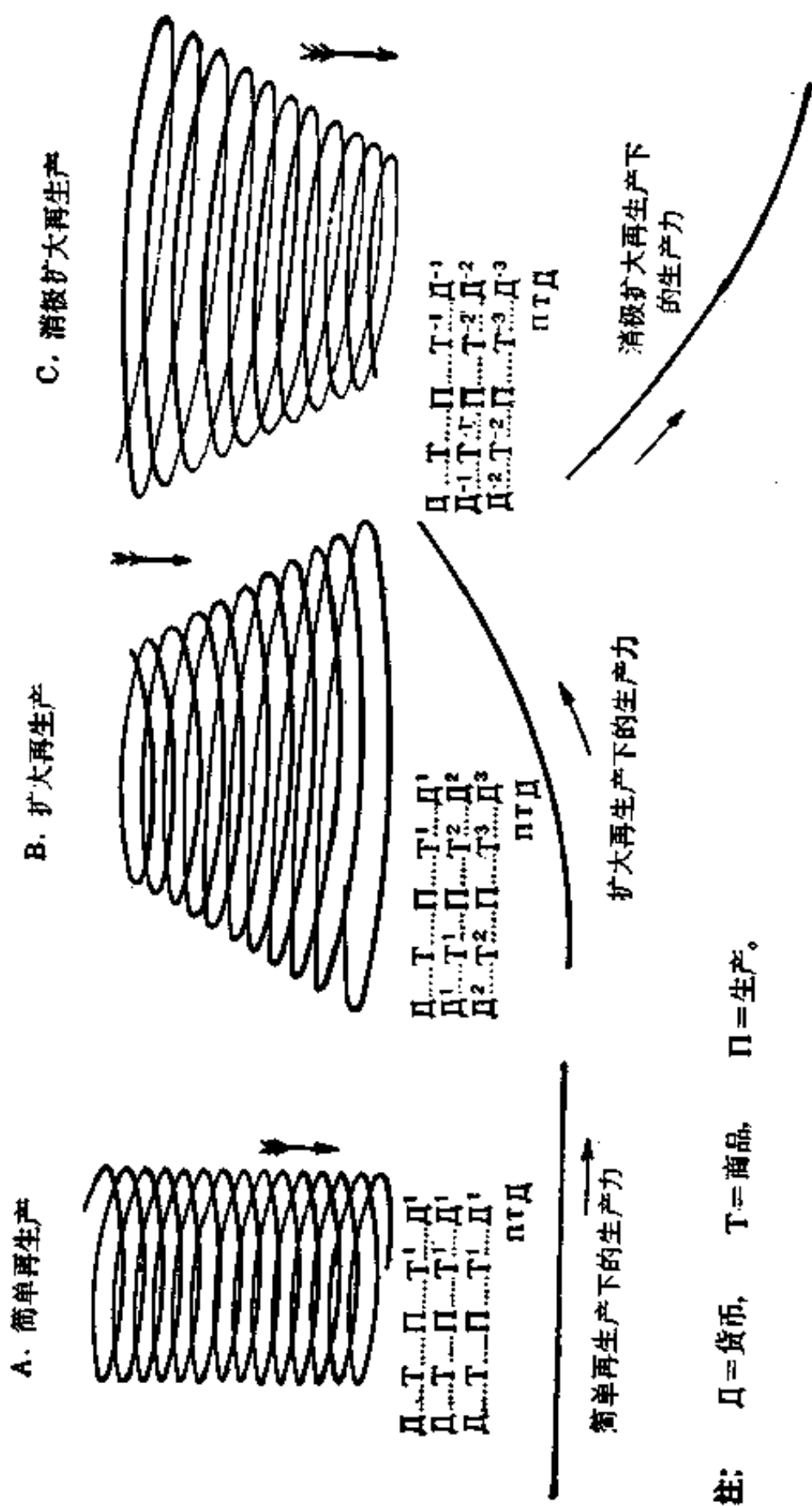
图二 (第三章)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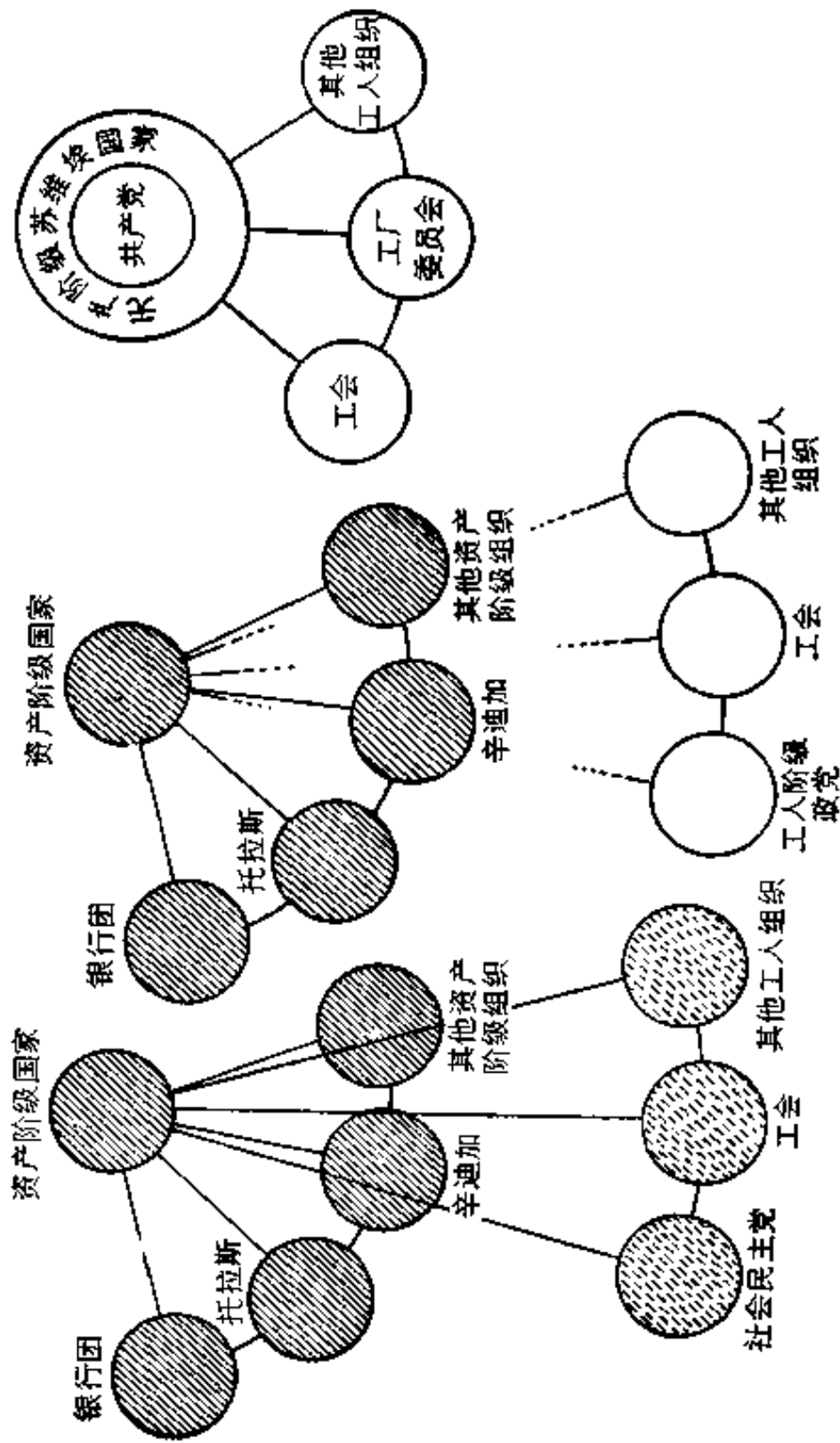
图三 (第三章)

社会再生产过程



图四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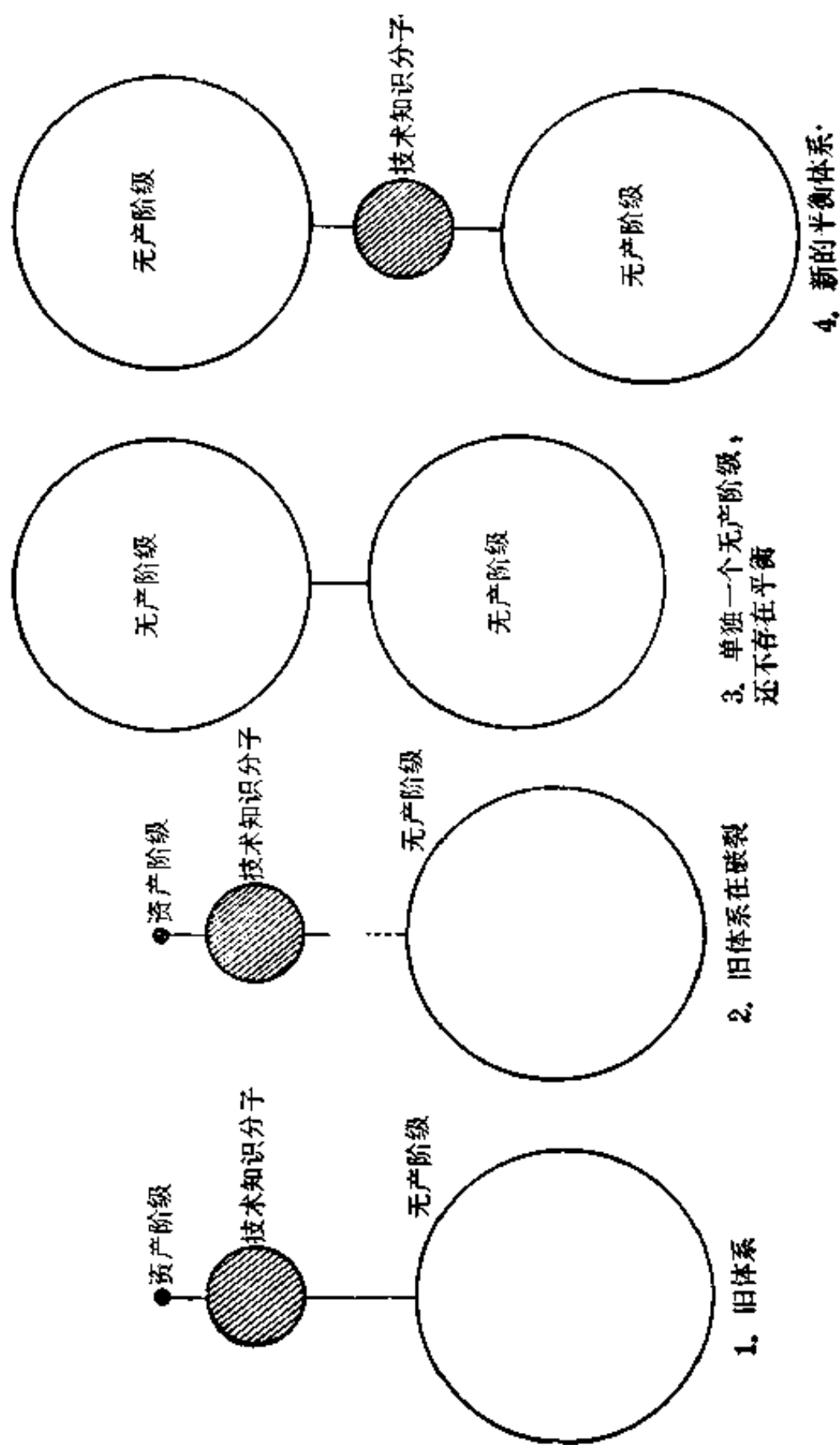
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A.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B. 国家资本主义的崩溃 C. 无产阶级专政总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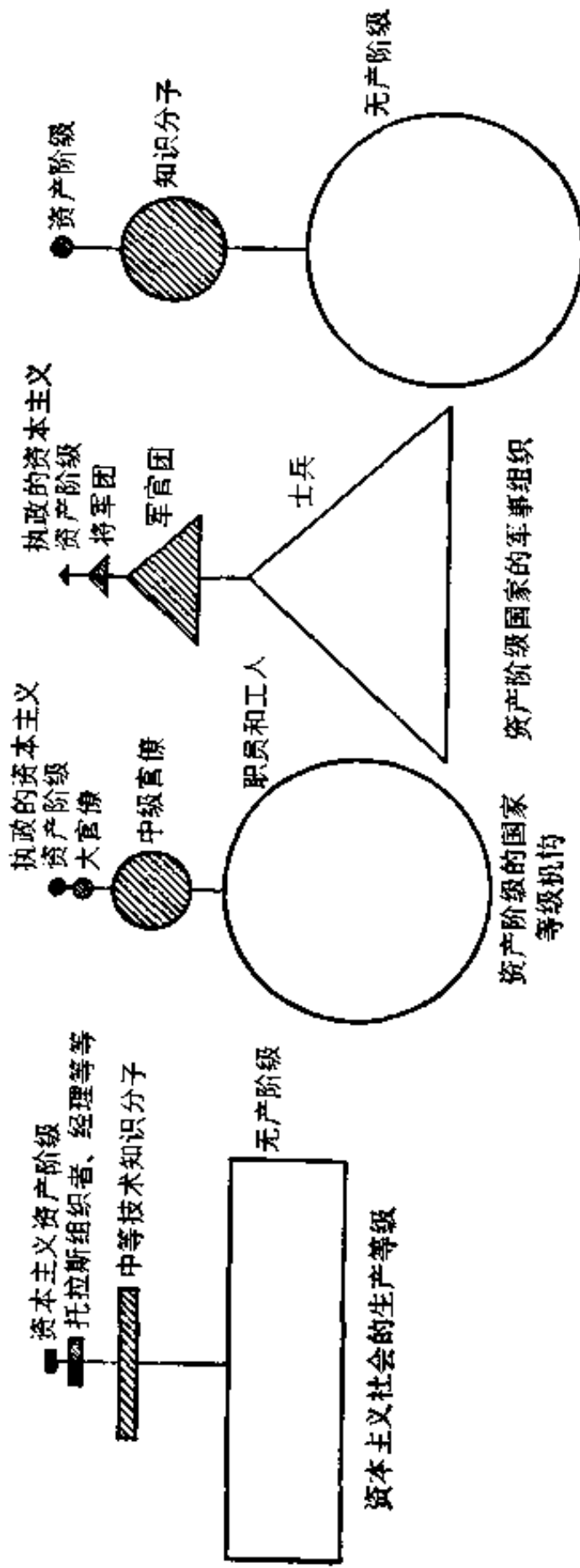
图五(第三、四章)

旧体系的崩溃和新体系的建立。总示意图



图六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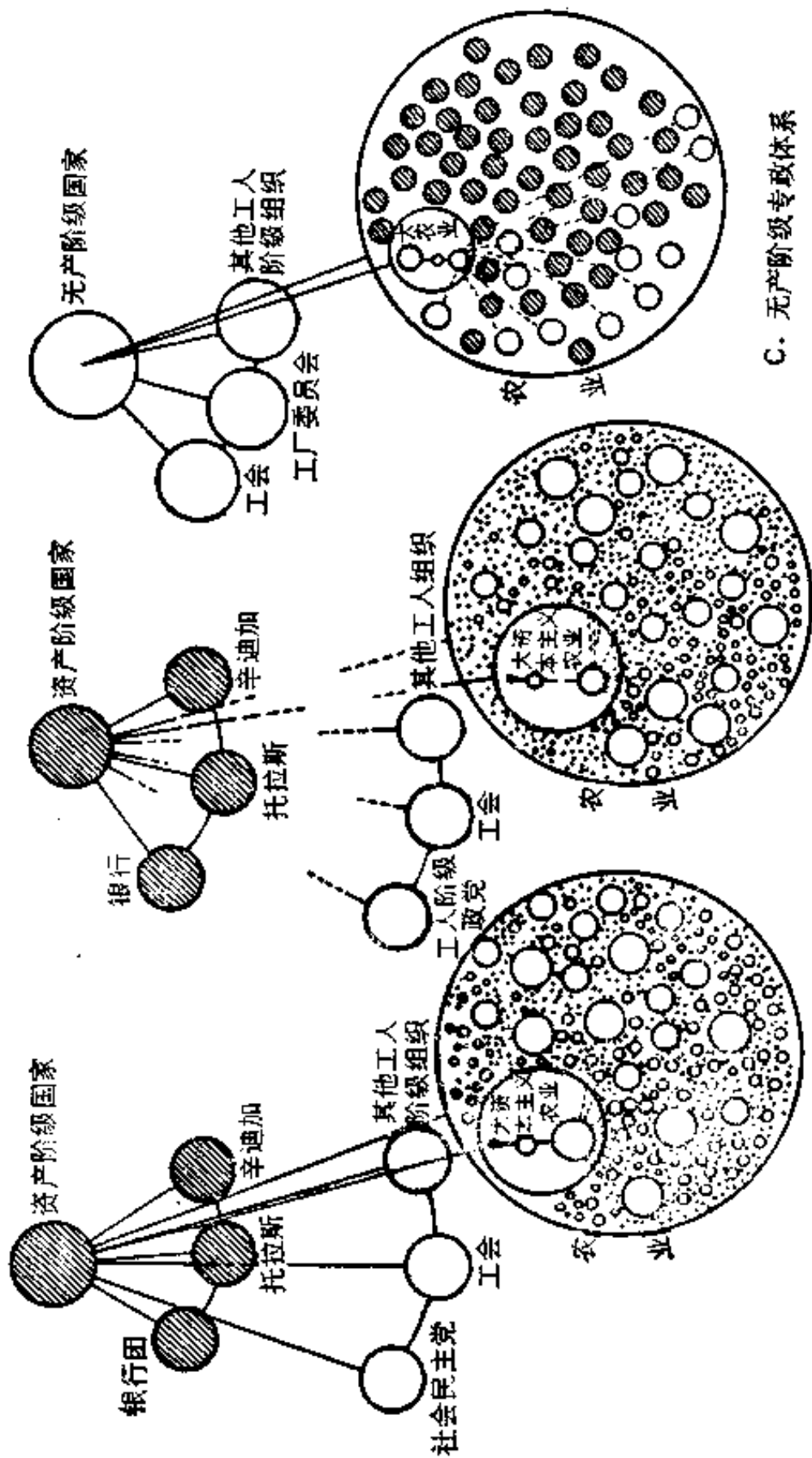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等级关系



资本主义关系总示意图

图七(第五章)

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A.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B.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C.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过渡时期经济学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b o o k : / / s s r e a d e r / e 0 ? u r l = h t t p : / / 2 0
2 . 1 9 8 . 1 4 1 . 2 2 / 0 0 / d i s k g d g / g d g 7 2 / 0 9 / ! 0 0 0
0 1 . p d g & & & & p a g e s = 1 4 5 & b o o k n a m e = 过渡时期经济学

页数 = 1 4 5

下载位置 = h t t p : / / 2 0 2 . 1 9 8 . 1 4 1 . 2 2 / 0 0 / d i s k g d g
/ g d g 7 2 / 0 9 / ! 0 0 0 0 1 . p d g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